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重大问题研究 聂振邦 元利兴 詹琳 (005)

关于金融支持黑龙江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宋海 (018)

• 宏观经济 •

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创新驱动 戴桂英 张瑾 (026)

“十三五”时期加快培育创新动力的思考与建议 盛朝迅 (043)

• 国际经济 •

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缺失与我国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闫坤 于树一 (054)

• 区域经济 •

深圳发展湾区经济监测指标体系建议 綦鲁明 (072)

• 产业发展 •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互联网金融产业融合研究 闫妍 杨灵 (085)

• 企业发展 •

企业家精神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聂常虹 李慧聪 (096)

• 调研报告 •

美国西海岸高水平创新型大学调研报告 郑新立 盛思鑫 (107)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0)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5)



CONTENTS

A study on important issu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i>Nie Zhenbang , Yuan Lixing and Zhan Lin</i> (005)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in Heilongjiang	<i>Song Hai</i> (018)
Strengthening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o promote innovation – driven strategy	<i>Dai Guiying , Zhang Jin</i> (026)
Some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drivers in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i>Sheng Chaoxun</i> (043)
The lack of drivers for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i>Yan Kun , Yu Shuyi</i> (054)
Proposals on developing economic index monitoring system in the bay area of Shenzhen	<i>Qi Luming</i> (072)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financial industry based on Logistic model	<i>Yan Yan , Yang Ling</i> (085)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n by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Nie Changhong , Li Huicon</i> (096)
A survey report on the high level innovative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Zheng Xinli , Sheng Sixin</i> (107)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20)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重大课题研究

聂振邦 元利兴 詹琳

摘要：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取得巨大成效，但是我国扶贫对象规模依然庞大、扶贫减贫难度加大、扶贫不精准等问题比较突出。“十三五”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面临战略新转变、贫困新特点、扶贫工作新要求、需要新机制、具备新手段等新的形势和特点。为此，“十三五”时期应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工程、区域性扶贫开发、精准扶贫、产业扶贫、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创新完善扶贫开发管理及绩效考核、精准扶贫、社会扶贫、投融资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并配套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加快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

关键词：扶贫开发 新形势 新思路 新机制

作者简介：聂振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元利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詹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群众 20 多年的艰苦奋斗，在扶贫标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两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很多贫困人口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我国扶贫事业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胜利完成扶贫攻坚任务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

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任务依然繁重，贫困人口规模仍然庞大，扶贫脱贫难度越来越大，我国扶贫工作也出现一些新转变、新特点和新要求，同时面临新挑战。因此，“十三五”时期扶贫工作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要适应新形势、采取新思路、运用新机制、激发新动力，完成扶贫攻坚重大任务，促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一、“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基础和新形势

（一）当前扶贫开发的进展情况

1. 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巨大。2011 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到 2014 年底，按照人均纯收入 2300 元/年的新扶贫标准的减贫总量达到 9550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7.2% 下降到 7.2%，重点贫困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 3985 元提高到 6610 元，增速超过全国水平。根据 2013 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统计，1980 年到 2008 年，中国减少每人每天 1.25 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达 6.62 亿，扶贫减贫成效非常显著。

2. 扶贫开发投入逐年加大。2014 年我国专项扶贫预算 433 亿元，2015 年 467 亿元，加上定点扶贫资金 300 亿元，财政直接投入达 700 多亿元。据 2015 年财政部预算，地方（省市县三级）的扶贫投入总计 1000 亿元。国家惠农政策总量达到每年 1.2 万亿元以上，年增量在 1000 亿元以上。

3. 精准扶贫重点工程进展顺利。当前，精准扶贫基本实现干部驻村帮扶全覆盖，持续开展“雨露计划”等教育扶贫工程，创新小额信贷模式，推进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探索整村推进、土地整治、股份合作等新模式；“建档立卡”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金融服务、社会扶贫、精准扶贫等机制得到创新和完善。

4. 片区扶贫工作取得较大进展。自 2011 年开始片区扶贫规划以来，预计“十二五”期末，交通、水利、能源等跨县重大扶贫项目开工率可达 80%，完工率可达 40%。2011 年—2013 年，片区减贫幅度由此前慢于全国 3.1 个百分点，提高到比全国平均水平快 1.6 个百分点；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三个百分点；消费支出年均增幅 13.5%，高于全平均水平两个百分点。

5. 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过渡。除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加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统计，2002 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处于 3:1 以上，2014 年首次下降到 2.92:1，但是绝对差距从 2001 年 4494 元上升到 18952 元，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从农村内部看，2000 年农村内部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

6.5 倍，2014 年扩大到 8.65 倍，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扩大。另外，2014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469，但在边疆贫困地区基尼系数较高，2014 年西藏农村达到 0.65，基尼系数的提高将使得贫困发生率上升。可见，目前我国已进入从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过渡的阶段。

（二）当前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扶贫对象规模依然庞大，扶贫减贫难度加大。一方面，按照 2300 元年收入 2010 年不变价的国家扶贫标准，到 2014 年底，我国依然有 7017 万人低于此项标准，贫困发生率为 7.2%，扶贫对象的规模庞大，扶贫工作依然艰巨。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减贫幅度出现明显下降，2010 年—2014 年减贫幅度从 26.1% 下降到 14.9%，减少了 11.2%，减贫幅度下降得非常明显，按照目前趋势未来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减贫步伐将会减缓。

2. 扶贫不精准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贫困人口识别难。受到农村资产信息和家庭统计不健全、指标限制及人为操控等原因，导致贫困户难选错选问题普遍存在。二是扶贫资金不到位。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数据，在其对 2009 年—2012 年贫困人口的“赤贫”“一般贫困”“边缘贫困”和“稳健脱贫”四个分组中，前三组收入增长率非常低，“赤贫”和“边缘贫困”组甚至为负增长，而低收入农村贫困人口获得的低保、医疗报销和扶贫资金也最少，说明最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口实际上得到补助最少。三是地方建设未能与精准扶贫有效结合。有些地方热衷于上大项目，偏好于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特别是贫困人口精准扶贫力度不够，未能实现将贫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机结合。四是对贫困人口返贫问题重视不够。据中科院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组对 124 个贫困村调查数据测算发现，近三年来贫困返贫率 12.9%，六盘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和秦巴山区返贫率分别高达 53.7%、36.7% 和 29.5%；山西、甘肃、河北返贫率分别到 67.2%、53.7% 和 35.7%，缺乏对扶贫人口的动态跟踪和返贫人口再入机制。

3. 扶贫开发与国家及区域性重大战略不衔接。一方面，“片区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不衔接。由于“片区规划”编制时各省区“十二五”规划均已编制完成，致使“片区规划”部分建设项目落实难度大，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大主体责任不明晰，协同程度不高，造成扶贫项目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执行难度较大，难以落实等问题。另一方面，扶贫规划与当前国家重大区域性战略存在结合不紧密、不衔接，未能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困地区发展滞后。

4. 基层扶贫机构不健全，扶贫治理机制亟待完善。一是基层机构不健全。目前，扶贫组织人员呈现“上级队伍强，下面队伍弱”局面，特别是乡、村两级缺乏专职、稳定的扶贫队伍，多数地区只有扶贫办一家机构具体负责扶贫工作，工作效能和协调力度较

弱，缺乏政府多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造成扶贫效率较低，扶贫政策执行不到位等情况。二是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组织型、管制型扶贫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当前，政府行政参与过多、制度化评估问责制不完善及扶贫市场机制缺失，导致扶贫资源难以整合且在传递过程中内耗较大，扶贫作用减弱，政府扶贫管理创新仍需加强。

（三）“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新形势

1. 扶贫开发战略新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经历改革经济体制方式减贫、开发式扶贫、攻坚式扶贫到 2010 年的基本贫困消除，2011 年进入同步小康发展扶贫阶段，扶贫目标由原来“保生存”向“保生态、促发展、惠民生”转变；扶贫模式亦由救济式扶贫、普惠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竞争式扶贫转变；扶贫区域也由单个行政区划转向跨行政区划的连片扶贫开发；扶贫工作总体呈现由“关注政策扶贫效果的国家导向”逐步朝着“注重外部环境改善的区域导向”直至“关注区域与贫困人口生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导向”的战略转变。

2. 经济新常态提出新挑战。一方面，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结构调整、产能压缩等将直接导致农村贫困人口就业收入增长难，减贫难度加大。另一方面，经济增速减缓，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也会放缓，即使不降低政府财政扶贫资金，参与扶贫的企业、社会等组织的扶贫投入也可能降低。另外，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差距加大、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等问题也对扶贫减贫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未来亟需构建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3. 农村贫困出现新特点。据《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2014）》研究成果显示，新时期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趋势；贫困结构复杂，致贫原因多样，并呈现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单维贫困到多维贫困、静态贫困到动态贫困、短期贫困到中长期贫困的新特点；需更加注重扶贫对象的需求，要准确把握致贫因素与扶贫对象发展意愿，实现有效的供需对接，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有效扶贫。

4. 扶贫开发提出新要求。在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等扶贫开发文件精神 and 总体要求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6 月提出的“四个切实”：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的要求，深入开展下一步扶贫开发工作，顺利实现扶贫开发总目标。遵循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结合”的基本方针：把片区攻坚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把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把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结合起来。

5. 扶贫开发需要新机制。根据 201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创新机

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的深化改革，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的总体要求，各地需要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在贫困县考核、精准扶贫、帮扶机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金融服务、社会参与等机制方面进行创新，以满足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要求。

6. 精准扶贫具备新手段。积极推进精准扶贫实施十大工程，包括干部驻村帮扶、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构树扶贫、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龙头企业带动，这十大工程将为精准扶贫奠定基础。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数据挖掘技术等新型技术手段为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提供的技术支撑，构建精准化、智慧化、动态化的精准扶贫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效率和质量。

二、“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思路、原则和目标

（一）“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总体思路

按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即将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五大发展理念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和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以及党政主要领导对扶贫工作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科学引领、扎实推进、精准施策，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在扶贫对象、扶贫方式和扶贫资源等方面精准发力；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构建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扶贫开发格局；对不同地区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理清扶贫攻坚工作的发展思路 and 重点；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推广普及科技扶贫和智力支持，提高和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扶贫开发工作体制机制，挖掘和释放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潜力；确保 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

（二）“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基本原则

1.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宏观政策引导作用，同时加大政府财政扶贫力度；要发挥社会各界的组织作用，创新社会参与机制，鼓励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开发工作，形成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扶贫攻坚工作格局。

2. 突出重点，精准扶贫。要注重“三最”，即最困难地区、最困难人口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及其致贫原因，运用科学有效方法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做到政策精准、目标精准、

责任精准、措施精准、监督精准、效果精准。

3. 统筹资源，形成合力。要整合扶贫办及其他政府部门资源，也要整合政府、各类社会机构和市场资源；整合统筹城乡资源，实现城乡各类扶贫资源的一体化；要强调财政、信贷、社会各方面的投入，把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全部动员整合起来；要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和各行业各系统资源，进行合理分工，形成强大的扶贫合力。

4. 简政放权，强化监督。中央和地方根据贫困因素进行工作分工、划分事权、明确责任，按照宏观的、群体的、生态型的、跨区域性的贫困，由中央统一协调管理，微观的、个体的、当地性的贫困，由地方政府负责。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应加大中央和省市、社会第三方机构对地方扶贫工作的考核评估和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5. 群众参与，完善机制。要高度重视和尊重贫困人口自身发展意愿，使得贫困人口在扶贫开发中充分行使知情权、主动权、选择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增强贫困人口脱贫的信心，引导贫困人口积极参与，从由上到下的被动式脱贫逐步向由下到上的主动式脱贫转变，激发和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的持续动力。

（三）“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总目标

坚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的总目标，总体上完成“两不愁、三保障”减贫目标，即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确保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脱贫；在完成总目标的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平均水平，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人均收入增长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和相对贫困扩大趋势，最终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三、“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重点工作

（一）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工程

将边远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连片特困区的贫困人口作为重点扶贫对象，其中应以 14 个连片特困区和其他重点县和贫困村为重中之重，在这些地区集中实施一批重大民生工程、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统筹做好整村推进、就业促进、产业扶贫、移民搬迁、定点扶贫等重点工作，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工程。

（二）深化完善区域性扶贫开发规划

加快深化完善区域性扶贫开发规划，将扶贫规划纳入国家和地区“十三五”经济社会总体规划、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一是加快编制和调整贫困地区发展规划。指导贫

困地区谋划一批“十三五”重大工程项目，组织编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十三五”升级实施规划，并积极将其纳入相关“十三五”行业专项规划。二是落实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加大扶贫力度。加快落实陕甘宁、赣闽粤、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全面贯彻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意见，研究出台并认真落实“十三五”扶贫开发超常规政策举措。三是以国家区域战略带动贫困地区发展。引导贫困地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和打造区域合作平台，引导相关发达地区产业优先向贫困地区转移，通过实施区域战略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三）加快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一是要完善建档立卡的制度性框架平台，精准识别贫困群体，精准分析致贫原因，精准制定帮扶措施；二是要实施精准化的分类级差管理，在建档立卡制度框架下，以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为基础，按照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标准，对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进行贫困程度分级分类管理，实行重点扶持、整体推进；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法、因户施策的扶贫方针，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以救济扶贫为主，全部由农村低保养起来；四是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采用小额贷款，发展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或采取外出务工增加收入；五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可采用生态移民扶贫措施实现精准施策。

（四）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既要坚持“输血”的必要条件，又要构建“造血”的功能，充分发挥贫困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升持续内生动力。根据各重点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人力资源状况，确定各片区优势特色和主导产业发展重点，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等，支持全产业链发展，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农特产品品牌，通过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产业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加快当地农村贫困人口的早日脱贫致富。

（五）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加快建设一批能够辐射带动贫困地区发展的骨干铁路、国家高速公路、水利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破解区域发展瓶颈，发挥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对贫困地区区域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支撑作用。将重大基础设施，包括水利工程、流域开发与治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矿山地质恢复等工程建设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通过工程建设促进扶贫。

（六）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社会公共事业

大力发展贫困地区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推进贫困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幅提高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包括：大力推进实施教育富民、教育移民、教育惠民工程，实现教育扶贫；加强在贫困地区科技推广，促进创业，推进科技扶贫；加快建设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

四、进一步创新完善扶贫开发体制机制

（一）创新完善扶贫开发管理及绩效考核机制

1. 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一是继续细化和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理清各级政府职责，明确其各自事和权，提升各级扶贫政府机构的执行力，确保扶贫政策能够落到实处；二是加强机构建设，建议将在中央层面建立独立的扶贫机构，列入国家行政机构系列，负责贫困地区的连片开发、分散型贫困户的精准扶贫和指导社会扶贫慈善公益组织的业务；在地方上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扶贫开发机构，理顺扶贫工作机制，增强扶贫开发机构的资源协调能力，推进扶贫工作水平的提高。

2. 进一步改革完善贫困县考核机制。正确处理三个关系，改革完善贫困县考核机制。一是贫困县短期减贫和长期发展目标的关系；二是处理好贫困县里面贫困人群和非贫困人群利益的关系；三是对贫困县考核的指标及权重如何处理好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考核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领导干部晋升考核管理体制下，绩效考核是领导干部在地区间流动和职务提升的一个依据，原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中心的考核办法要根据贫困地区的条件和任务来确定考核指标及权重，以鼓励和调动有能力、有志向的干部到贫困地区开创扶贫工作。按照“滴灌”模式扶贫，加快建立健全贫困县考核、约束和退出机制。进一步改革完善组织考核激励机制。一方面，要完善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大扶贫开发工作权重，对扶贫开发中做出实绩的干部要进行激励。另一方面，要制定贫困县扶贫攻坚和行业部门开发考核办法，按照办法对县和行业部门进行监督检查，进行考核。

（二）加快建立健全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

1. 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机制。一是要认真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和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管理机制，党政主要领导对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的责任制，合力分工，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层层落实的

责任制。二是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构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和精准管理的“四个精准”工作机制。三是推行简政放权，要推进实施“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相结合的扶贫机制，充分发挥扶贫对象及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完善精准扶贫识别与动态监测体系。制定具体化、明晰化、公开化贫困识别标准。在国家农村扶贫识别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县、本乡（镇）、本村实际，制定科学合理、操作性强、具体量化、动态的贫困户识别标准。所有参与扶贫信息采集程序公正化、标准化、规范化和透明化，以此保障扶贫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精准性。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结合目前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整合各方面的扶贫动态数据，包括扶贫主体、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等数据，加快构建基于“互联网+”的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扶贫特征变化、扶贫效果、扶贫趋势等，为精准扶贫的政策制定、管理方式、扶贫重点、举措等提供依据，进一步巩固建档立卡成果，实施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在扶贫方式、扶贫资源和扶贫考核上实现精准化。

3. 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贫举措。一是在区域层面加大贫困地区生产性、设施性建设项目精准投资；二是在县域和村镇层面，加大产业扶贫项目的统筹协调与精准指导，支持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发展；三是在个体层面，加大对重点贫困户精准扶贫和社会扶贫力度，通过以工代赈和救助兜底帮助一批贫困人口。

（三）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参与的扶贫新机制

1. 创新“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坚持和贯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的“三位一体”，即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工作格局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创新社会扶贫方式、拓展社会扶贫领域、强化社会扶贫地位。

2. 明确社会扶贫的主体关系。“十三五”时期，应坚持政府在扶贫开发工作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动员政府非专职扶贫机构部门、政府关联组织机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推进的扶贫开发格局。建立和完善政府引导，社会力量为主体广泛参与扶贫事业的扶贫工作格局。

3. 创新社会扶贫机制。一是完善社会参与扶贫的平台建设，积极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二是明确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的渠道，建立起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途径参与扶贫的渠道；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扶贫的制度保障，保障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及监督权利；四是加强社会参与扶贫的组织机构管理，完善社会扶贫主体内部的合作机制；五是建立和完善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六是建立和完善社会扶贫的考评激励机制。通过这些方面的机制建设，实现社会扶贫的

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4. 创新和完善社会扶贫资源整合机制。一是整合社会扶贫机构。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等各种扶贫机构资源，积极引导城乡、社会各界多方力量参与农村的扶贫开发建设，建立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机构参与的整合、协调、管理机制。二是构建各类要素整合机制。要整合项目资金资源，把住房改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扶贫项目和资金，打捆使用，做到分工合理、形成合力、高效利用。三是构建市场化的扶贫机制。发挥政府财政扶贫的引领和“撬动”作用，带动市场扶贫。

（四）创新和完善扶贫开发投融资机制

1. 创新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管理机制。一是实施扶贫资金分类使用和管理。对不同致贫原因的农户采用不同的扶贫措施，如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户用入股企业获得分红的形式得到保障，因病致贫的农户采用卫生、医疗扶贫等方式让其在患病期间达到正常生活水平，家里有老人的贫困农户需要养老保险和信贷支持。二是建立完善的要素与竞争相结合扶贫资金分配方式。积极探索重大扶贫专项、以奖代补等扶贫资金实行要素分配与竞争分配的有机结合的分配方式，在保证要素法分配资金占总资金 50% 以上的基础上，将产业扶贫和以奖代补等先建后补资金实行竞争性分配，以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2. 创新地方扶贫融资平台。可在有条件的地方成立市、县（区）扶贫开发投资公司试点，建立融资平台、担保平台、管理平台，整合各方资源，引进各方力量，加大政府、银行、企业合作，建立社会化融资扶贫开发新机制，形成“政府 + 企业 + 金融机构 + 农户”的融资体系。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逐步在贫困地区推广，解决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通过整合相关扶贫专项资金和贷款贴息等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作用，撬动金融信贷资金，吸纳民间资金，破解融资瓶颈。

3. 创新扶贫投融资新模式。探索建立多种产业链融资模式，撬动企业资金和民间资金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建设领域。如“银行 + 融资平台 + 企业 + 农户”模式、“银行 + 龙头企业 + 农户”模式、“扶贫项目 + 企业（专业合作社） + 农户”模式、“扶贫互助社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模式等。

4. 探索建立资产扶贫机制。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引导贫困村将集体资产、贫困户将承包土地和个人财产入股，采取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确保贫困村和贫困户多渠道增收；探索投资收益扶贫模式，将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量化给贫困户，将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村或农民合作社形成的资产划出一部分，采取优先股的方式量化到贫困户，实行贫困户收益保底、按股分红；探索理财收益扶贫模式，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将无指定用途的扶贫捐资或安排到户的扶贫资金，采取委托经营方式，帮

助其获得理财收益、分红收入。

（五）构建统筹城乡资源的一体化扶贫开发机制

一是统筹城乡人力资源要素，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推动城乡培训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劳动力素质，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增强贫困人口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二是统筹城乡扶贫资源，提高扶贫资源使用效率。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多予少取”的基本方针，推进实施各项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引导城镇扶贫资源向贫困农村的高效转移和使用。三是统筹城乡公共资源，保障扶贫人口公共服务。构建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等在内的各项救助措施，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

（六）构建统筹经济、社会和生态资源的扶贫开发机制

一是加快经济、社会和生态资源融合扶贫机制。根据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资源发展特点和优势，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优势产业，对国家投资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贫困地区的配套资金，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二是树立生态型扶贫理念，实施生态扶贫战略。在扶贫开发中树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倡导生态循环经济新模式，走“低投入与高产出、低能耗与高效益、低排放与高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增长与生态恶化、环境破坏与贫困加剧的矛盾。

五、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政策支持力度

（一）建立健全扶贫开发的法律制度

扶贫法律制度薄弱和存在缺失，应在目前相关法律制度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国家反贫困法”或“中国扶贫法”，通过法律刚性约束规范政府和社会各界扶贫开发行为，使扶贫开发治理走上法制轨道。通过法律明确贫困主体，各级政府和各类机构等扶贫主体的地位、责任、权利和义务，规范组织管理、资金使用、监督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二）加大财政对扶贫开发支持力度

1. 采用多样化财政支持方式。创新金融服务机制，改进扶贫资金管理方式，从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上破题，建立新机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要通过把财政直接补贴的项目资金更多转变为政策性贴息、担保资金和风险补偿基金的方式，撬动金融资金投放；强化覆盖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便利化特惠财政政策措施；将农村危房改造、生态保护等方面资金与专项资金整合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

式，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支持农村发展资金互助合作，实施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推广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模式。

2. 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资金投入。国家要进一步增加对贫困地区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各有关方面在安排年度投资计划时，继续向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倾斜，重点支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扶贫开发等领域建设。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公益项目中央投资的支持力度，提高补助标准。金融机构要优先安排扶贫开发示范项目的优惠贷款，发挥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支持贫困地区加快脱贫致富。鼓励和引导中央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贫困地区发展建设，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以动员全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扶贫开发事业。

（三）加大金融对扶贫开发支持力度

1. 引导多种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工作。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推行定向精准滴灌的普惠式扶贫金融；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用于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实施设立扶贫优惠贷款政策，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就业创业。

2. 加大对农户小额信贷力度。在省级层面协调增加对支农信贷规模，建立农村动产（如营用车辆）、固定资产（如宅基地、房产）、联户（三户以上）及诚信担保等多种形式的贷款担保机制，取消农民贷款五万元以上必须要国家正式职工担保制度，降低农民贷款门槛，并将贷款期限从一年延长至三年，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浮不超过 40%，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农民发展致富产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四）加大科技对扶贫开发支持力度

1. 加强对贫困地区教育培训工作，推进智力扶贫。扶贫先扶智，建立少年儿童接受教育、青壮年通过培训提高多渠道就业能力的扎实通道，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民的培训支持力度，不断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技术水平、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依托贫困地区农技推广系统力量，通过举办培训班，签署科技合作协议，组织专家咨询等，将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促进产业化发展。使贫困地区的从业人员至少掌握一门适用的生产技能，增强自身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能力，发挥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的潜能。

2. 加强在贫困地区科技推广，推进科技扶贫。农村贫困地区主要从事农林牧业生产，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要组织和发挥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大型企业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力量，发挥科技扶贫优势和贫困地区对口部门研究培育推广适合当地发展的优良农林牧业良种。推广先进的种养植技术，普及效益好的种养殖项目，增加贫困农村人口的收入。

（五）建立和完善扶贫开发组织保障

进一步完善项目资金监管、贫困县考核、基层组织建设和扶贫攻坚重大事项推进工作机制建设，全面落实国家贫困县退出机制，搭建定点扶贫、对口扶贫、集团扶贫、企业扶贫等社会参与平台，多渠道、全方位引导各类组织参与扶贫开发，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便捷通道，建立社会扶贫网络“直通车”，实现援助人与求助人点对点精准帮扶。

（六）加强扶贫开发国际交流与合作

争取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援助性扶贫项目。适当增加配套资金比例，对地方财政确有困难的可以全额配套。要根据贫困地区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对外援项目的管理，努力提高外援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增强还贷能力。通过多种渠道、不同方式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扶贫开发的帮助和支持。加强与国际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里的交流，借鉴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方面创造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开发的工作水平和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新常态背景下扶贫工作经验总结及顶层设计的讨论》，《“三农”决策要参》2015年第6期。
2.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关于扶贫开发的几个问题》，《“三农”决策要参》2015年第7期。
3. 课题组：《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4. 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编：《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2015：市场主体参与扶贫专题》，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2014）：社会扶贫专题》，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 徐勇：《反贫困在行动：中国农村扶贫调查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7. 陆汉文、曹洪民：《扶贫开发历史机遇期与战略创新》，《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
8. 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农村经济》2014年第6期。
9. 张伟宾、汪三贵：《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
10. 韩嘉玲、孙若梅、普红雁等：《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1. 赵武、王姣玥：《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2期。

责任编辑：艾 冰

关于金融支持黑龙江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宋 海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老国有工业企业由于没有及时转轨等历史原因，出现了发展滞后的局面。这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是金融的支持无疑是帮助企业解困和升级转制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加快剥离黑龙江银行不良资产、调整融资结构，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等都是从黑龙江的实际出发，对黑龙江老工业企业转制和升级提供金融支持的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金融支持 老国有工业企业 转制升级 路径

作者简介：宋海，中国民建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和历史上的工业积淀造就了黑龙江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和自身体制转轨滞后等因素的影响，黑龙江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发展差距逐步拉大。这既有长期的问题，也有短期的问题；既有机制的问题，也有结构的问题；既有财政支持的问题，也有金融支持的问题。笔者仅从金融角度谈一下如何支持黑龙江工业转型升级。

一、加快剥离黑龙江银行机构不良资产， 加大对不良资产核销力度，支持深化国企改革

（一）参照国家剥离工、农、中、建银行不良资产的做法，成立黑龙江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实质性解决黑龙江老工业企业不良贷款包袱巨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一，成立国有黑龙江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和集中处置不良资产。由中央政府与省政府对黑龙江老工业基地国有商业银行实施第二次不良资产的剥离，建议由政府组建黑龙江资产管理公司，将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在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处置。借鉴国外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经验作法，对不良资产进行打包折价出售。通过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有效化解历史包袱。第二，在黑龙江试行以银行为主的债务重组制度，赋予银行通过减息、免息、债务折扣、打包出售、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来化解不良资产的权力，提高银行自身的积极性。第三，国家财政向黑龙江倾斜，提高黑龙江省辖区的商业银行的呆账核销比例，加大对不良资产核销的支持力度。让黑龙江银行轻装上阵，全力支持工业转型升级。第四，对因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不良贷款，要采取由中央和省以及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运用司法手段、还本减免利息、资产置换、兼并重组、具备“三有”条件的企业制定还本付息计划后继续给予信贷支持等方式解决。第五，对于因地方政府干预形成的“两呆”贷款，建议省、市、县三级政府建立处置不良贷款领导小组，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各级政府拿出部分财力核销一块，制定相关财政政策盘活一块，通过资产重组和置换化解一块等措施逐步化解。第六，建立新不良贷款防控机制，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贷款。同时，加大对逃废银行债务的打击力度，建立以地方政府为核心、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各商业银行共同参与、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信用维护体系，打造“黑龙江金融安全区”。

（二）组建黑龙江振兴银行，从根本上解决黑龙江老工业基地升级的金融支持瓶颈问题

当前黑龙江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主要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一种总分行制管理结构，这种总分行制的商业银行往往由于黑龙江的投资收益率低，总行一般将资金投向收益率较高的地区，很难给黑龙江多划拨资金，不利于黑龙江经济的发展。组建黑龙江振兴银行，可以有效地扭转这种局面。第一，黑龙江振兴银行应定为国家控股的政策性银行，其宗旨是支持黑龙江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其资金来源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并广泛吸收社会资本。第二，黑龙江振兴银行的营业范围近期内应首先为黑龙江服务，待资金规模、经营管理、服务能力达到较

高水平后再扩展到东北地区。黑龙江振兴银行应重点支持黑龙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对公路、铁路、机场及城市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黑龙江的投资环境；支持黑龙江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带动黑龙江整体经济发展。第三，设立的黑龙江振兴银行其运行模式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政府不能干预其具体的经营业务，否则黑龙江振兴银行不仅不能起到支持黑龙江振兴的作用，而且还可能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危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第四，黑龙江振兴银行应在国内一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吸收存款，并绝对用在本地区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方面。通过将分支机构设立在国内一线城市，可吸收发达地区储蓄资源，迅速扩大黑龙江金融支持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实力。

（三）对黑龙江银行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金融政策，解决银行可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黑龙江老工业基地产业升级对资金的超长需求以及经济欠发达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当前实行的高度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导致黑龙江省货币资金配置的失衡并不断扩大与全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差距。这种差距靠黑龙江本省无法弥补。因此，应充分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对黑龙江实行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政策确保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顺利进行。第一，降低黑龙江老工业基地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适当降低黑龙江地区设立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本金、营运规模上的要求，促进黑龙江老工业基地各类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改善金融市场格局。第二，对流入黑龙江地区的投入到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资金给予利息补贴，通过降低投资成本来达到吸引区域外的资本目的。第三，实行倾斜的利率政策。进一步扩大黑龙江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使利率水平更好地反映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提高金融机构投放贷款的积极性。第四，实行倾斜的信贷投向政策。国家应规划出振兴黑龙江的专项贷款，支持黑龙江老工业基地大型项目开发，投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资源枯竭型城市接续产业的发展。第五，适当降低黑龙江地区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商业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进而实现资金配置区域结构的适度平衡，扩大黑龙江可用资金的规模。第六，进一步完善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对黑龙江地区的信贷投资优惠政策，使黑龙江地区能够享受国家政策性支持。

（四）充分发挥国有银行专项贷款功能，支持老工业基地产业升级

第一，各总行应为黑龙江省各分行开办老工业基地升级的专项贷款，支持老工业企业技术升级换代的资金缺口。并且保证专款专用，保证正规银行渠道的资金充实可靠。第二，各总行应增加对黑龙江分行的科技信贷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现代企

业的本质就是创新，而加强、培育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离不开银行的信贷投入。对企业研制开发的具有高技术水平、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容量、高关联度与牵动力大等特点的科技项目以及技术改造项目，对于符合贷款条件，并能够提供合法可靠担保的贷款，应优先予以发放，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第三，开办老工业基地专项转制贷款，支持企业改组。在黑龙江老工业企业自身实力并不很强的情况下，通过收购行为来实现转制较为困难。因此，各商业银行总行通过黑龙江分支行可发放一种特种贷款，专门用于弥补优势企业兼并或收购其他企业产权所需资金之不足。并通过黑龙江商业银行的信贷杠杆和纽带作用，为企业间的联合、兼并和收购牵线搭桥，大力支持企业集团的组建和发展。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助黑龙江老工业企业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第四，黑龙江老工业基地国有商业银行要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坚决从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和低信用等级的客户中退出来。加大对基础产业、公共事业、高科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实现信贷资产向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的集中。第五，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振兴黑龙江老工业基地。国家开发银行应进一步加大对黑龙江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制造业、能源、交通领域的支持力度。进出口银行要加大对东北地区以装备制造工业为主的产品的支持力度，进出口银行的专项信贷资金应对黑龙江倾斜，在保证资产质量的前提下，优先满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大企业、大项目融资需求。

二、加快融资结构调整，实现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做大做强黑龙江金融实力

（一）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不断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当前，黑龙江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发展直接融资、改善融资结构，可以缓解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体系的局面，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上市渠道是解决黑龙江金融体系缺陷的根本途径。第一，充分挖掘上市资源，明确重点培育企业，加强培育辅导，使更多的企业尽早具备上市条件，在项目安排和落实相关扶持政策措施等方面优先考虑完成上市辅导或已经申报发行的企业，促进后备资源中的大中型企业、高科技中小企业尽快在主板和中小板上市。第二，支持鼓动产业龙头上市公司通过资产置换、股权收购、债务重组等途径，整合行业有效资源，提高技术等级，扩大市场规模，实现产业升级和跨越发展，实现低成本扩张和做大做强，推进上市公司重组和再融资。第三，鼓励和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充分利用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券融资工具，增加直接融资规模，探索开展中小企业集合债

券、集合短期融资券业务。第四，大力开展融资融券等各类创新业务，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资产支持信托等直接融资型创新业务，积极拓展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股权投资、企业重组的信托计划。第五，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给予黑龙江政策倾斜，帮助建立创业板、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长期票据市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

（二）加快实现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改变黑龙江金融过于集中在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展相对薄弱的状况

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是金融发展的必然内涵，也是实现金融工具多样化的前提。第一，采取“市场+行政”的办法在现有城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吸收民间和国外资本，组建一至两家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新组建的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应该设定为黑龙江老工业基地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第二，组建、改造、合并黑龙江综合性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发挥它们在促进资产重组、企业收购兼并、上市融资和提高中小企业信用等级方面的作用。第三，积极组建民营银行和小贷公司，吸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积极为社区提供服务。第四，加大吸引国内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落户黑龙江的力度，提供有关优惠政策。利用沿边优势特别要大力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过少，给吸引外资带来困难。建议降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门槛，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使外资金融机构成为支持黑龙江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最终形成多元化的黑龙江金融机构体系。

（三）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黑龙江金融领域，加快发展多层次金融体系

第一，突破投资主体不足这一“瓶颈”，培育一批合格的项目投资主体。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让他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形成一批合格的投资主体；提倡全民创业，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兴业，形成一批新的合格的项目投资主体。培育合格的投资主体，关键是要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第二，解决“融资难”，应尽快破除体制上的障碍，建立融资担保系统，建立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服务体系。同时，抓紧建立项目库、人才库、创业辅导、筹融资等中介服务组织。第三，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当前，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主渠道。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的担保、抵押贷款为主，银行提供的其他金融产品较少。针对目前企业融资过分依赖金融机构间接融资的特点，应着力发展资本市场，引导支持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开辟多种形式的融资、筹资渠道，实现企业融资多元化。大力发展民间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第四，对有一定规模、有技术、有盈利能力的

民营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降低入市门槛，允许进入现有股票市场，还可以发行公司债券。第五，大力发展黑龙江金融租赁机制。金融租赁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企业利用金融租赁可以很快获得急需的先进设备，而且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很适合企业技术改造投资。今后应考虑在经济基础相对比较好、市场需求比较广阔、人才相对集中的城市设立金融租赁公司，充分发挥金融租赁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第六，拓宽信托融资渠道。应充分发挥信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功能，引导居民储蓄向信托资产转化，减轻储蓄和信贷集中于银行的压力。灵活运用资金信托、委托贷款等创新业务，吸引社会民间资本、个人资金向欠发达地区投入，重点投向重点工业项目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利用信托机构的资本优势，通过参股、控股方式参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造，增强中小金融机构资本金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消化风险的能力，增强其信贷投入能力。第七，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首先是构筑和发展多种多样的信用担保体系。可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出资，同时允许民间资金参与，组建民营性质和股份制形式的担保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为民营企业获得贷款提供担保。支持组建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为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服务。第八，多渠道开辟担保机构的基金来源。在地方财政提供启动资金的基础上，担保基金应广泛募集，如企业的会员费、准备金、担保机构的经营收入等都可作为担保基金的来源，以增强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

（四）借鉴美国社区投资管理的做法，彻底改变社区或城市内银行和存款信贷机构由于风险原因，歧视低收入地区，拒绝给其发放贷款的做法

1974年美国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明确参加保险的联邦银行和存款机构必须帮助满足其营业所所在整个社区的信贷需求和便利，包括中低收入居民的信贷需求。要求金融机构定期公布满足其所在社区信贷需求的记录，并且监管机构在其申请总行迁移、建立或迁移分支机构、申请收购其他机构，转换全国性特许银行和向存款保险公司申请存款保险时，将该机构满足社区信贷需求的业绩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黑龙江老工业基础投资收益率较沿海发达地区低，很多存款金融机构从这一地区吸收存款后拆借到沿海地区，导致本地区资金缺乏。中央政府应根据国外经验制定相应法律，用行政手段对该地区非法人类金融机构（国有银行基层分支机构——二级分行和县支行）的存贷比例、上存资金比例或增量部分的存贷比例做出限制，保证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当地，缓解黑龙江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资金约束。

三、加大黑龙江金融自身创新力度， 通过金融创新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一）加快黑龙江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创新

黑龙江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提出的金融服务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和支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黑龙江金融业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进一步完善内部的管理控制制度。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监督下的行长负责制。切实强化内部稽核与监督机制、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制度、贷款审贷分离和贷款担保抵押制度、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责任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实现银行内部决策和业务经营的程序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当前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克服金融机构内部存在的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提高内部控制制度的权威性，增强全体员工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贯彻执行内部管理制度的自觉性。第二，创新金融服务与金融信贷产品，优化信贷投向结构，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不良资产包袱的有效化解为商业银行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商业银行要坚决从生产能力过剩、经营效率不高、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低信用等级客户中退出来。借助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时机，加大对基础产业、公共事业、高科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提高信贷资产向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的集中程度，全面提升贷款的质量和盈利水平。第三，为扶持黑龙江老工业基地改造和升级，应加大信贷创新力度。建议除了定期贷款以外，可以试行在英美国家通行的透支和贷款承诺的授信方式。透支和授信贷款实际上是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一种远期合约，有助于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并能加强放贷后的事后监督。

（二）加强引导金融资源继续支持传统优势产业

第一，通过开展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金融创新，加快传统优势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弥补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短板。优先满足符合国家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项目融资需求，通过创新融资模式、改进管理制度、提升金融服务等方式，努力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难题。重点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开展产品创新，大力推行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质押、收益权质押等融资模式。第二，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建设。建议有关部门继续鼓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力度，同时积极推动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

支持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第三，帮助中小企业规范管理，优化黑龙江发展的经济环境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为培育优质客户源，降低信贷风险，树立市场品牌，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在帮助中小企业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对其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应完善和加强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降低经营风险。通过发放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担保贷款，使中小企业信用提升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信用等级。通过大力发展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备付信用证质押贷款、打包贷款、进出口押汇贷款等信贷业务，将中小企业信用提升到银行的信用等级。

（三）进一步优化黑龙江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

第一，加快建立政策性、商业性、行业性、互助性等多元化担保体系，进一步完善担保基金的筹集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与黑龙江省内担保机构开展授信再担保、增信再担保、联保再担保和异地互保再担保等再担保业务，增强各类担保机构融资担保能力，分散和控制信用担保系统风险。第二，改进和提高行政司法水平，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提高金融案件的结案率，加大处置银行不良贷款的执行力度，切实维护银行的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艾 冰

· 宏观经济 ·

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创新驱动^{*}

戴桂英 张 瑾

摘要：加强人力资本投入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实现中国梦的根本要求，人力资本投入区别于其他资本投入，具有投资收益的滞后性和长期性、倍增效应、边际收益递增效应、风险性。目前，人力资本投入总量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大，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不合理，人才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人力资本投入的体制机制亟需完善。建议多渠道吸引人力资本投入，扩大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加大力度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缩小人力资本投入城乡和区域差距；将贫困地区营养干预工作建成民生工程；公平地分配精神健康服务；国家财政拨出专项经费，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改革县以上领导班子考核机制，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入统计体系；深化人力资本投入体制机制改革。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 创新驱动 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戴桂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党委副书记；

张 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当今和未来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我国要实现创新驱动战略和中国梦，特别是要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关键是努力建设一支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才和其他战线的各类人才在内的规模宏大的高素质

^{*} 本文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我国人力资本投入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才队伍，而人才队伍建设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力资本规模的扩大和效益产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是指花费在教育、医疗保健卫生、在职培训以及为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进行迁移流动上的投资。目前，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可应对人口红利减弱风险，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强化人力资本投入是新常态的时代要求。我国在人力资本投资上和国际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优化人力资本投入结构要素，注重培养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和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大计。目前，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探讨和研究新常态背景下人力资本投入的规模和结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对实现我国创新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

经济学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他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据他的分析，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金投入，主要是通过教育、卫生保健和劳动力流动的投资形成的，而其中教育投资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形成途径。其核心观点可归纳为：一是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身体之内，表现为人的健康、体力、知识、技能、经验和精神等，也就是人的综合素质；二是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较来看，人力资本是相对稀缺的资源，特别是企业家型的人才十分珍贵的；三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于教育、健康等而形成的资本，这种投资支出是生产性的；四是人力资本像一切资本一样应当获得回报，这种回报随着时间的积累，社会 and 个人的经济价值提高是一种趋势；五是人力资本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他带来的价值是倍增的。人力资本投入区别于其他资本投入，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滞后性和长期性

对人力资源最初的投资是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见到效益，正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需要16~17年，如果继续读硕士和博士，累计需要22~23年左右，这期间需要大量人力资本投入，获得的回报在就业后才能体现出来，这就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滞后性的特点。但是，人力资本一旦形成产出，就能体现受益的活力和获益的长期性，因为人力资本能够长期使用，持续不断创造产品和效益。

（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倍增效应

人力资源投资能够促进人力资源载体的知识和技能的增长，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增加人力资本存量。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在 1900 年—1957 年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投资收益进行详细调查和计算，发现在这段时期的人力资源投资收益率是物质资源投资收益率的五倍。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与物质资本的投资相比，人力资本投入具有倍增的效益。

（三）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具有递增效应

在没有技术创新的前提下物质资本投资有收益递减规律，比如，经济学家发现了土地肥力递减的趋势。唯独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却具有收益递增效应，即在人力资本上投入得越多，经过一段特定的时期后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也将越多，这将克服其它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

（四）人力资本投资具有独特的风险性

人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与物质资本投入一样，人力资本投资面临着各种风险，变化大、可控性差。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较大，主要的风险有人力资本投资对象选择风险、人职匹配风险、激励政策风险、人事变动风险、人才流失风险、职业安全与健康风险等。

（五）人力资本投资既是消费行为又是投资行为

从消费行为来看，人力资本投资是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消费活动。从投资行为来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表现为个人收入增加、企业利润提高和政府经济实力增强，同时表现为人自身能力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增加和社会进步等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在技术进步、技能需求增加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可提高劳动者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本文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是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凡是能够提高劳动者个人的知识、技能、健康和素质等的支出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范畴。教育投资是劳动者的教育总投资成本，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核心组成部分和最基本要素。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学习相关技能有利于生产水平提高，在现代社会在职培训可更有效地提高员工素质和能力。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提高居民平均寿命，降低疾病发生率，提高治愈率，改善劳动者精力和体力，扩大劳动者产出水平。迁移投资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组成部分，从本地迁移到其

它地区所付出的成本是人力资本迁移投资。劳动者合理迁移能增加迁入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提升劳动者个人的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

二、我国人力资本投入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本投入规模不断加大，投资结构得到优化，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能创新的高素质人才，特别是科研队伍总体规模不断壮大。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具有可以使得资本和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得到提高的作用，并且其所具有的外部性作用远远超过了人力资本存量本身。但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我国经济增长目前仍然是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既存在总量不足，也存在结构上的矛盾，人力资本投入严重滞后物质资本投入，导致我国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还需加强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一）人力资本投入总量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大

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注重物质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两者差距尽管有缩小的趋势，但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差距。

第一，教育投入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 2012 年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为 4.28%，但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世界各国在 2000 年实现教育支出 GDP 占比达到 6% 的目标，我国离这一目标还有不小差距。由于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导致学生缴纳学费过高，这是制约我国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居民教育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高中阶段学费在国际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2010 年我国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 24%，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67%，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 32%。

第二，人均卫生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处于国际较高水平，据《世界卫生统计 2015》的数据，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 54.3%，在 195 个成员国排名第 36 位，处于较高水平，但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在 195 个成员国中均排名第 115 位。精神健康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心理应激因素日益增加，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逐年增多。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且分布不均，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我国现有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及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要。据有关方面公布的数据，截

至 2014 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到 429.7 万例^①，但精神科床位只有 22.8 万张，平均每万人口 1.71 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约 4.3 张；精神科医生数量有两万多名，平均每十万个患者有 1.49 名精神科医生，全国还有 2/3 的县区没有精神卫生机构。贫困地区儿童和中小学生营养方面。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堪忧，政府投入资金缺口大。例如，目前在贫困地区农村，需要营养补充的儿童有 430 万人，受益的儿童仅有 137 万人，还有 293 万儿童没有食用“营养包”。若要让所有贫困地区婴童食用“营养包”，财政总投资需 16 亿元，还有 11 亿元的资金缺口。

第三，在职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投入少。在职培训经费投入少，虽然从时间上来看，我国培训投入的费用和培训人数呈现增长趋势，但从培训费用和培训参与的比例来看，培训总投入仍然不高。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和一般性培训主要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支付费用，与工作无关的一般技能培训则主要由参与培训的个人支付，雇主支付比例都较低。员工的频繁流动使得企业无法从培训投入中获得很好的回报，企业会选择提供更少培训投入。技能提升培训少，我国培训投入的结构中，以就业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所占比例不高。与发达国家不同，培训在我国更多是为了弥补基本生产能力的不足，而不是提高生产力。据对浙江制造业企业的调查发现，技能水平和职位等级高的员工能获得大量的培训投资，处于企业生产和技术部门的一般员工获得的培训投资显著偏低，当前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很好地促进低技能员工向高技能员工的转变，也不利于改善企业内部的技能分布格局。

（二）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人力资源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人力资本投入结构的突出问题是，人力资本投资城乡和区域差距大，职业教育投入、健康投入、人才流动投入较低。

第一，人力资本向贫困地区投资偏少，导致地区、城乡差距大。一是城乡投入随着教育水平分布差别的扩大而扩大，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据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2014》显示，我国人均人力资本城乡间的差距日益增大。1985 年—2010 年，农村人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3.31%，城镇高达 9.21%；1997 年—2010 年在城乡增长均加快的背景下，差距更为明显，农村年均增长率为 5.99%，而城镇年均增长率 14.2%。二是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衡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1978 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 GDP 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

^①胡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登记在册 429.7 万例》，《华商报》2015 年 10 月 10 日，http://news.ifeng.com/a/20151010/44805915_0.shtml。

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 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 GDP 比是 1.8:1.18:1; 2012 年仍维持在 1.72:1.07:1。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分布的差异,西部地区人力资源总量、人口文化教育构成、劳动力培训、劳动生产率等指标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和劳动生产率都差距巨大,也使得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不能与经济大开发相适应。以教育为例,2000 年和 2010 年,中西部的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都要低于东部地区,但和 2000 年相比,2010 年中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在缩小。2010 年,中部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相当于东部的 72.14%,西部相当于东部的 91.37%,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东中西差异在缩小,但是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教育经费的差距仍然存在,并且中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劣势更加明显。三是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少且效益差。据中组部统计,2013 年西部 12 个省(区、市)人力资本投入占 GDP 比例 17%,总量为 975 亿元,比全国平均 1526 亿元每年少 500 亿元。人才发挥作用不够,人才的贡献率为 16.89%,比全国 28% 的平均水平少 11 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投入少,致使人才流失现象严重,西部地区流出人才质量明显高于流入人才,西部地区流失的人才中大多是专业技术骨干或有较强能力的领导人才,通过各类途径引进的则大多是毕业生,基本都属于就业性人才,这种“强出弱进”现象加剧了人才缺乏的局面。

第二,职业教育相对落后。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不仅需要高端技术型人才,更需要中低端职业技能人才。但当前的突出表现是职业教育市场需求大、投入少。一是高等职业教育投入过低,2007 年—2011 年全国教育部门及其他机构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数据显示,高职高专教育支出在普通高等教育支出中占比较低,不足 20%,2011 年高职高专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只有本科生均支出的一半。二是中等职业教育投入下降且学生规模小,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占比下降,从 1997 年的 11.6% 缓慢下降到 2006 年的不足 6%,在后续年份较为稳定地维持在 6%~7% 之间。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均经费支出高于普通高中,但其在在校生规模在 2005 年—2013 年始终是小于普通高中,中职在校生数量持续下降。

第三,健康投入重治疗轻预防,重生理健康轻心理健康。一是重大医院轻基层社区医疗,在政府的经费投入中,大医院所占比重较高。由于基层社区医疗条件较差,广大人民愈加“信任”和“崇拜”大型医院,一些小病、轻病患者也都集中于大型医院,出现“轻病患者看病难,重病患者难看病”的现象。我国在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并非哪里匮乏就补哪,是按照医疗机构床位数、人头数进行补助,造成了大医院资金多的分配格局。一些具有更大社会效益的预防保健活动,却因资源短缺而无法正常工作。二是健康投入重治疗轻预防,事先预防比事后治疗成本小但收益大,而据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小组的

划分和测算，目前我国卫生投入主要流向医院，流向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费用微乎其微。三是卫生投入重城市轻乡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03 年—2013 年，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和社会卫生投入所占的比重下降，而农民个人直接支出费用所占的比重上升。由于公共卫生和医疗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扩大，我国农村的各项公共卫生指标都远低于国际标准。2013 年占全国 46.3% 的农村居民只拥有 1/4 的卫生总费用，占人口 53.7% 的城镇居民享有 3/4 的卫生总费用。四是卫生投入重生理健康轻心理健康。从心理健康看，国家和单位对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城市白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的严重性重视不够。五是高危职业人群心理障碍问题严重，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抑郁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心理健康调查显示，50% 以上高危职业人群存在抑郁状态。具有心理障碍的人群对国家、社会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甚至是灾难，2015 年 3 月 24 日德国之翼航空公司 4U9525 航班坠机事件副驾驶卢比茨因为患有严重抑郁症“蓄意”坠机，造成 150 人死亡，震惊德国各界。六是城市白领心理压力巨大，处亚健康状态。据《中国城市白领精英人群健康报告》数据分析，主流城市白领亚健康比例达 76%，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极低（不到 3%），35~50 岁的高收入人群中，城市白领“生理年龄”提前衰老十年。七是留守儿童心理关爱投入缺失。根据《中国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 6102.55 万，占农村儿童 37.7%，占全国儿童 21.88%。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与父母分隔，孩子的情感交流、人际关系、人格发展、思想道德会出现严重障碍。例如，2015 年 6 月 10 日贵州毕节市四名留守儿童家中喝农药集体自杀，最大的哥哥 13 岁，最小的妹妹五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极端事件，但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留守儿童长期缺乏心理关爱，将对未来人才队伍和社会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三）人才政策实施过程中带来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先后颁布和实施一系列人才队伍建设政策和规划，促进了人才队伍发展，但各部门、各地区在实施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现行人才队伍建设投资和培养计划存在多头并进、缺乏统一管理、重复资助少数精英、忽略国家科技人员的梯次形成等弊端。从实施效果看，我国大多人才计划和工程已成为行政化衍生的“学官”待遇。各种人才计划和工程主要遴选于有限名校、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和国家重要研究机构，即便是获得“计划”的少数精英，大都是一人多冠，被各种人才计划和工程重复、重叠赠予，成为世界学术上少有的行政待遇。例如，2012 年首批入选的前 15 人“万人计划”人才清单中，就有 13 人是各种“荣誉头衔”集

于一身的，这些人获得多项大额重复资助，各种人才“计划”资源惠及面极为有限。作为体现对人才重视的各种人才计划和工程已经引起科技教育界学者的不满。

第二，各种投入、待遇、名誉是终身制，不利于人才良性循环发展。人才计划和工程给予的各种待遇、名誉是终身制，入选者入选后容易丧失创新动机和发展能力，也长期把持“计划”资源却庸碌无为，这不仅造成了国家有限支持财力的低效投入，也不利于人才良性循环发展，形成人才发展通道上的“库伦阻塞”现象，忽略国家科技人员的梯次形成。

第三，运行机制影响实施效果和质量。主要体现在遴选手段方面，正在实施中的各种人才计划和工程没有统一公开有效的信息技术系统的支持，难以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的人才遴选计划缺少国家层面的公开的网络人才库和履历表，使各种“计划和工程”的公信力和持续性没有保障。在公信力方面，目前人才计划和工程实施过程中行政机构干预过多，同行专家评议机制不完善，遴选结果缺少公信力。在评议机制方面，在现有人才计划和工程实施过程中缺少有效的评价机制。目前的学术评价中还存在着很大的非学术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长官意志等因素，人才评价缺乏权威性。

第四，注重短期效应，缺少战略发展远见。各种人才计划相继出台，看似对学术界的投入加大了，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却大多事与愿违，各类人才工程使教授多了、博导多了，但科研人员素质和学术水平并没有大幅提高，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第五，缺少人才心理素质的培养。人才也是社会人，身处的环境瞬息万变，除了要在工作中加倍努力，还面对各种复杂的人事纠纷、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婚姻的矛盾等，很多人出现了极度担忧、紧张、急躁、焦虑、痛苦、恐惧、幻想等心理障碍，甚至变为精神方面的疾病，严重影响了人才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还使国家的大量人才投资付之东流。

（四）人力资本投入的体制机制亟需完善

第一，科研投入“见物不见人”。我国财政拨款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制度中规定，课题组成员不能拿劳务费，劳务费只能支付给课题组之外临时聘请的科研人员，劳务费比例也很低。科研经费使用存在“见物不见人”现象，设备采购费用的预算比例过高，造成了大量资金浪费。科研领域内流传着一句戏言：“近十年中国科技高投入的最大受益者是安捷伦。”安捷伦是生产科研仪器的外资企业，我国科研单位买了大量该公司产品，其中一部分是为了花掉经费而买，项目结题前突击购买仪器的现象非常突出。近年来，随着科学化、精细化财政管理制度的推行，科技经费管理似乎越来越强调资金的规范使用，

在开展研究之前必须明确列出各项目费用的支出比例，要严格按照预算支出执行，忽视了科技工作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经费的灵活使用需求，使科技经费无法发挥正常效益。

第二，科研人员激励机制待完善。科技研究是知识密集型工作，人的智力成本是项目成本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前我国高校教师、科研院所人员的工资性收入相对偏低，与证券、金融、计算机等行业相距甚远。在工资性收入偏低，同时科研活动无法得到有效劳务补偿的情况下，部分科研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采取各种手法绕着弯报销，以各种名目从项目经费中“套”出人头费，补贴给项目组成员。

第三，教育的对外开放程度低。根据中国教育在线与教育优选联合发布的《2015 年出国留学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从 1978 年到 2014 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351.84 万人。我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学生流动中的主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读本科以下人数猛增，出现低龄化趋势。家长希望学生能尽早接受优质国际教育，但低年级出国留学，学生将面临生活和心理的巨大挑战。在海外留学每年的费用约 30 万人民币，家庭教育支出负担较重，学生和家长越来越倾向于在“国际留学”和“国内留学”间做出理性选择。客观需要扩大教育领域的开放度，增强教育竞争力、吸引力，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

三、加强我国人力资本投入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理念，其中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也就是说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依靠科学的人力资本的投入。研究认为，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总量和优化人力资本投入结构应坚持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三大主体，即政府、组织和个人，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私人投资存在市场趋利倾向，会产生投资效率低下和投资不足状况。而通过政府的导向性投资行为，可以对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平衡供求、规范格局、引致增量及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等作用。

政府投资的重点要实现几个转变：一是实现从物质投入为主向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转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产能过剩，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二是基础教育应实现以地方财政投入为主向中央财政投入与地方投入并行转变。地方财力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财力相当困难，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不仅增加地方财政负担，而且影响投入规模。三是以注重学历教育为主向学历教

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并重转变。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迫切需要技能和岗位能力的提升，因此，在注重学历教育的同时，必须把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人力资本投入从注重教育投入为主向注重心理健康和卫生公共服务并重转变。当前随着工作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加大，精神方面疾病越来越严重，及时提供心理健康辅导和卫生公共服务，对高效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政策措施如下。

（一）多渠道吸引人力资本投入，扩大人力资本投资规模

第一，国家财政设立人力资本投入专项资金。目前，人力资本财政投入分散在中央、地方财政以及各部门，投入资金分散、效益低，投入重点得不到保证。将这些资金集中起来，在国家财政支出中设立人力资本专项投入资金，由有关部门统筹规划，实行专款专用，按照国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突出重点，合理配置资源。

第二，制定和出台教育投资优惠政策，吸引国际和国内单位和个人对教育投资。目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事业收入是教育经费最主要来源，教育经费事业收入的来源单一，最主要来源是学杂费，而其它机构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投资和捐赠来源匮乏。出台教育投资和捐赠减税或免税等优惠政策，调动国内外企业投资，以及社会组织捐赠的积极性，使教育经费来源多渠道，不断增大教育投资规模，使我国的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第三，加大培养医疗人才和精神卫生专业队伍建设投入。一是各省积极制定相关医疗技术人员合理流动政策，完善医疗技术人员流动机制，建设医疗卫生人才市场。开展医疗技术人员职业培训，有关部门要组织农村地区医疗机构人才不定期进入县或省级医院培训与学习。二是建立健全精神卫生专业队伍，在医学教育中保证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等相关课程课时，卫生计生部门加强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精神科护士培训；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完善心理治疗人员职称评定办法。落实国家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政策，提高待遇水平，稳定精神卫生专业队伍。

第四，保障精神卫生工作经费投入。各级政府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强对任务完成情况和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考核，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落实政府对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投入政策。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精神卫生服务和社区康复等领域。

第五，加大政府对公共医疗卫生的财政支持力度，建立以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的公共卫生筹资系统。建立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为主、以市县财政为辅的财政保障供给系

统。鉴于政府财力有限，可将卫生作为法定的可接受捐赠的事业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接受捐赠，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可以接受捐赠。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医疗服务机构。加大财政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增加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规模，实现公共卫生支出规模“三个提高”，即占 GDP 的比例提高，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提高。国家财政用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支出保持在占 GDP 1.5% 的比例比较合理。各级政府应在明确自身医疗卫生事权的基础上，确定各级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的分担比例。

第六，加大农民工培训投入，将农民工培训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为提高务工人员的操作技能，政府必须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加强业务培训。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资金筹措、培训机构建设等方面，鼓励行业、企业、院校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工培训。

（二）加大力度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第一，将义务教育从目前的九年扩展到 12 年，将职业教育纳入免费教育范围。一是扩大义务教育范围，为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为满足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调整义务教育年限，在明确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将高中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范围，逐步推行 12 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将职业教育纳入免费教育范围，为 2025 制造业强国战略提供实用人才保障。二是扩大费用的免收范围，建立高中贫困学生援助保障机制。在继续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免收学费的同时，逐步免交义务教育学生的杂费和书本费等。对暂无条件免交杂费和书本费的地方，杂费的标准应逐年降低，并确定最后取消年限。三是逐步放宽义务教育学生入学条件，保障进城就业农民及其流动人口子女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监护人履行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四是建立义务教育助学体制。建立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村绝对贫困家庭、农村低收入家庭、城市低保家庭、残疾人家庭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给予费用减免的制度，切实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此外，给予义务教育的捐资助学单位免税优惠。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义务教育的捐赠。

第二，调整教育结构适应产业需求。经济增长引起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变迁，并进而要求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匹配，只有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相互匹配，经济才能持续地增长。教育是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途径，应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激励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根据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人数划拨教育经费，注重师资培养和考核。对未来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专业，在教育

经费分配上应给予适当倾斜。鼓励高等院校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专业结构，未来高等教育应满足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需求，同时强化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等方面教育。

第三，调整医疗卫生政府财政支出方向。注重向公共卫生、基层人才培养方面倾斜，优先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逐步加大对初级卫生保健、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卫生人才培养方面的财政资金支持。

第四，调整对医疗服务的财政支出结构。一是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改变大幅增加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方式，采取补贴患者等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通过医疗机构市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服务价格。二是加大政府在疾病预防事业中的投入，提高财政公共卫生支出中预防保健支出比例，合理进行预防工作管理。三是合理分配突发性医疗事件事前投入和事后投入的比例，加大事前防范支出比例。

第五，加强培训供需对接，增加技能提高型培训比例。一是提高培训项目市场化，引入市场机制，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提供培训项目，增加技能提升培训比例。在流入地为农民工提供在职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培训参与率和技能水平的有效途径。二是建立多层次培训体系，对培训市场进行有效监督。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提供企业家、管理层、党政领导干部、技术层等满足多层次需求的培训体系。对培训机构资质和培训教师资质进行审批和考核，并将民办培训机构教师纳入正规教师技能评定和晋升渠道。对职业技能评定单位进行有效监督，尽量采用标准化测评方式。

（三）缩小人力资本投入的城乡差距

第一，放宽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完善教育资源均等化。一是放松并逐渐消除对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受教育机会的限制。将教育机会和其他公共服务一起逐渐向非本地户籍人口开放，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二是推进城市内部区县间和学校间教育资源均等化。城市内部中小学教育支出应与区级财政脱钩，并由市级政府统筹安排，推动学校间质量均等化。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推动县（区）域内校长和教师交流轮岗制度。三是削弱高等教育招生本地保护倾向，增加外地生源名额，向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过渡。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弱化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关系，在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保险政策、社会福利方面实施统一标准，促进城乡间和地区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提高沿海地区高技能者占劳动力总体比重，实现高技能者地区间充分流动，有利于社会总体效益最优化。

第二，把公共卫生支出的重点向农村和落后地区转移。根据各地区不同情况，实施不同形式健康保障，东部发达地区可实行农民医疗保险，中西部贫困地区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扶持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和供给体系建设，实施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对农村卫生人员进行实用医疗技能培训。

（四）缩小人力资本投入区域差距

第一，加强中西部地区教育投资，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增加教育资源的跨地区可携带性。一是加强对教育专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更多的投入提高毕业生质量，把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充实到基础教育师资队伍中去，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师待遇。二是在基础教育的投入中，加强对学生以及学龄前儿童的营养投入，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不良，严重限制其学习表现。三是增加教育资源的跨地区可携带性。当受教育者发生城乡间或地区间迁移时，其所对应的教育资源可以转入迁入的地区或城市。四是中央政府加大对人口流出地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向人口流出地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向留守儿童发放生活补助，有助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第二，东中西部地区有区别的健康投入策略。一是西部地区应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入，改善因西部地区对健康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二是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传统的健康人力资本投入已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这些地区应思考如何发展高新医疗技术，设法留住高端人才，突破发展瓶颈，寻求更大的发展。三是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北京、上海除外），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优于教育人力资本，应加大健康投资，激发健康人力资本经济效应。

第三，吸引更多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就业。一是国家要加大引导力度。重视人才政策创新，抓好人才政策制定，鼓励人才到西部去，坚定他们“在西部一定大有可为”的信念，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二是国家要把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起来，让爱家、爱乡的人才回家。人才肯定会对家乡有着浓浓的感情，教育好、培养好他们，鼓励他们回国、回家乡贡献力量，比直接引进外来人才要有效得多，可以避免水土不服的问题。西部和边远地区应在吸引本土人才回乡上努力做文章，让本土成长的人才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父亲母亲干点事情，激发他们前来工作、干事创业的热情。三是加大政策倾斜度。鼓励高层次人才到西部工作，实行“双工资待遇制”，原单位待遇不变，另外再给予当地同类人员的工资待遇，鼓励家属随援。在柔性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方面，国家应设立专门基金。将人才培养与引进的内容归入西

部大开发资金的支持范围，为引进、培养人才提供资金支持。四是在科研方面开辟西部试验区。鼓励各类人才在科研项目上“打擂台”，明确人才对成果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以实绩论英雄，用一流环境凝聚一流人才。五是加大对教育、科技方面的应用型、实干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必须培养专业对口，适应西部地区发展的需要，供需对位、适得其所的人才，这样才能符合西部地区发展实际。

（五）将贫困地区营养干预工作建成民生工程

加强组织领导、规范管理、监督检查，把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建成重要“民生工程”“放心工程”“阳光工程”。

一是抓好资金落实。利用好中央财政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中的学生食堂建设资金、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等专项资金。提高学生膳食补助标准，努力扩大补助面，落实改善就餐条件的资金。二是加强示范引导。中央安排专门资金用于学生营养改善国家试点，就是要推动各级政府重视学生营养改善工作。各地要积极推进地方试点工作，逐步探索建立健全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在校膳食营养的长效机制。三是规范财政拨款流程。积极探寻营养改善计划拨款延迟时间长和资金挪作他用的解决办法。县财政要及时把资金拨付到教育部门，县财政和教育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以资金发放速度作为年终考核依据，不达要求者不评优、晋升。四是严格执行计划确保食品安全。实现规范化操作，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专款专用、提高效益，加强食堂会计核算和内控制度建设。跟踪监测、及时完善相关的政策内容，让贫困学生享受到国家惠民政策。五是加强行政监督，加强信息公开，组成由教师、家长、学生、社会人士组成的监督评估委员会，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共同监督和共同推进的良好氛围。六是探索政府与公益组织合作机制。地方政府要拿出经费配合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实施，鼓励根据本地经济实际，适当提高补助标准。积极探索与民间组织的公私合作（PPP）方式。例如广西“马山模式”的做法是：马山县地方政府负责修建厨房、配套水电等基础服务，“九阳希望厨房”负责提供厨房的相关厨具设备，中央政府为每一个孩子提供每天三元钱营养餐补助款，“免费午餐”公益基金再补助每生每天一元，学生家长轮流担任厨房工作人员。形成“政府主导、公益跟进、企业参与、多方合力”的模式。

（六）公平地分配精神健康服务

第一，更加关注社会困难群体，尤其是关注老年人、贫困人口、儿童及青少年，以及女性的精神健康问题。社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精神健康服务，通过社会干预方式缓解

现代人精神压力，预防和减少精神疾病发生。女性出现忧郁症的比率较高，青年期是高度焦虑的时代，而在社会最下层精神分裂症发病率最高。我国存在的“未富先老”、贫富差距以及儿童和青少年、女性精神健康等方面的问题，要求全社会行动起来，重视对于精神健康困难群体的精神疾病防治工作。

第二，关注高危行业员工心理健康。一是针对高危行业员工，提供有关心理健康期刊、书籍、光盘，利用内部网向员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二是实施心理培训，开设有关心理卫生的课程或定期邀请专家作讲座、报告，让员工学会缓解压力、应对挫折。三是高危行业应设有心理健康咨询师，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员工进行心理疏导，让出现抑郁等心理疾病的员工脱离高危岗位，及时治疗。四是保障员工生活质量。完善薪酬体系，向员工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增强员工安全感和较稳定的就业心理。五是鼓励员工健康生活方式，优化单位工作环境，鼓励员工兴趣爱好。

（七）国家财政拨出专项经费，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第一，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一是建立领导协调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留守儿童工作格局，提高非政府组织和群团组织在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形成整体功能。二是统筹经费保障机制，国家财政拨出专项经费，设立关爱留守儿童基金，吸引更多企业和公益组织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行动中来。三是将关爱留守儿童作为民生工程，列入政府部门的考核范围。如若当地发生留守儿童重大或恶性安全责任事故，追究当地行政领导的责任。四是县、区及农村乡政府要建立当地留守儿童档案，并由专人负责联系监查。五是利用当地的公共设施，如农家书屋、乡镇文化活动站，在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留守儿童活动中心”，由当地的退休老师、爱心人士和志愿者看护和帮助留守儿童，政府提供专项经费，帮助中心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

第二，构建全方位的留守儿童教育保护网络。一是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配套设施建设，按照适当比例配备生活老师、心理辅导教师和文体活动老师，将其纳入学校编制。二是在留守儿童集中的社区建立关爱服务阵地。发挥民间社会力量的作用，培育留守家庭互助小组和留守儿童互助小组等组织。三是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安全保护预警与应急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问题，有关方面人员能迅速介入并妥善处理。四是落实政策优化留守儿童成长环境。确保夫妻可将子女带到流入地就学，取消不合理收费，平等对待每个孩子。五是政府将社区对留守儿童、孤儿等社会弱势群体关爱措施的有效性上升到对他们的年度考核层面，并将其与干部的奖励机制挂钩。六是社会舆论应报道宣传在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和事迹，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八）改革县以上领导班子考核机制，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入统计体系

教育投入产生回报的时间比地方官员的任期长得多，人口流动性使受教育水平上升的好处，不一定反映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上。为了提高地方政府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要建立健全地方领导班子考核机制，将教育投入作为影响官员晋升的一项重要指标。

完善与人力资本投入相关的数据统计体系。目前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数据是空白，影响对数据分析的科学性，也对人力资本投入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国家无法从总量和结构上把握人力资本投入数据，应建立人力资本投入总量统计指标体系和人力资本投入结构指标体系，并由统计局定期向社会公布人力资本投入的统计信息，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决策提供更科学的参考依据。

（九）深化人力资本投入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改革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制度，探索建立符合财政规范化管理与科技创新规律双重要求的现代政府科技经费治理体系。明确人力资本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给予科研人员劳务报酬，在主要靠智力劳动完成的项目中，劳务报酬应占大头，消除科技界大量存在的做假账现象。

第二，真正建立科研项目诚信管理体系。政府部门应将科研经费的管理重点从过程向结果转移，从经费的规范性审查向经费投入绩效评价转变，注重项目成果的质量和实际贡献，加强对科技成果达标性和资金实际效益的评价。建立起项目承担信用管理体系，惩罚和激励并重，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第三，以人为本设计创新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关键在人，尤其要有一套真正激励和调动人的创新劳动的体制机制。在机制设计上，关键是四个“明确”：明确创新完成人对创新成果的主体地位，明确创新成果“谁完成，谁拥有”的原则，明确将创新知识产权的性质（包括财政资助的项目）归属创新完成人，明确创新团队或个人依法享有处置权和分配权。

第四，扩大教育领域开放水平。教育国际化既是世界教育发展大势所趋，也是评价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逐步开放国内教育市场，大力推进“海外名师项目”和“学校特色项目”，引进世界一流名师建设国际化的教师队伍，允许世界名校到国内设分校，继续稳步增加重点高中、高等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强调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原则，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张瀛之、张炳发、唐燕：《公司治理、政府干预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

经验证据》，《现代管理科学》2016 年第 1 期。

2. 雷明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点是增加同质型人力资本投资》，《现代经济探讨》2015 年第 12 期。

3. 孟令国、张杰、吴宇帆：《东南亚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启示——基于人口红利的视角》，《东南亚研究》2015 年第 6 期。

4. 吕娜、邹薇：《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居民收入——基于私人 and 公共部门健康支出的实证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5. 郭晓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商业经济研究》2015 年第 11 期。

6. 封永刚、邓宗兵：《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经济》2015 年第 3 期。

7. 都阳：《低生育率时代的经济发展：结构、效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2 期。

8. 郑皓瑜：《墨西哥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机会计划”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 9 期。

9. 吴俊培、赵斌：《人口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 年第 10 期。

10. 胡茂、刘俊：《我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投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2014 年第 22 期。

11. 董志勇：《收入差距、公共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科学》2009 年第 3 期。

12. 孙嘉尉、顾海、马超：《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 1997—2010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软科学》2014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马博飞

“十三五”时期加快培育创新动力的思考与建议*

盛朝迅

摘要：当前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出口增长、资源能源消耗等传统动力正在弱化，新的创新动力亟待培育壮大，必须在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同时，按照“改革先行、企业主体、重点突破、人才为基”的原则，重点解决创新的主体、动力、重点领域和体制环境等问题，加快构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力和新基础，使创新动力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创新动力 创新驱动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培育思路

作者简介：盛朝迅，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一、动力转换时期的中国经济呼唤创新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接续关键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要素投入、出口增长、资源能源消耗等旧的增长动力开始萎缩，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之中，但短期内仍难以弥补传统动力弱化形成的缺口，迫切需要转换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更多依靠创新动力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课题《“十三五”产业新增长点影响因素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型零售商主导产业链的理论及公共政策研究》（批准号：12CJY068）成果。

（一）传统动力明显弱化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转型和动力转换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矛盾表现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源能源、人口红利等传统动力持续萎缩，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一是资源与能源供应的瓶颈加剧。过去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大量的资源与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国内的资源拥有量和能源生产能力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继续增加资源能源供给，一方面将引发更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也面临国际资源与能源市场供应空间的限制，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资源能源供应瓶颈将越来越突出。

二是人口红利逐步丧失。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庞大人口规模，长时间以来年轻人口占据人口结构的主体，为我国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增量，使我国享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红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现在，这种“红利”明显萎缩（见图 1），劳动力已经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劳动成本上升较快，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明显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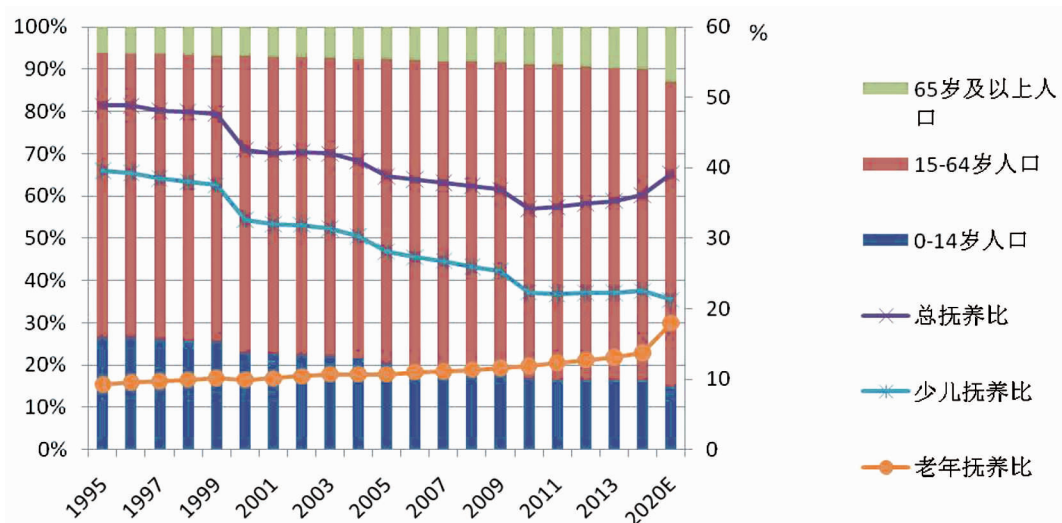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出现

注：2015 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数见顶回落；2010 年总抚养比开始回升，人口红利拐点显现。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制作，其中，2020 年预测数来自李晖，陈锡康等：

《基于人口投入产出模型的中国人口结构预测及分析》，《管理评论》2013 年第 2 期。

三是资本回报率下降，继续保持大规模投资难度较大。一定的投资规模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助推器，投资驱动也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特点。2000 年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受投资率大幅攀升和政府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等因素影响，我国资

本回报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见图 3）。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逐渐下降，导致投资不足等问题，带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此外，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大规模投资高潮已经过去，继续保持大规模投资难度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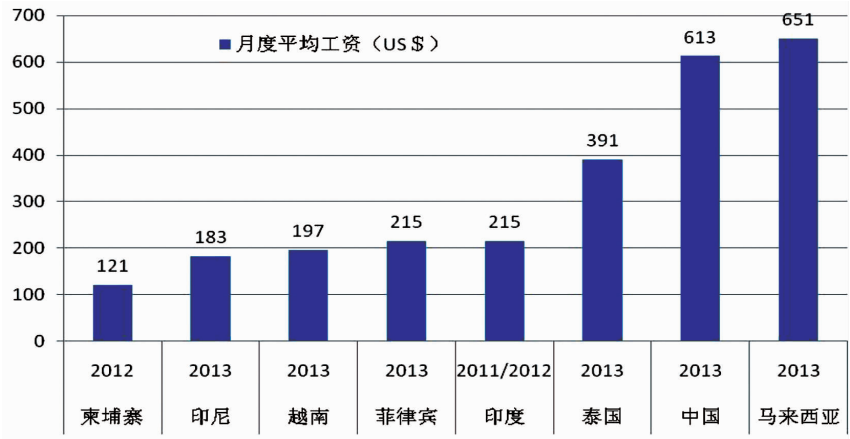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劳动力成本与有关国家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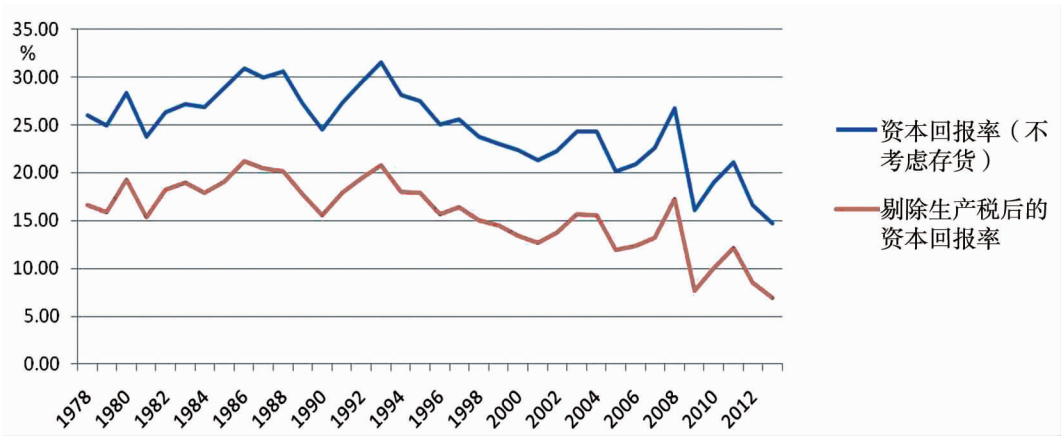


图 3 1978 年—2012 年中国资本回报率

数据来源：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 年第 10 期。

（二）创新动力亟待培育壮大

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创新驱动，包括技术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进步，即以新技术的使用来代替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投入。近年来，我国研发（R&D）经费投入不断加大，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位。2014 年，全国 R&D 经费已达到 13312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提升至 2.09%，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国内专利申请量自 2011 年起持续居全球第一位；国际专利体系（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也于 2013 年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2014 年，全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 12.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至 10.6%。科技和创新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正稳步增强。从国际比较看，根据《欧盟创新排行榜（2014）》报告，2014 年我国创新能力增长 5.8%，综合得分达到 0.275，超过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居新兴市场国家前列；但整体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如美国和韩国得分均为 0.74、日本为 0.71、欧盟为 0.63。从具体指标看，差距主要表现在市场和法律环境、创意转化为产品、开放程度等方面。

虽然我国创新能力正稳步增强，但总体上看，经济发展仍然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等要素驱动，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真正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较小，且难以弥补传统动力弱化形成的缺口。以经济学界一般通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来衡量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国过去 30 年 TFP 的增长很少超过 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不到 20%，特别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呈下降趋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测算认为，1978 年—2009 年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8.30%。其中，1978 年—1981 年为 32.32%，1982 年—1986 年为 38.47%，1987 年—1990 年为 -41.29%，1991 年—1999 年为 48.27%，2000 年—2009 年为 13.11%。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所测算表明，1978 年—1999 年技术进步贡献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进入 2000 年以后受技术引进边际效应下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等因素影响，我国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其中，1990 年—1999 年技术进步贡献较高，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 3.3 个百分点，2000 年—2012 年技术进步贡献率下降，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 1.5 个百分点（见图 4）。而西方发达国家的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都在 80%以上^①，我国 TFP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空间还很大。

二、“十三五”时期培育创新动力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为什么创新动力还没有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究其原因，主要与我国国情、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特别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因素依然存在，制约了创新动力的培育壮大。

（一）体制机制不完善

当前，业界流传比较多的一句话是“不创新是等死，创新是找死”，主要反映的是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因素较多，创新的激励机制仍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一是鼓励创新的

^①Xu Tian, Xiaohua Yu, The Enigmas of TFP in China: A Meta-analysi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 396—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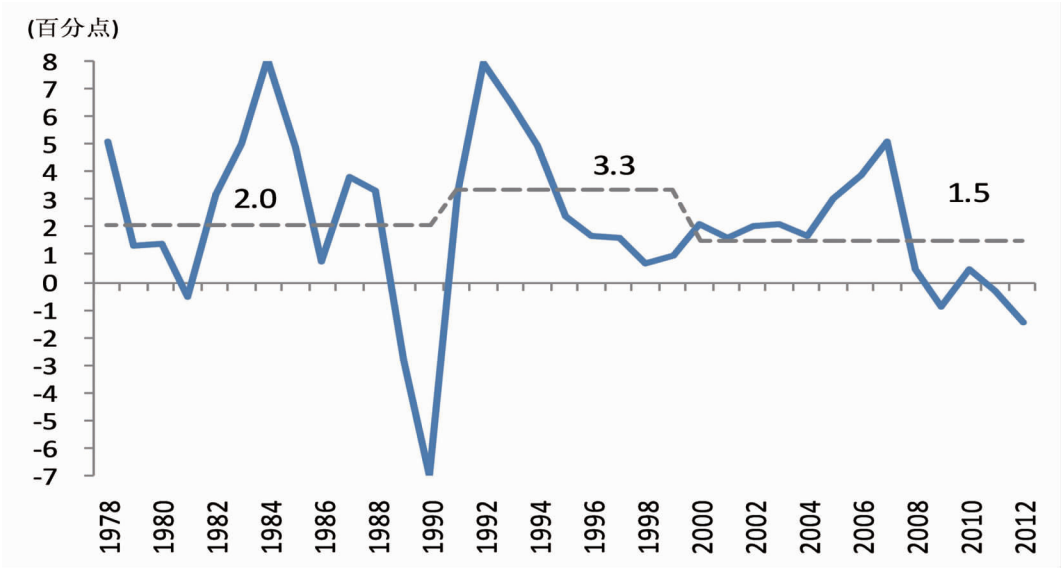


图4 1978年—2012年我国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数据来源：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年第10期。

制度设计和氛围有待增强。在目前主要考核地方GDP、主要考核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机制下，地方政府和一些国有企业对创新重视不够，舍不得投入。此外，市场竞争秩序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依然淡薄，依靠创新很难获得应有收益。一些基础性行业垄断现象突出，挤占了上下游中小创新型企业的利润，扼杀了创新活力。二是主要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生产要素价格对创新的倒逼机制还需要时日。长期以来，我国能源、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偏低，不仅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压力增大、人地关系紧张等问题，给落后产能留了生存空间，导致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畸形发展，而且也阻碍了新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抑制企业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减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特别是服务劳动、研发、创新等无形要素价值被低估，也抑制了相关领域服务和研发人员追求创新的动力。三是创新管理缺乏统筹协调，创新政策难以形成合力。目前，我国尚未形成有利于推进创新发展的决策和组织机制，创新链条分割、管理绩效不高、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的传导机制不畅，导致研发与应用脱节、科技与经济脱节，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二）企业创新能力薄弱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先锋。但目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较弱，不适应增强创新动力的要求。据统计，2013年，我国规模

以上制造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 0.88%，近 70%的企业没有 R&D 活动。高技术制造业 R&D 经费支出为 2030.8 亿元，占主营收入的比重为 1.75%，与发达国家 5%以上的水平存在很大差距。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多数是进行模仿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真正的原始创新不多，企业 R&D 经费支出中基础和应用研究仅占 3%左右，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20%以上的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有企业投入能力不足等因素，但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围绕企业配置创新资源的体制机制没有形成，社会资本支持创新的渠道不畅，企业很难获得政府和社会的研发经费支持。

（三）技术转移和转化效率低

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是创新驱动的关键环节。但目前我国技术转移和转化的效率均偏低。据调查，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不到 10%，部分重点大学、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 5%，而发达国家高达 40%~50%。主要原因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没有成为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而大量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缺乏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能力，加上目前以论文、专利等为导向的考核机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缺乏技术转移、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动力。此外，技术市场不完善，行业协会和联盟支撑作用不足，特别是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不够，也制约了技术转移、转化和创新动力的提高。

（四）人才和职业教育等支撑不足

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所需要的领军人才、复合人才和专业人才总量不足、质量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发展方式转变、产业提质增效和增强创新动力的瓶颈制约。现行基础教育仍未摆脱应试教育，不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高等教育质量亟待提高，职业教育不发达，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的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大量增加，但就业困难有所加剧。与此同时，企业急需的技能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缺乏。现行的人才评价制度过于标准化和单一化，严重影响了人才作用发挥。

（五）政策法规不完善

创新驱动是一个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研发到产业化的过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在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方面有一整套推动创新的制度政策安排。但目前我国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消费政策之间没有形成有机衔接，甚至存在相互矛盾和抵触的现象，导致创新政策无法落实。比如，在对自主创新产品初期市场的

引导和培育方面，虽然国家出台了包括首台套采购等一系列的政府采购措施，但落实不够。在财税政策方面，虽然国家出台了企业研发投入所得税抵扣政策，但在许多地方落实不下去。在金融政策方面，目前我国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还不发达，有企业家直言“中国的创业投资是保险投资而非风险投资”，主要因为我国创业投资主要投向产业化中后期项目较为成熟的企业而非创业早中期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融资非常困难。

三、“十三五”时期培育创新动力的战略思路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必须在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同时，重点解决创新的主体、动力、重点领域和体制环境等问题，加快构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力和新基础。

为此，培育创新动力的战略思路是：以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为目标，从构建激发创新活力的机制环境入手，按照“改革先行、企业主体、重点突破、人才为基”的原则，做好创新驱动的顶层制度设计，努力构建增强创新动力的体制机制；坚持企业主体，大力推进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坚持重点突破，着力推进新兴产业和重点地区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强化领军人才、复合人才和专业人才培养，夯实增强创新动力的科技人才基础。积极发挥政府和行业协会作用，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知识产权保护、垄断行业改革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扶持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骨干企业，争取构建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制度框架，到 2020 年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达到 40%左右），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 2~3 个百分点，创新动力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骨干支撑，基本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主要战略路径如下。

（一）坚持改革先行，努力构建增强创新动力的体制机制

要利用当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的“倒逼”机制，保护和强化市场竞争，促使企业由过去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向依靠创新、差异化竞争转变。一是提高产业发展的安全标准、环境标准和节能环保标准，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攻坚，加强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完善反映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的资源及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二是大力推进电网、电信、药品流通等垄断性行业改革，建立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变“创新环节不挣钱，不创新也能挣大钱”的局面。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简化行政审批、审核程序，提高审批、审核效率，更多通过产业技术标准、质量管

理、环境保护等标准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建立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加快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将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功能从支持政府性投资转向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支持技术创新等市场失灵领域。

（二）坚持企业主体，大力推进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

要通过大幅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以“增量带动存量”改革，加快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一是真正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研发体制。以改革科研项目管理体制为突破口，推动科技创新由技术供给导向型为主向市场需求导向型为主转变。二是切实加强需求侧政策对自主创新的拉动作用。制订政府采购政策实施细则，明确政府采购自主品牌的比例，完善招投标机制和政府采购政策实施的跟踪、评价和监督机制。

（三）坚持重点突破，着力推进新兴产业和重点地区率先实现创新发展

我国人口众多，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特殊国情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创新发展道路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应该找准突破口，集中优势力量，鼓励先行先试，努力实现重点产业和区域的率先转型发展。在产业领域选择上，应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大力推进生物、“互联网+”、新能源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组织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统筹技术开发、产业化示范、标准制定、市场应用等创新环节，发展壮大一批新兴产业创新型领军企业。在区域发展重点上，要大力支持部分发达地区率先转型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在金融体系创新、绩效考核改革、放松市场管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大胆探索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创新驱动的经济结构和基础条件。

（四）坚持人才为基，夯实增强创新动力的科技和人才基础

要建立强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基础，建立开放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体系，建设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大力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增强创新动力奠定坚实基础。要推进教育体制和人才评价使用体制改革，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借鉴发达国家专业人才培养经验，以职业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要从战略高度重视领军人才、复合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开发和使用，瞄准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创新动力的需求，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结合研究、教育培训和移民等政策创新，努力形成集聚人才、提升人才、用好人才和有利于人才分层发展的体制机制及政策环境。

四、“十三五”加快培育创新动力的对策建议

（一）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

增强创新动力，关键在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一是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制度，大幅度提高权利人胜诉率、判赔额，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侵权易、维权难”的状况，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和环境。二是实施技术转移行动计划，通过完善知识产权许可和管理、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等政策法规和措施，推进财政资金支持的技术成果转移和产业化，大幅度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三是鼓励企业、行业协会、产业联盟、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产学研结合等形式，共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产业技术开发体系。四是实施灵活高效、人尽其才的选人用人政策。按照创新的规律培养和吸引人才，推动科研成果收益分配、股权激励、产权处置等向优秀人才倾斜，建立充分体现智力劳动和服务劳动价值的分配导向，让科技人员的智力劳动得到合理回报，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科研自主权、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

（二）切实增强企业创新动力

目前，我国的科技计划和工程主要是围绕提升创新要素的能力来部署的。新时期新阶段，要围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幅度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一是要结合目前结构性减税的税制改革方向，进一步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仪器加速折旧等税收政策执行力度，逐步提高抵扣力度，探索对中小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税收补贴，最终将研发税收补贴额度稳定在企业全部研发投入 20% 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教育培训费税前列支比例，将培训费占现行工资总额的 2.5% 提高到 5%，调动企业提高业务培训的积极性。二要建立需求导向、企业牵头、企业采购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服务的关键领域产业技术攻关体系。提高企业对国家科技计划、应用导向的科技重大专项方案等决策参与度。强化国家支持研究开发项目全项目资金合理性审核，适度放宽承担单位预算调整权限，增加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投资预算额度。三是要突出重点，通过典型示范等方式支持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加快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争取 5~10 年时间，使骨干企业真正具备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几代的技术创新能力，在若干领域形成颠覆性技术能力。培育一批国际竞争力居世界前列的创新型企业 and 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集群。

（三）推动重点领域和地区率先创新发展

围绕促进重大产业创新发展，提升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选择健康、新一代电子信

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制定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创新发展的体制、关键核心技术等问题，制定切实的政策保障措施。通过 5~10 年的努力，使上述领域创新动力明显增强，部分领域的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重点区域发展上，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的要求，重点推动京津冀、上海市、广东省、安徽省、四川省和武汉市、西安市、沈阳市等地区率先进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率先探索适度宽松的新兴产业准入机制、以创新为纽带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机制、开放式创新和人才引进等创新相关的制度创新。力争通过 5~10 年的努力，使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部分地区达到韩国等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的竞争能力和规模水平，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引领、示范和带动全国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四）强化国家“产业公地”建设

“产业公地”是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报告中提出的三大战略任务之一。美国认为，产业公地的缺失和衰落是美国制造业具有很强研发及创新能力却很难产业化，最终失去竞争力的原因，必须遵循产业规律，强化集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程制造能力等支撑多个行业发展的关键能力于一体的产业公地建设，支撑美国制造业的未来。当前，我国制造业基础和能力都较强，部分也是得益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关键设备制造、工程建设、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制造业基础和能力支撑。如今，这些地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些工厂经营困难或转产，有可能导致这些宝贵的制造能力丧失，建议在东北和其他制造业基础较好的地方建设一批国家“产业公地”，一方面为老工业基地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方向，另一方面为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储备重要的生产制造能力，支撑创新动力增长。

（五）加快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

要注重发挥新技术、新业态对增强创新动力的带动作用，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在整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863”计划、支撑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等基础上，调整政府投资方式和重点，加大对前瞻性领域投入，抓紧实施一批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带动作用突出的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如，组织实施通信和网络安全工程，加强中央处理器（CPU）、操作系统等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攻关，积极在党政军工系统以及能源、金融等涉及国计民生领域的信息系统和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基础信息网络推广应用。开发安全可控云计算系统，重要信息系统安全态势感

知与攻击防御系统。又如，组织实施种业安全工程，开展重要农作物分子育种基础理论研究，突破基因发掘、基因表达调控、安全转基因和规模化转基因操作技术，提升检测检疫、抗性鉴定、生产加工和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建立分工协作的国家级育种研发基地，积极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大型种子企业。同时，要围绕可持续发展难题、产业技术瓶颈、民生重大需求、国家核心安全等方面，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攻方向，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加快研究论证智能制造、大数据应用、新型医疗惠民等重大创新工程。既要解决不掉队的问题，也要从国情和发展需求出发，明确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引领转型升级，掌握若干战略必争领域的国际竞争主动权。

（六）注重已出台政策措施的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对培育创新动力非常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增强创新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专题讲话，中央和国务院也陆续出台了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和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非常好也非常实，但“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关键在落实。要强化政策落实情况的评估，做好监督考核和推广应用工作，确保各类重大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澳大利亚培训团：《澳大利亚专业队伍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全球化》2015年第3期。
2. 王昌林、姜江、盛朝迅等：《大国崛起与科技创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经验和启示》，《全球化》2015年第9期。
3. 江飞涛、武鹏等：《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5期。
4. 杨萍、岳国强：《我国投资率正在走低》，《调查研究建议》2014年第14期。
5. 徐康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金融纵横》2013年第5期。
6. 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年第10期。
7. 聂鹏：《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责任编辑：李蕊

· 国际经济 ·

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缺失与我国支持 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闫 坤 于树一

摘要：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距今已有八年，但其影响仍在，且经济增长乏力的状态已从发达国家蔓延至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不可能来自外部的经济政策，而只能来自内部，即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布局的驱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稳步回落至合理区间，但结构优化体现在所有宏观经济领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有序地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在稳步提升，政策空间也在逐渐改善，在发展动力已成功向服务业转化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振兴制造业，形成经济发展的双引擎驱动，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词：世界经济 财政政策 增长动力 制造业

作者简介：闫 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于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一、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缺失

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着愈发明显的下行风险，体现出复苏脆弱且不稳定、不均衡的特征。各国政府的积极作为似乎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面对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形势几乎无策可施。

^{*} 本文是《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研究》（批准号：10AZD020），课题组组长：闫坤。

（一）世界经济增长呈现非均衡和脆弱性特征

当前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步调不一致的状态，但经济发展形势已然在悄悄发生变化。从表面上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虽仍远高于发达国家，却因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美国经济稳步增长，欧元区经济仍然保持着低速缓慢复苏，日本经济又重新陷入停滞。而从更深的层面上看，目前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的温和复苏也是脆弱、不稳定的。

1. 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喜忧参半

美国经济自 2010 年起开始复苏，呈现出温和复苏的态势，美国商业部数据显示，2015 年 4 月—7 月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 3.9% 的超预期增长。但其宏观经济表现喜忧参半：虽产业稳健扩张，尤其是建筑业增长强劲，但产业扩张势头有所减弱；虽消费和投资支出均有一定程度增长，但消费者信心不稳定；虽失业率持续走低，但劳动力市场疲软；虽贸易逆差大幅上升，但价格指数仍然维持低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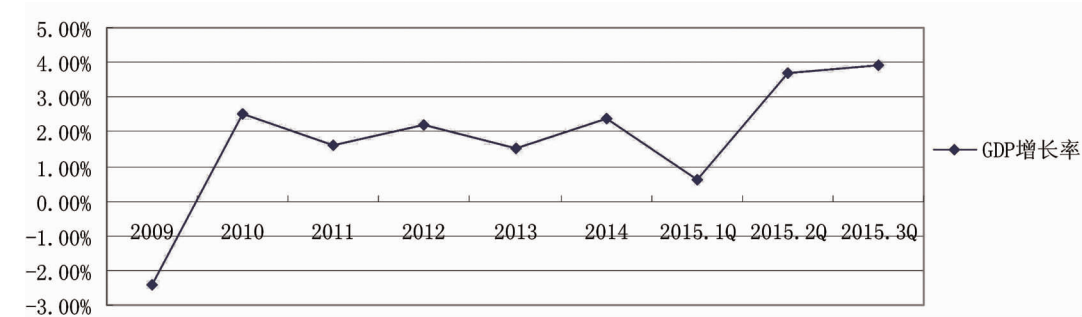


图 1 2009 年—2015 年三季度美国 GDP 增长率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

2. 欧元区经济复苏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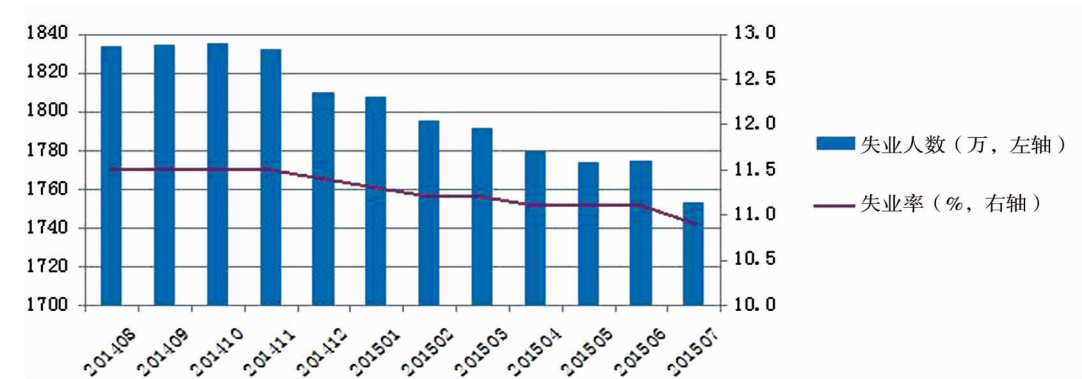


图 2 2014 年 8 月—2015 年 7 月欧元区失业人数及失业率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 2015 年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3%，同比增长 1.2%，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德国仍然是欧元区的经济领跑者，但仍属于低速增长，而部分成员国经济陷入停滞。支持其经济复苏脆弱的依据还有：通缩压力加大、就业形势恶化、经济景气指数回落。但也存在有利因素：对外贸易形势向好，进出口贸易额均实现增长；尽管处于低速增长区间，但扩张态势得以保持，Markit 综合采购经理指数（PMI）、服务业 PMI、制造业 PMI 均高于临界值 50，并呈上升趋势；财政状况好转，为“容克投资计划”的实施做了较好的支撑。

3. 日本经济萎缩

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2015 年第二季度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日本实际 GDP 下降 0.3%，换算成年率为下降 1.2%，GDP 又一次出现负增长，给一季度的强劲增长一记重拳。支撑日本经济萎缩判断的依据有：内需不稳，二季度日本产业设备投资升温，大型制造业者信心出现改善，但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因食品价格上涨但工资增长缓慢，日本民间消费环比下降，消费者信心指数处于今年的最低点；外需不振，2015 年 4 月—9 月日本出口虽然实现增长，但扩张力潜力不足，而在国际油价走低的背景下，日本能源进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说明经济增长的前景很不乐观；物价指数出现下滑，摆脱通缩仍异常困难。产业实现扩张但结构性矛盾突显，2015 年 8 月—10 月日本制造业 PMI 均高于 50，说明制造业活动有回暖迹象，但工业生产已经连续两个月下滑，作为支柱产业的汽车和电子零部件生产尤其低迷，而且市场对服务业前景的信心也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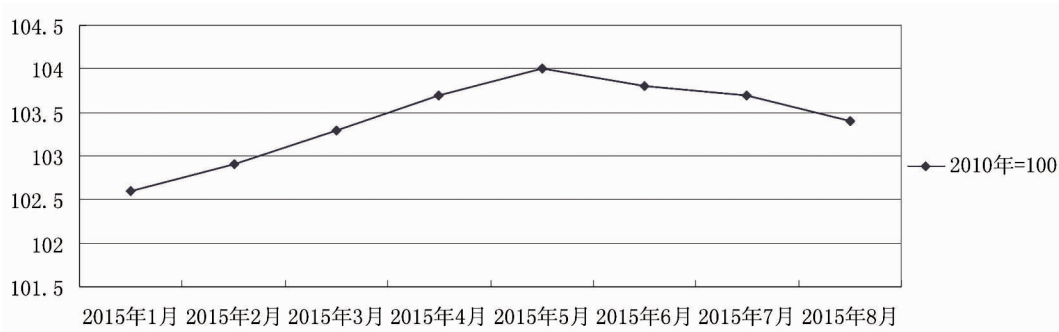


图 3 2015 年日本 CPI 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

4.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下行

一是俄罗斯经济恶性循环风险加大。2015 年前九个月俄罗斯 GDP 同比下滑 3.8%，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低迷使得该国经济面临很大的困境，出口大幅下滑，金融和财政也受到严重破坏。此外，俄罗斯还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使得俄罗斯居民实际收

入下降，并影响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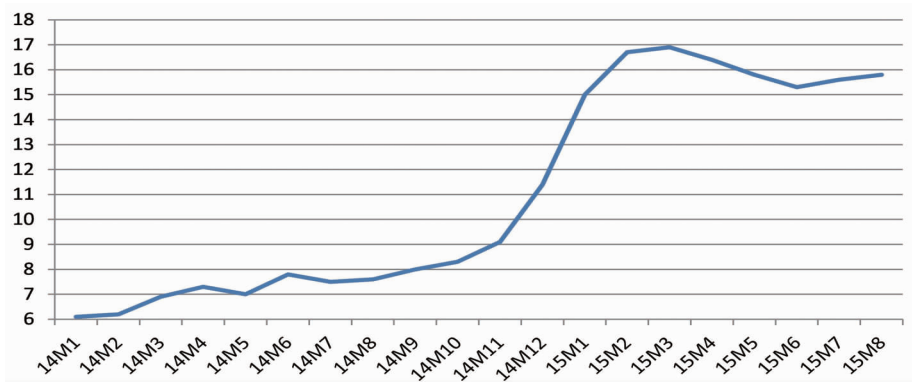


图 4 2014 年 1 月—2015 年 8 月俄罗斯消费者价格指数趋势

数据来源：转引自国家信息中心数据。

二是巴西经济陷入衰退。2015 年二季度巴西 GDP 环比下滑 1.9%，同比下滑 2.6%，从结构上看，巴西经济表现为包括工业、农业、服务业、家庭消费、投资、商品出口和进口等各领域在内的全面衰退。同时，巴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加之债务负担严重、政局不稳，遭遇了标普评级的下调。

此外，韩国经济也面临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印度尼西亚受外需不足影响，贸易活动减弱，GDP 增长小幅回落；南非因电力短缺、罢工和外需不足，其财政部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墨西哥因油价下跌、汇率疲软、资金外流等因素，其经济增长缓慢，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其经济增长预期。

相比之下，印度经济却逆势上扬，印度统计部数据显示，2015 年二季度印度 GDP 同比增长 7%，虽然其统计的科学性受到广泛质疑，但印度经济的确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振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外国直接投资、消费、工业生产等多项数据有良好表现。当然，印度经济中也存在若干不利因素，其中包括出口萎缩，尽管本币贬值，出口仍然下滑，其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也已经持续下滑。

（二）世界经济增长脆弱和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国别分析显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非均衡和脆弱性特征。在剥离种种表象之后可以发现，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二是资本外流；有两个重要国家：一是美国，二是中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影响较大，除了俄罗斯、巴西外，还影响到拉美资源型国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成员国等。国际机构纷纷下调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资本外流的影响范围和深度更为严重，由于国际上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

济增长放缓的担忧不断增加，致使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出激增，为了支持本国货币汇率，他们只能通过大量抛售发达国家的债券减少外汇储备，从而影响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新政策的出台，造成更广泛的影响。资本外流还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张慧莲的研究表明：可能通过汇率渠道推升通货膨胀，也可能通过资本渠道压低通货膨胀水平，还有可能因为央行的对冲干预没有明显影响，最终的结果要看这三种力量的对比，但由于资本会通过各种隐蔽的形式流动，汇率因管制而不能相应贬值（或者贬值幅度不够），导致货币渠道的影响大于汇率渠道，货币紧缩效应明显。

事实证明了上述分析。据国际金融协会（IIF）评估，新兴市场的资金净流出今年将达到 5400 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决定暂不加息，使得一些外流的资本于 2015 年 10 月重返新兴市场。而全球通货膨胀情况是，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很小，有些已陷入通货紧缩，只有少数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尼西亚，通货膨胀压力较大。

表 1 2015 年 7 月世界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率

瑞士	英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中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 1. 3	0. 1	0. 2	0. 2	0. 4	0. 7	1. 6	1. 28	1. 5
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	印度	南非	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	巴西	俄罗斯	
2. 74	2. 2	3. 78	4. 97	6. 8	7. 3	9. 56	15. 6	

数据来源：张慧莲：《全球性通货紧缩阴霾难散》，《证券日报》2015 年 8 月 29 日。

美国加息预期是三季度各国最关注的问题。因为美联储出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间和政策内容均会引发全球资本流动。具体来说，美国加息会吸引资本流入美国，各国的金融稳定均会受到冲击，尤其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因此陷入困境。目前，全球经济由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领跑，一旦其经济暴跌，必然会斩断发达国家脆弱的经济复苏，全球经济甚至可能面临着金融、贸易、财政、价格、投资等所有领域的崩盘。美国经济当然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美国对加息的决策极为谨慎，一直没有实质性行动。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正缓步下降，这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其经济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容易被过度解读。例如 2015 年三季度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变动，均在全球金融市场引发了短期动荡，这很大程度上是避险心理使然。事实上，必须准确评估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的影响，关键是要看到其带来的积极因素。中国目前使用区间调控手段，一方面进行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采取多项稳增长措施使经济增速保持在 7% 左右，即在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质量，顺利过渡到“新常态”。

态”，以顺应存在脆弱、失衡、复杂和较大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环境，并能够一如既往地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支柱。

表 2 IMF2015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全球经济预测
(单位：增长率%)

	2014	2015 年 10 月 预测值		与 2015 年 7 月 预测差		与 2015 年 4 月 预测差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全球产出	3.4	3.1	3.6	-0.2	-0.2	-0.4	-0.2
发达经济体	1.8	2.0	2.2	-0.1	-0.2	-0.4	-0.2
美国	2.4	2.6	2.8	0.1	-0.2	-0.5	-0.3
欧元区	0.9	1.5	1.6	0.0	-0.1	0.0	0.0
德国	1.6	1.5	1.6	-0.1	-0.1	-0.1	-0.1
法国	0.2	1.2	1.5	0.0	0.0	0.0	0.0
意大利	-0.4	0.8	1.3	0.1	0.1	0.3	0.2
西班牙	1.4	3.1	2.5	0.0	0.0	0.6	0.5
日本	-0.1	0.6	1.0	-0.2	-0.2	-0.4	-0.2
英国	3.0	2.5	2.2	0.1	0.0	-0.2	-0.1
加拿大	2.4	1.0	1.7	-0.5	-0.4	-1.2	-0.3
其他发达经济体	2.8	2.3	2.7	-0.4	-0.4	-0.5	-0.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6	4.0	4.5	-0.2	-0.2	-0.3	-0.2
独联体国家	1.0	-2.7	0.5	-0.5	-0.7	-0.1	0.2
俄罗斯	0.6	-3.8	-0.6	-0.4	-0.8	0.0	0.5
俄罗斯以外独联体国家	1.9	-0.1	2.8	-0.8	-0.5	-0.5	-0.4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6.8	6.5	6.4	-0.1	0.0	-0.1	0.0
中国	7.3	6.8	6.3	0.0	0.0	0.0	0.0
印度	7.3	7.3	7.5	-0.2	0.0	-0.2	0.0
东盟五国	4.6	4.6	4.9	-0.1	-0.2	-0.6	-0.4
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8	3.0	3.0	0.1	0.1	0.1	-0.2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1.3	-0.3	0.8	-0.8	-0.9	-1.2	-1.2
巴西	0.1	-3.0	-1.0	-1.5	-1.7	-2.0	-2.0
墨西哥	2.1	2.3	2.8	-0.1	-0.2	-0.7	-0.5
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2.7	2.5	3.9	-0.1	0.1	-0.4	0.1
沙特阿拉伯	3.5	3.4	2.2	0.6	-0.2	0.4	-0.5
撒哈拉以南非洲	5.0	3.8	4.3	-0.6	-0.8	-0.7	-0.8
尼日利亚	6.3	4.0	4.3	-0.5	-0.7	-0.8	-0.7
南非	1.5	1.4	1.3	-0.6	-0.8	-0.6	-0.8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对区域经济或世界经济产生短期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 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巴西出口同比下降 14.4%，对俄罗斯出口下降 35.9%，对东盟出口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1.9 个百分点。但是，作为对冲，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亚投行”）成立，亚投行致力于推动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会为更多加盟国家带来利益。中国还积极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已经在促进外贸发展方面初现成效，现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较快，未来还可能带动更广阔的合作，包括和发达国家的合作。此外，中国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将中国的资本、技术、劳动带向世界。上述种种行动，加之面向发展质量的结构性改革，均体现出中国对世界经济所肩负的责任，以短期的消极影响换取长期的积极影响。正因如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 2015 年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预期，而对于中国，却在判断其跨境影响“看来比早先预期的更大”的前提下，维持了 2015 年和 2016 年经济增长 6.8% 和 6.3% 的预测不变。

事实上，当前发达国家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异常紧密，如果单方面采取行动，很容易让这种联系变成恶性循环，而如果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立场和对本国的间接影响后再采取行动，往往可以扭转对各方均不利的局面。因此，各国均不能在充满不均衡和脆弱性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做出伤害其他国家利益并最终会伤害自身利益的决策，在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下行之后，当前的世界经济已经不起更多的冲击。

（三）世界经济的出路：重振制造业，将缺失的动力找回来

目前，世界各国都陷入了一个困境，即使将扩张政策用到极致，也仍不能走出经济的低迷或者阻止经济的下滑。即便是中国，稳增长政策起到的作用，只是保障了经济增速稳步回落到合理区间，而并没有使其止降回升。因此，这个判断具有普遍性。借用英国《金融时报》的一句话：“不管是美国央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对全球增长引擎未来会出现在哪里一无所知。”这是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的一句话，即全球增长缺乏引擎，当前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发动引擎。

我们用简单的排除法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引擎不可能是货币政策，也不可能是财政政策，不可能是外需，也不可能是内需，而是必须进一步落到实处，能够大规模调动资本、技术、劳动力。继续分析，这个引擎不可能是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也不可能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虽然这两项可以大规模调动上述三要素中的两个要素，但仍不是全部。

在排除了所有可能之后，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即“重振制造业”。重振制造业必然带动生产性服务业，进而带动整个服务业发展，最终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重振制造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仅仅限于某个或某些国家。我们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性极强。制造业 PMI 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之一。国际商业信息研究与咨询机构 NTC - Research 集团测算了美国制造业 PMI 与 GDP 的关系为高度正相关。Anthony Josepha 等认为制造业 PMI 是监测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其变化会影响到央行货币政策决策以及金融市场走势^①。杨伏英、蒋兰陵（2008）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投资增加一个百分点，GDP 增加 0.836 个百分点^②。唐晓华、李绍东（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 GDP 提高 0.041208 - 0.102429 个百分点^③。

其次，从国别看，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都需要制造业的引擎发动。摩根大通报告显示，2015 年 10 月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指数为 51.3，为五个月以来的最高点，虽 11 月小幅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但制造业扩张的态势明显，最有力的依据是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上升，产量加速增长。制造业扩张是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中的一大亮点，世界主要国家都需要制造业为其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一方面，制造业的现有基础良好，另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前景光明。

一是美国。美国宏观经济数据中不利的部分，打击了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愿景，而最为关键的是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战略的动力正在弱化，尽管制造业正向美国回流，但美国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却在减弱，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指数已连续第五个月下跌。2015 年 11 月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为 48.6，不及预期的 50.5，较 10 月下降 1.5 个百分点，创 2009 年 6 月以来新低。分项目看，除就业指数表现较好外（51.3，较 10 月高 3.7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物价支付指数分别为 48.9、49.2、35.5，较 10 月数据均下跌四个百分点左右。^④事实上，美国围绕着“再工业化”战略而启动的一系列措施，为美国重振制造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相信只要将注意力从其他

①宋科进：《我国制造业 PMI、非制造业 PMI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展研究》2014 年第 10 期。

②杨伏英、蒋兰陵：《新加坡制造业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08 年第 24 期

③唐晓华、李绍东：《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12 期。

④数据来源：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

方面转移回制造业，经济增长的引擎即将启动。

二是欧元区。债务问题、难民问题、希腊问题、老龄化问题、外需的不确定性、大宗商品价格走低、通缩风险、欧元自身的风险乃至欧元区解体风险仍然是压在欧元区经济上的座座大山，而这种种“疑难杂症”绝非简单的量化宽松就能根治。寻求可能的出路要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健全制度以换取成员国的一致行动，二是深入挖掘或注入经济增长动力，考虑到现有基础，加速发展制造业是较为可行的选择。从数据上看，欧元区 2015 年 1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为 52.8，较 10 月高 0.5 个百分点。分国别看，德国和意大利 11 月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9 和 54.9，均较 10 月高 0.8 个百分点，且高于预期，而法国 11 月制造业 PMI 为 50.6，虽连续第三个月持平，但制造业扩张态势得以保持。可见，欧元区和各成员国的制造业扩张态势明显，除希腊外，欧元区各成员国制造业生产和新订单均保持增长，但扩张速度普遍较慢。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4 年欧洲竞争力报告》显示，欧盟制造业仍具备竞争优势，具有高技能工人，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高，在复杂、高质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但其需要加大研发投入，解决能源问题，以此保持竞争优势。

三是日本。2015 年三季度日本的经济止升复跌，安倍经济学在原来“三支利箭”的基础上，又释放出“新三支箭”，要实现这些目标，最需要的是资金，而从目前日本的财政金融现状看，均无力支持，逼迫日本必须另谋他路，而日本发达的制造业足以作为这一经济振兴战略的支点。虽然，当前日本制造业不及往日辉煌，但其基础依旧良好：市场影响力仍然巨大，技术研发水平与创新能力仍然领先，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中重要的位置。2015 年 11 月日本 Markit 制造业 PMI 为 52.8，较 10 月高 0.4 个百分点，高于预期，并创 20 个月以来新高。主要因素在于产出和新出口订单的增加，因产出和出口新订单增加。11 月制造业 PMI 产出分项指数为 53.9，较 10 月高 1.5 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为 53.2，较 10 月高一个百分点。而日本 11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为 51.6，较 10 月低 0.6 个百分点。可见，在服务业扩张速度放缓的同时，日本制造业正在加速扩张，可以成为其经济复苏的动力，而对于日本来说，振兴制造业并不是难事，关键是制定并实施一个务实的战略。

四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表的《2014 年工业统计国际年鉴》显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在 2013 年增加到 35.5%，其过去四年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仍然持续高于其 GDP 的增长率。分国别来看，俄罗斯 2015 年 1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为 50.1，较 10 月略下降 0.1 个百分点，该指标是在连续增长两个月后出现了下降；印度 1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为 50.3，较 10 月下降 0.4 个百分

点，已是连续第四个月下降。虽然两国的制造业 PMI 均处于下行区间，但仍未改变扩张态势。其中，俄罗斯产出和新订单指数的增速加快，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下降；而印度则恰恰相反，其产出及新订单指数增速持续放缓，新出口订单指数则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巴西的 Markit 制造业 PMI 已连续 10 个月低于 50，11 月该指标为 43.8，较 10 月低 0.3 个百分点，且新出口订单、新订单、就业、库存等分项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巴西制造业衰退程度愈发严重。事实上，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制造业仍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些国家也不乏制造业发展战略，均将制造业列为立国之本，希望利用成本优势实现工业强国的目标，目前正是其发挥作用，带动本国经济增长的绝好机会。

可见，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纷纷推出本国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加强对制造业的前瞻布局，力图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但是，发展到目前，这些战略大多“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当前，排除法得到的结论是：制造业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只有重振制造业才能将世界各国经济缺失的动力找回来，现在正是使那些还在“睡大觉”的制造业发展战略醒来的最佳时机。

二、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15 年 11 月，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6%，比 10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除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与 10 月持平外，其他各项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新出口订单、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生产活动预期等指数降幅较大。制造业 PMI 处于临界点以下，并低于历史同期水平，表明制造业下行压力较大，且出现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分化：大型制造业企业活动出现扩张迹象，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仍然非常困难。但要看到，随着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推进，加之“制造业 2025”的战略支撑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支撑，制造业发展质量会继续提高，并会从根本上带动我国经济“稳增长”。尽管如此，在采取推动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措施之前，仍必须认清其赖以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平稳，虽然一些数据表现不佳，但反映的问题并不严重，同时，结构优化体现在所有宏观经济领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有序地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在稳步提升。

第一，经济增速小幅回落，供给结构合理。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 2015 年前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9%，增速小幅回落，但仍处于 7% 左右的合理区间。三次产业增加值对 GDP 的贡献分别为 8%、40.6%、51.4%，增长速度分别为 3.8%、6.0%、8.4%，无论在规模还是增长速度上，第三产业均处于领先地位，同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加速增长，体现了经济结构

的优化。2015 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2%，增速同比回落 2.3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速回落拉低了整体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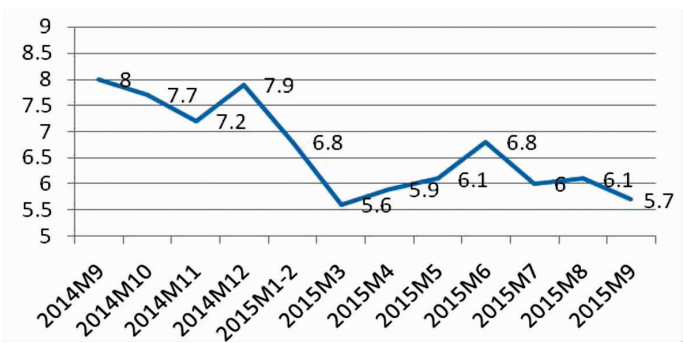


图 5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国内需求结构向好，国外需求不振。2015 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比上年同期回落。但是，民间投资、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和增速均较高，说明投资结构有所改善，且通过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推动预算执行等政策，改善了资金结构。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得到提高，说明国内消费出现了企稳向好的迹象；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继续超过城镇，说明我国乡村消费潜力正在逐渐释放；网上零售额加速增长，说明“互联网+”的新业态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速超过 GDP 增速，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带动个人和家庭消费强劲。2015 年前三季度，我国外需压力较大，但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从去年同期的 25% 降到 20%，这说明我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逐渐减弱。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进口替代因素使得进口额迅速减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贸易形势。但受国际市场动荡、资本外流等影响，利用外资出现了大幅下滑，对我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三，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2015 年前三季度，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存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说明在我国稳增长和低利率的政策环境下，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有所增加，银行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加强，且在“一带一路”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带动下，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作用突出。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4%，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动受季节和政策的影响较大，例如卷烟批发环节的税收增加、开学季、季节交替、猪肉供求调整、高温和暴雨天气以及基数因素等等。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5.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5.9%。当前我国价格指数涨跌的影响因素共存。抑制价格

进一步上涨的因素包括国家降低成品油价格、下调工商企业电价、夏粮丰收、工业生产增速回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等；而价格上涨因素包括降息降准、国家铁路货物统一运价提高、旅游相关价格上涨等等。两相权衡，未来价格上涨的压力较大。

表 3 2015 年 9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指 标	9 月		1—9 月	
	绝对量 (亿元)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亿元)	同比增长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271	10.9	216080	10.5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2484	8.2	101089	7.5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	—	21510	34.7
按经营地分				
城镇	21468	10.7	185843	10.3
乡村	3803	12.1	30237	11.7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2721	12.1	23071	11.7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764	8.1	6164	7.0
商品零售	22549	10.7	193009	10.4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1720	8.2	94926	7.5
粮油、食品类	1242	19.6	9616	14.2
饮料类	183	19.4	1424	15.4
烟酒类	377	16.5	2837	12.1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1106	8.5	9364	10.2
化妆品	179	8.7	1470	9.0
金银珠宝	239	6.5	2250	7.4
日用品	413	8.8	3466	11.8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713	11.3	5858	10.8
中西药品	720	13.3	5686	14.7
文化办公用品	286	23.2	2082	15.3
家具	223	19.1	1698	16.7
通讯器材	322	42.2	2451	35.8
石油及制品	1577	−7.2	13562	−6.9
汽车	3076	2.7	25282	4.2
建筑及装潢材料	280	23.2	2061	18.6

注：1. 此表速度均为未扣除价格因素的名义增速；2. 此表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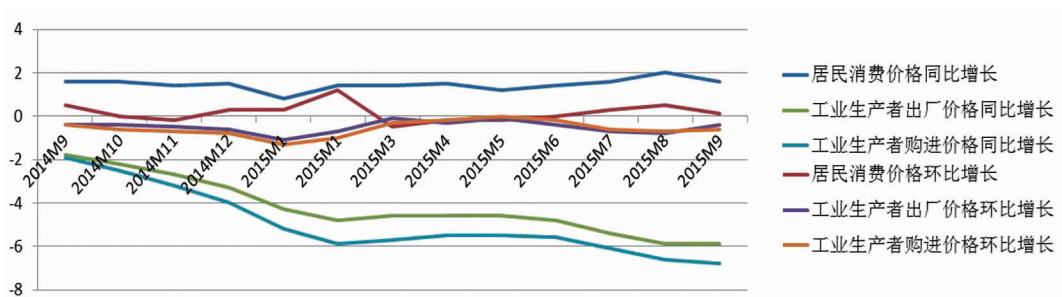


图 6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各项价格指数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相比之下，非制造业保持平稳增长，市场信心稳定。其中，服务业业务总量增速有所加快，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建筑业情况不容乐观，虽然业务总量总体保持增长，未来预期较好，但增速有所放缓，市场需求有所回落。与建筑业关系密切的房地产业，2015 年前三季度，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幅度尤大，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也同比大幅下降，而商品房销售面积快速增长，住宅销售面积增长尤快，说明房地产业去库存进度加快。此外，2015 年前三季度，我国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5.7%，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在稳步向好。

三、支持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财政运行条件

2015 年 1—9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4412 亿元，同比增长 7.6%；其中，税收收入 94631 亿元，同比增长 4.3%。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7166 亿元，同比下降 30.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0663 亿元，同比增长 16.4%。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6499 亿元，同比下降 20.3%。消除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的影响后，上述指标的同口径增幅分别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15.1%，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 26.4%，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下降 17.2%。当前，我国财政运行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财政收入形势进一步回暖，月度增长率波动较大。2015 年前三季度，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为 5.4%，增速较上半年累计增速提高 0.7 个百分点，虽然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仍然延续了今年以来的负增长态势，但负增长的速度总体趋缓。2015 年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形势进一步回暖，这在总体经济增长形势趋冷的背景下，已实属不易。从月度环比数据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体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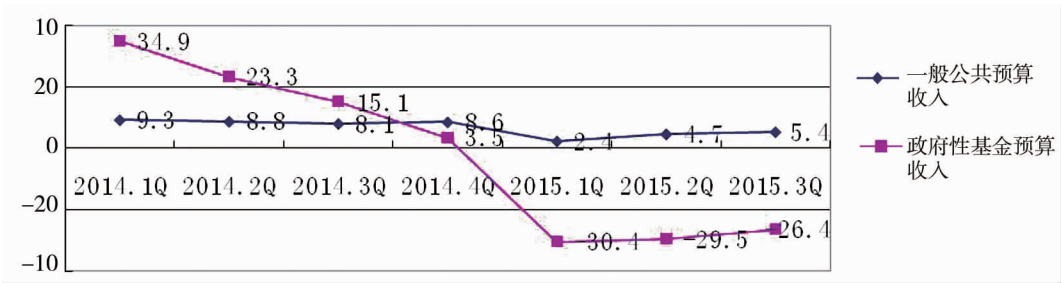


图7 2014年一季度—2015年三季度财政收入季度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第二，地方收入形势是整体财政收入形势的主要影响力量，其规模和速度的影响各有侧重。2015年前三季度，中央收入的规模和增速较上半年均有小幅提升，但地方收入增速强劲，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的稳步回升主要靠地方拉动。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29.3%，可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不利的形势主要由地方造成，而地方收入不利的形势主要仍由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导致。

第三，税收总收入增速回落，税收收入结构继续改善。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4.3%，比上年同期增速回落4.1个百分点。事实上，除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关税的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外，主要税种普遍实现增长。在税收收入增幅下滑的形势下，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8.6%，主要是得益于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此外，金融业、建筑业营业税、房地产营业税实现增长，而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出现下降，说明尽管经济下行，但部分服务业仍保持景气，经济结构得到优化，房地产销售市场活跃却没有带动房地产企业利润增长。此外，尽管税收增幅下降，但税制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主要表现为直接税收入形势持续向好。另外，虽然非税收入的比重仍然较高，但其增速有下降的表现。

表4 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增长情况 (单位：%)

年份	国内 增值税	国内 消费税	营业税	企业 所得税	个人 所得税	进口货物增值 税、消费税	关税	出口 退税	非税 收入
2014年前三季度	7.5	6.3	1.4	8.1	12.4	6.9	13.3	11.3	12.1
2015年前三季度	1.1	17.3	9.6	6.2	18.6	-14.8	-11.6	11.8	10.6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第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明显加快且增长加速，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下滑减速。2015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得以保持上半年的增长态势，增长幅度进一步提升，全国、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基本保持同速增长，而且全国、中央、地方财政支出

预算执行进度均超过 3/4，进度明显加快。三季度，主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约为 63%。其中，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的增长率均超过 20%，尤其是节能环保支出同比增长达 29.3%，说明我国在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并未忽视经济发展质量，反而加大了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持力度。自 2015 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以来，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减速逐渐放缓，三季度较上半年放缓幅度进一步增加，尽管如此，仍未扭转负增长态势。支出同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来自地方，而地方支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大幅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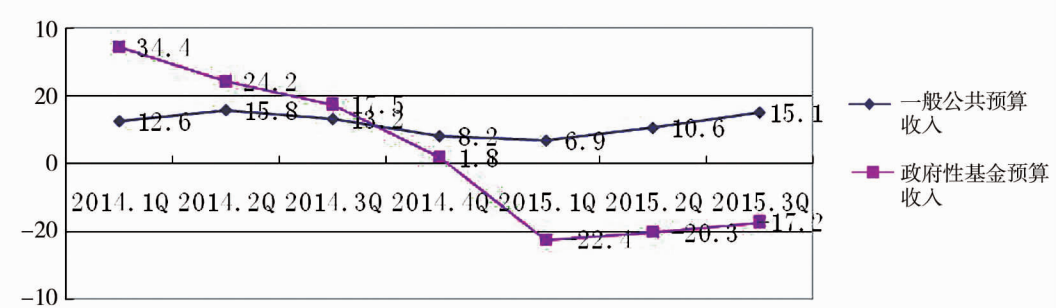


图 8 2014 年一季度—2015 年三季度财政支出季度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四、为制造业发展创造有利财税环境的政策建议

目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悲观情绪开始产生并蔓延，而我国 2015 年三季度经济增速下降至 6.9%，好似也印证了对此局面的判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应静下心来思考经济增长动力问题，而不是像此前一样，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经济政策如何扩张上。中国的发展目标、战略、规划一直都很明确，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依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沿着既定的发展道路前进。但是，仍需要有超前的思维，在发展动力已成功向服务业转化的前提下，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进一步振兴制造业，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双引擎驱动，以制造业发展带动更高水平的服务业发展，进而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从财税支持方面需要做到两点：首先，要做好前期准备，给制造业发展打造有利的财税环境；其次，要充分了解制造业发展现状，准确把握制造业需要怎样的财税支持，为其量身打造成系统的财税支持方案。由于第二点内容庞大且有较高技术性要求，需要产业技术人员、财税专家和政府部门通力协作。受篇幅和能力所限，本文对制造业发展

创造有利的财税环境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坚持“减税降费”，致力于“以减法换乘法”

2015 年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以“减税降费”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为制造业发展创造良好财税环境的重要举措。目前来看，减税降费的举措主要惠及小微制造业企业，其原因是我国制造业小微企业面临发展困境，越来越多倒闭情况发生。2015 年 11 月制造业 PMI 数据显示，大型企业 PMI 为 51.2%，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呈加速扩张态势；中、小型企业 PMI 为 48.3% 和 44.8%，分别比上月下降 0.4 和 1.8 个百分点，表明中小型制造业企业活动处于加速收缩态势，具体表现在订单下降、减产等方面。然而，制造业小微企业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对国民经济有重要贡献，他们的发展需要良好的财税环境。而减税降费真正发挥了财政政策作用，以财政收入的减少换取其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但是，目前对于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重出台、轻宣传和落实，已有的优惠政策过多过杂，不易运用，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需对已出台的涉及小微企业的优惠财税政策系统梳理，进行归纳合并后印刷成册，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在财政、税务机关等相关网站上进行政策宣传，在政务大厅、自助办税终端、受托代征机构等相关地点的醒目位置张贴相关宣传材料，让小微企业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用足各项优惠政策，让减税降费行动成为真正减轻制造业企业负担的有效路径。

（二）建立现代财政体制，使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现代财政体制可以作为最大程度提升财政支持效能的依托。分税制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革形成了中央、地方间的财政收入结构和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在此基础上，根据“制造业 2025”的内容，完成在政府间划分事权并按照“权责对等”原则配置支出责任的任务。首先，现代财政体制支持制造业发展，要求三个层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一是划定政府事权范围，必须首先要处理好制造业振兴过程中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根据相关受益范围和外部性，划分各级政府的专属事权和共同事权，按照“权责对等”原则匹配相应的支出责任。三是根据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的要求，确定委托事权及其支出责任，重点处理容易出现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事权。其次，现代财政体制支持制造业发展，要求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清单”。需要在权力清单的基础上，形成权责对等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清单，其中要包括“制造业 2025”发展战略落实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清单。清单要将共同事权、委托事权作为重点，致力于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做到细致具体地反映每项事权及其背后支出责任的归属，且能够与预算支出科目

相联通，以方便各级政府预算编制。最后，现代财政体制支持制造业发展，要求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各级政府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主要应由本级财政收入保障，缺口由上级政府拨付一般转移支付弥补。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地方收入体系并科学划分财权。同时，需要明确，专项转移支付只能用于委托事权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

（三）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债券管理，为制造业打造适宜的地方财税环境

制造业的发展也需要良好的地方财税环境。2015 年我国发布了《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并出台一系列举措，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和管理进行规范。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可以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分别面向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和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分别列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这不但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促进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化，还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为地方财政支持制造业发展拓展了空间。

但是 2015 年地方债券发行接近下达额度的半数，第一批一万亿元额度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也完成过半。地方债发行和置换的进度并不理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关键的是财政部要求地方政府置换债券自发自还，债券风险被抬高，同时债券利率也被降低，收益不足以弥补风险，致使作为投资者的商业银行反应不够积极。另外，由于最高期限 10 年、加权平均期限 6.45 年的已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仍未与资本性项目的投资回收期相匹配。为此，需要进一步理顺财政和金融的关系，加强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赋予地方政府债券较高的收益，同时，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中长期债券的比重，提高债券期限的上限，满足地方政府对长期资金的融资需求。

（四）加强财政金融合作和政府购买服务，为制造业寻求充足的财源支持

2015 年三季度，财政和金融的深度合作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均开始萌芽，二者合作的巨大优势在于：积极财政政策将通过金融杠杆放大政策效果，这将是实施财政政策的新的有力抓手，支持制造业的财政政策也可以充分利用财政金融合作。目前可以将其广泛运用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这样，即可以获取成熟经验用于制造业发展领域，又可以通过社会资本介入来节省财政资金用于发展制造业。当然，其前提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但需要看到，虽然 PPP 可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金，是缓解财政资金压力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可选择手段，但其广泛应用还需立足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因为 PPP 项目必须同时保证社会资本获得长期稳定收益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如果收益难以保证，必然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风险，也会对社会资本失去吸引力。我国 PPP 模式正处于不断

完善成熟的过程中，需进一步科学认识 PPP 的内涵和外延，分析其在我国所能发挥的具体作用和可能存在的弊端，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出台更为谨慎和规范的政策。还要考虑地方政府当前和未来的财政承受能力、社会资本的选择、建立健全示范项目的跟踪指导、对口联系和动态调整机制等问题。

综上所述，2015 年前三季度围绕“稳增长”的中心任务，我国出台了多项积极财政政策。其中，吸引社会投资的 PPP 模式、盘活存量资金、地方债券发行和债务置换、减税降费、支持小微企业的多项举措成为亮点，这些都可以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围财税环境。未来还需要专门为我国制造业“量身制作”一套合适的、考虑产业配套能力、中间货物、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技术等种种因素的财税支持体系。甚至可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的财税支持政策协调配合，在厘清内在联系、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出台一整套财税支持方案，形成战略合力，为助推经济发展引擎发挥最大效能。

参考文献：

1. 唐晓华、李绍东：《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12 期。
2. 张慧莲：《全球性通货紧缩阴霾难散》，《证券日报》2015 年 8 月 29 日。
3. 王晓薇：《拉美：永远走不出债务“噩梦”？》，《华夏时报》2015 年 9 月 11 日。
4. 张锐：《“金砖引擎”面临大修“金砖国家”未来更有成色》，《上海证券报》2015 年 9 月 2 日。
5. 宋科进：《我国制造业 PMI、非制造业 PMI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展研究》2014 年第 10 期。
6. 杨伏英、蒋兰陵：《新加坡制造业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08 年第 24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任朝旺

· 区域 经济 ·

深圳发展湾区经济监测指标体系建议

綦鲁明

摘要：湾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突出亮点。近年来，深圳提出发展湾区经济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这种思路具有相当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本研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考虑深圳实际情况，从创新辐射、开放引领、要素聚集、互联互通、基础支撑五个维度构建了深圳湾区经济的指标体系。评价结果显示，目前深圳湾区经济处于起步快速发展期，并且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湾区经济 创新 开放 评估

作者简介：綦鲁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湾区经济”作为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是当今世界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滨海湾区建设浪潮高涨，湾区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湾区经济形态已日渐成熟，并呈现出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聚集性、协同性五大鲜明特征。如美国的纽约湾、旧金山湾，日本的东京湾等。许多城市凭借有利的湾区经济发展势头，实现了整合城市资源、提升发展水平的目的，最终成为国际化城市中的璀璨明珠，如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日本的东京、加拿大的温哥华、澳大利亚的悉尼等等。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时期，需要全国各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各尽所能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要冲。2014 年 12 月 25 日，深圳市委发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湾区经济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发展湾区经济，将深圳建成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撑和桥头堡。

深圳发展湾区经济在国内尚属首例。通过湾区经济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也是深圳市提出的独特思路。本研究试图设计一套深圳发展湾区经济的监测指标体系，以廓清深圳湾区经济的主要内涵，衡量深圳湾区经济发展的基础、目标、途径，监测湾区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为深圳推动湾区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深圳发展湾区经济监测指标体系的框架设计

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湾区经济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发展湾区经济的战略定位、未来总体目标和五大功能要求，按照指标设计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同时遵循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我们从创新辐射、开放引领、要素聚集外溢、互联互通、基础支撑水平五个维度，设计了由五大类一级指标和 30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见表 1），用来监测分析深圳发展湾区经济成果，并可与世界其它湾区经济相比较。

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的设计与选择的原则是尽量能够反映一级指标，同时体现系统性、代表性、关联性、区域性、可操作性及目标导向性的要求。二级指标兼有比率型指标和绝对值指标，使指标体系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既有正向指标也有负向指标，使指标评价更简便易行。

表 1 深圳发展湾区经济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创新辐射水平	1.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人员数量	个
	2. 研究开发机构数量	个
	3. 高等院校及学生数量	个
	4. R&D 投入占 GDP 比重	%
	5. 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6. 每万人口专利数量	件
	7. 创新产品产值	亿元

续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开放引领水平	8.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
	9.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 比	%
	10. 对外直接投资额	亿美元
	11. 海洋产业产值	亿元
要素聚集外溢水平	12. 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数量	家
	13. 外籍人士占城市人口比重	%
	14. 国际会展年举办量	次
	15. 金融机构在境内外设立企业数量	个
互联互通水平	16. 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数量	个
	17. 网络基础设施宽带速度	Mb/秒
	18. 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数	条
	19. 年机场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基础支撑水平	20. 空气质量指数	
	21. 水质指标	%
	2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23. 道路网水平	公里/平方公里
	24.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覆盖率	%
	25. 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律师数量	个
	26. 每万人拥有的文化艺术场馆数量	个
	27. 人均 GDP	元
	28.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9. 就业水平	%
	30. 人均预期寿命	岁

二、关于深圳发展湾区经济监测指标体系的说明及评价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深圳当地实际情况，从理论上对指标体系做简要说明，同时选取全国、广东省、深圳市近些年发布的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评价。

（一）创新辐射水平指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各国成功的湾区经济都紧紧依靠创新。如旧金山湾区就是凭借“硅谷”密集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打造成了世界一流湾区经济。与旧金山相比，深圳同样拥有优越的地理区位，科技产业也有较好基础。目前，创新已经成为了深圳城市发展的灵魂。未来，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将是永远推动深圳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圳发展湾区经济应以创新为目标导向，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催生众多创新机构和创新成果，使湾区逐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引领全球产业发展。

设计创新辐射指标，主要从创新基础指标、创新动力指标和创新产出指标三个层面考虑。创新基础反映创新的现有条件与环境，是未来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人员数量、研究开发机构数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高等院校及学生数量指标较为落后。目前深圳的创新硬件基础较好，但后备人才力量较为薄弱。创新动力指标主要包括 R&D 投入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数据显示，深圳的创新动力十足。创新产出指标包括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万人口专利数量、创新产品产值。数据显示，近几年深圳创新成果产出颇丰，特别是每万人口专利数量位居国内第一。

1. R&D 活动人员数量

R&D 活动人员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2013 年深圳市 R&D 活动人员为 18.7 万人，较 2009 年增加 4.11 万人，占全省总数的 35.25%，远高于广州的 13.95%。

2. 研究开发机构数量

研发机构是研发活动的重要组织，是创新的基础平台和中坚力量。2009 年全市有各类研究开发机构 925 个，主要涉及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2009 年—2011 年，深圳新增的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各类创新载体达 300 余家，相当于前 28 年存量总和的近两倍。

3. 高等院校及学生数量

人才是创新的主体。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院校及学生数量是衡量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更是创新活动的后备力量所在。目前，深圳已建成高校仅 12 所，在校生 14.51 万人。深圳高等院校虽有一定发展，但数量与质量都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4. R&D 投入占 GDP 比重

集中反映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对创新的投入强度，是创新活力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2009 年全市 R&D 经费投入占 GDP 之比为 3.41%。2014 年深圳

全社会研发投入 640 亿元以上，是 2009 年的 2.3 倍，占 GDP 比重约达 4%，占比相当于世界第二的韩国水平，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5. 全员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将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除以同一时期全部从业人员的平均人数来计算的，是考核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2010 年深圳市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已从 2006 年的 8.23 万元增加至 12.46 万元，增幅达到 51.4%。2013 年全市第二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快报数为 15.54 万元/人，说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第二产业容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下降，意味着深圳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6. 每万人口专利数量

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研产出质量和市场应用水平的综合指标，是国际上普遍用来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通用指标。目前，深圳每万人口专利数量在国内是领先的。据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统计，2014 年深圳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66.2 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6 倍，居全国各大中城市首位。

7. 创新产品产值

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市场效益较好，且创新活跃，从而拥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2014 年全市超过三万家的科技型企业中，销售额超千亿元的三家，超百亿元的 17 家，超十亿元的 157 家，超亿元的 1203 家。从产值情况来看，2013 年全市实现新产品产值 6585.8 亿元、新产品销售收入 6770.4 亿元，分别占广东省的 40%和 37.58%；全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 8649 亿元，同比增长 9.64%，占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为 61.2%。

（二）开放引领水平指标

开放是世界湾区经济的共同特征。对深圳发展湾区经济而言，开放的意义更为突出。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深圳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沿。目前，深圳已经形成了开放发展的良好硬件基础，积攒了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唯有继续走好开放之路，深圳湾区经济才能在不浪费既有经验和已形成的良好基础资源的情况下，在新的历史时期谋求新的发展局面，再造新一轮开放红利期，掌握未来国际竞争主动权。可以说，开放是深圳发展湾区经济的基本要义所在。

经济开放的最基本特征是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深度较大，商品、资本跨国界流动较为自由，且规模较大。同时，深圳湾区濒临海洋，海洋产业也是湾区经济的内在含义。

因此，开放引领水平可以从贸易、投资开放及海洋产业发展三个方面判断。从当前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看，贸易指标主要体现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目前深圳服务贸易发展已有较好的基础，但未来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投资开放包括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 比重、对外直接投资额。数据显示，近些年来深圳投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海洋产业发展主要表现为海洋产业产值，从发展趋势看，深圳海洋产业具备很大潜力，将为开放发展创造新空间。

1.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货物贸易快速增长，2013 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贸易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从世界经济看，当前，世界经济已经步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达到 70%，服务贸易占世界货物贸易比重约为 25%。2014 年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货物贸易的比重只有 12.5%，比全球平均水平低 10% 多。一般说来，服务贸易发展与商品贸易发展相互补充，相互推动。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发展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另一方面，服务贸易的发展为商品贸易发展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在新的形势下，发展服务贸易是从制造经济转向服务经济，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战略抉择。

从世界知名湾区发展历程看，大多伴随港口城市的功能提升，不断转型升级，大致经历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四个发展阶段。因此，随着深圳作为港口城市功能的提升转型，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指标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不仅能直接反映深圳湾区贸易结构、贸易方式的合理程度，同时也能反映深圳湾区是否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从而能够掌握发展主动权。在当前时期，这一指标越高，说明贸易转方式效果越好，掌握发展主导权能力越强，反之则反是。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深圳的服务业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2012 年深圳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30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2%，位居全国第三。更难得的是，深圳是全国综合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的领军者，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已经集聚了全国 80% 以上的供应链企业，涌现出一大批如怡亚通、朗华、信利康、越海、普路通、年富、一达通等供应链管理创新服务龙头企业，并有越来越多的供应链企业已经走出深圳，在全国乃至全球布局。深圳的现代服务业贸易优势较为明显。

2.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 比重

国际资本流动量是衡量国际资本（资金）被允许，甚至自由进出一国或一地区的规模。因此，外资流动额是衡量开放水平的又一重要指标。一般说来，一国（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好，对外开放程度高，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就强，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直接投资的规模就大，其占 GDP 的比重就高。反之则反是。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外国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重要载体，其流入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推进技术创新、增加就业、扩大对外贸易等路径对推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会产生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因此，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 比重是衡量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

深圳是沿海城市，是我国开放程度高、经济基础好的现代滨海城市，利用外资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近几十年来，深圳利用 FDI（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其实际利用外资额在 1979 年—2013 年间，年平均增速达到 22% 以上。2014 年实际利用金额 58.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6.2%，占广东省的 21.76%。通过长期实践，深圳已经积累形成了引进和利用外资的经验。未来，深圳湾区经济走好开放发展之路还要继续参考这一指标。

3. 对外直接投资额

对外直接投资是湾区经济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举措。深圳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大，且增长迅速。截至 2013 年底，全市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56 亿美元。2014 年境外投资协议中方投资额 52.6 亿美元，增长 139.9%；新签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金额 126.8 亿美元，约占全国地方总量的 11%。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本土企业已设立境外企业和机构 405 家，遍及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投资 27.3 亿元。从存量看，深圳对外投资存量在国内大中城市排名第一，约占全国地方总和 10% 以上。

4. 海洋产业产值

海洋产业是湾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海洋产业是湾区经济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因而也是开放发展的重要体现。海洋产业产值越高，说明湾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越高。深圳拥有海岸线 257.3 公里，海域面积 1145 平方公里，是国内距离深海最近的城市之一，拥有发展海洋产业的独特优势。根据《深圳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 年）》确立的发展目标，到 2015 年，深圳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初步建立，全市海洋生产总值将达 1600 亿元。目前深圳海洋产业已初具规模，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三）要素聚集外溢水平指标

从世界湾区经济发展情况看，各著名湾区除了具有发达的创新系统和开放的经济结构以外，还具备了强大的要素集聚外溢能力。湾区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处于龙头带动地位，各种资源会自然地 toward 湾区地带聚集，以了解信息、汲取养分、发展壮大，然后又向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分散、辐射、外溢，从而形成各种要素资源的聚集外溢效应，

推动创新与开放。可以说，高效的要素配置能力是世界湾区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满足“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强要素聚集辐射能力，是深圳湾区抢抓历史机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结合世界湾区经验，深圳湾区要素聚集外溢水平可以通过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数量、外籍人士占城市人口比重、国际会展年举办量、金融机构在境内外设立企业数量等指标进行监测。总体上，目前深圳要素聚集外溢能力虽有一定长进，但水平仍然较低，这将直接制约深圳湾区经济的未来发展。

1. 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数量

跨国公司总部是公司首脑，区域总部作为和联系公司总部与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中间组织形式，在公司全球网络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的核心职能是促进公司各种经营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金资源等有形资产和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和诀窍等无形资产）在世界范围内或区域内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提高公司决策效率。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对促进湾区高端价值服务业态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深圳毗邻香港，同时还有制度先进、产业发展谋求高端、公共服务完善等优势，已经形成了科技创新和总部聚集区。2012 年深圳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数量仅三家。湾区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

2. 外籍人士占城市人口比重

城市外籍人士的情况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和魅力指数。外籍人士，特别是高端金融、贸易、航运、高科技人才，不仅会繁荣一般商品交易，而且会带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促动高端金融贸易业态和高端技术研发业态的快速发展。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须是外籍人士活跃的地方，才能称得上国际都市。2012 年深圳有 26000 多名外籍人才常住，已认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达 184 名，外籍人士占城市人口的比重是 0.19%，但与世界知名湾区城市相比，这一比例仍然是相当低的。

3. 国际会展年举办量

国际会展举办量是经国际展览联盟（UFI）和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组织、认证的符合国际化标准的会议和展览数量。国际会展的联系沟通作用十分明显。通过会展中的沟通交流，商家之间的信息联通及人脉关系将得以建立，生产要素、产品、资金等将得以充分涌流。许多发达国家将国际会展视作争夺世界市场的场所，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深圳发展湾区经济，须在国际会展举办上有重大突破，以此促进要素聚集辐射能力，提升城市国际形象和影响力。2012 年深圳国际会展举办量为 21 次，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有较大差距。

4. 金融机构在境内外设立企业数量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深圳发展湾区经济，要重视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融业，通过外设分支机构等，带动境内外各地金融业发展，为当地实体经济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深圳的招商银行在国内 26 个省市自治区设有分支机构，平安保险在全国各地拥有上百家分支机构。在本土金融机构国际化方面，截至 2012 年 8 月底，深圳金融机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数量达到 27 家，占本土机构总数的 50%。其中，深圳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数有两家，境外分支机构总数 15 家，包括分行、子公司及代表处；证券业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有 10 家；保险业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有两家。

（四）互联互通水平指标

纵览世界著名湾区，如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等，都开放互通。通过互联互通，优化湾区经济空间布局，加速进入世界一流经济体队列，是这些著名湾区共同的经验。借鉴国际经验，通过与湾区内外各城市建立联通关系，形成协同发展格局，才能助力深圳成为湾区的领头羊，为创新与开放发展提供动力。

按照指标设计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结合深圳实际发展情况，互联互通水平可以从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数量、网络基础设施宽带速度、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数、年机场旅客吞吐量等指标进行考量。目前，深圳已经建立了互联互通的良好基础，未来仍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这一优势，使深圳真正成为“一带一路”中的重要城市。

1. 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数量

国际友好城市数量是一个城市在国际上拥有的“亲戚朋友”数量，是一个城市国际关系网发达程度的反映。2013 年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盟时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内容就是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深圳毗邻香港、背靠珠三角、地处亚太主航道，外贸发展迅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 5000 亿美元大关，出口总量超过 3000 亿美元，均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则正是民心相通的直接体现。截至目前，深圳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达 65 个，五年增加一倍。

2. 网络基础设施宽带速度

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反映出湾区经济互联互通的信息基础设施状态，特别是信息流动速度是一个关键，网络宽带速度是信息流动速度的一个能较好反映互联互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受信息产业较为发达的影响，目前深圳已经建立了较好的网络基础。

3. 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数

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手段，国际集装箱航线是道路联通、贸易联通，乃至货币互通的集中体现，对推动湾区城市与世界各地港口城市协同发展非常重要。目前深圳港已开辟通往全球各地的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达 217 条，拥有各类泊位 159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 67 个，集装箱专用泊位 46 个，全球 90% 以上的超大型集装箱船都会在深圳港靠泊。

4. 年机场旅客吞吐量

年机场旅客吞吐量是经航空进出港区范围的年旅客数量，反映空港的枢纽作用与水平。2009 年旅客吞吐量 2448.64 万人次。2013 年完成旅客吞吐量 3226.8 万人次，成为国内第六个旅客吞吐量突破 3000 万人次的大型机场。2014 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3627.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4%；航班起降 28.63 万架次，同比增长 11.2%。

（五）基础支撑水平指标

基础支撑是湾区经济发展的基石。没有坚实的基础支撑，湾区经济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长远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各地的湾区因濒临海洋，大多气候宜人、水量丰沛、风景秀丽，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优美的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是人们从事创新和经贸活动的重要诱因，美国旧金山湾区硅谷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世界发展较好的湾区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经济富裕度高，经济基础设施好，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从物质上对人才、资本、创新资源等形成强大吸引。可以说，宜居和经济富裕共同构成了世界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深圳湾区背靠大陆、濒临南海，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湿润、温度适宜，且已经形成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基础支撑水平同样可从宜居和经济富裕水平两个方面考量。宜居可从空气质量指数、水质指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道路网水平、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覆盖率、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律师数量、每万人拥有的文化艺术场馆数量等指标进行测量，经济富裕程度则可从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水平、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衡量。总体上，深圳的自然环境较为优越，但由于人口众多，城市面积有限的影响，在城市基础设施及文化设施上的建设仍显滞后。深圳的经济富裕程度指标则显示较好，为湾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 空气质量指数

空气质量指数（AQI）是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在湾区地带，由于濒临海洋，空气温和湿润，空气流动速度快、回旋空间大，空气大都是优良级。近几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深圳大气质量明显提升。2014 年，深圳市空气质量指数在

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四，是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唯一人口规模超千万的城市。2014 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AQI 范围在 33~135 之间，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天数合计 78 天，占总监测有效天数的 94.0%，比上年同期上升 4.0 个百分点。可吸入颗粒物（PM₁₀）平均浓度为 66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同期上升 2 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_{2.5}）平均浓度为 43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 1 微克/立方米。全市平均降尘量为 3.9 吨/平方公里·月，达到广东省推荐标准，比上年同期下降 0.4 吨/平方公里·月。总体上，深圳的空气质量位居国内前列。

2. 水质指标

水质指标是描述水质状况的一系列标准，是判断和综合评价水体质量并对水质进行界定分类的重要参数。水质好、水量丰富是湾区地带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2014 年深圳全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与上年同期持平。全市辐射环境状况良好，各监测点位的环境地表 γ 辐射剂量率在正常天然本底水平范围内上下涨落，未出现异常；环境 γ 辐射累积剂量监测结果处于正常水平。全市降水 PH（酸碱度）平均值为 4.70，比上年同期下降 0.29；酸雨频率为 64.0%，比上年同期上升 0.4 个百分点，酸雨污染基本保持稳定。总体上，水环境较好，保证了生态质量和水平，满足宜居之需。

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反映城市绿色生态建设水平。深圳目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6.84 平方米。

4. 道路网水平

道路网是交通的基本载体，其发达程度直接关乎交通水平。至 2010 年，全市各等级道路网总长约 6041 公里，其中次干道以上等级道路通车里程已达到约 2154 公里，次干道以上等级路网密度约为 2.39 公里/平方公里，仅达到深标要求的约 50%（按深标中值计算）。

5.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覆盖率

医疗是一个城市是否宜居的必备要素。反映医疗水平的指标很多，最典型的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覆盖率。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覆盖率看，2011 年全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量达 1034 万人次，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覆盖率达 100%，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建档 965.63 万人，高血压规范化管理 12.35 万人，糖尿病规范化管理 3.5 万人。目前，深圳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已经达到了国内一流。

6. 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律师数量

良好的社会公共治理是城市宜居的重要保障。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律师数量是反映国际化城市公共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据统计，目前深圳执业律师数量约 8000 人，在国内居于前列，但与世界发达湾区城市的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7. 每万人拥有的文化艺术场馆数量

包括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文化艺术场馆，是衡量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环境的重要指标，反映城市政府对文化生活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体现国际化城市提高宜居水平的努力程度。据统计，目前深圳文化馆（站）69 个，公共图书馆（室）621 个，1000 平方米以上的文化广场 381 个，博物馆 36 个，美术馆 11 个，基本形成了遍布全市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但从每万人拥有的文化场馆数量看，这一比例仍然较为低下。

8. 人均 GDP

人均 GDP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运行状况及整体发展水平的最有效工具之一，湾区经济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经济的重要引擎。2014 年深圳市 GDP 达 16001.98 亿元，全市人均 GDP 约为 2.4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4.95 万元），同比增长 7.7%，居内地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超过北京、上海、广州三市，相当于 2013 年韩国的水平。

9.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被认为是消费开支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2014 年深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948 元，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34579 元，占比为 84.4%，是居民主要收入来源；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2375 元，处于负值区间，是深圳“吸引力”和“包容性”的体现。

10. 就业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率反映当地就业情况，也是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反映。近几年来，随着就业、人才引进、人事多项制度改革有序推进，深圳就业规模持续扩大。2011 年末全市从业人员 765 万人，同比增长 0.9%，从业人员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达 73.1%。2011 年至今，平均每年新增 10 万人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5% 以内，“零就业家庭”动态归零。应届毕业生就业率 92% 以上。这都显示深圳的就业形势一直较好，也显示了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11. 人均预期寿命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城市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社会生活质量高低的综合反映。2011 年深圳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了 78.3 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近四岁，也高于国际上公认 77 岁的现代化水平。到 2015 年全市常住人口平均期望寿命有望提

高到 79 岁。

三、结论

与国际著名湾区的基本特征相比较，深圳已经拥有了湾区经济发展所必备的要素和条件，可以说，深圳已经具备湾区经济的雏形。现阶段，深圳发展湾区经济又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综合地看，深圳湾区经济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创新辐射、开放引领为目标导向，以要素聚集外溢和互联互通为发展动力，以宜居和经济富裕程度为基础支撑的滨海经济形态。

从各种指标的评价结果看，深圳目前经济水平较为发达，拥有适宜的居住自然环境，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亟待改进；互联互通基础良好，但要素聚集外溢的能力仍然不强；开放和创新虽有较好的基础，但目前都正处升级转型，谋求更高水平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目前深圳湾区经济发展正处于起步快速发展期。

展望未来，深圳湾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关键是要进一步夯实环境保护基础，造就优美舒适居住条件；改进城市道路管网及人文法律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软硬件基础；千方百计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推进各类要素，特别是世界高精尖人才、技术汇集深圳；进一步加强航空、铁路、公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推动与周边乃至国际城市的互联互通，从而使深圳在未来 10~20 年内，建成创新基础坚实、创新能力卓越、创新成果卓著、创新辐射功能强大的世界级创新型城市，同时建成服务贸易比重较大、海洋产业发达、投资水平更高，开放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开放引领作用日益强化的国际化城市。由此，湾区经济形态和布局将得以基本形成，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桥头堡作用凸显，成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极强辐射力与影响力的核心城市。

责任编辑：沈家文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互联网金融 产业融合研究

闫妍 杨灵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产业结构“软化”和经济体系“服务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融合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受技术创新、规制放松、管理创新等多方面、多层次因素的驱动。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显著地体现了产业融合的特性，具有创新优化效应、竞争能力效应、绩效提升效应等融合效应。近两年来，中国互联网金融产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受经济体制、技术水平、产权制度等因素制约，互联网与金融的产业融合目前正在步入深度融合的选择阶段。为促进中国互联网金融产业从技术融合向业务融合、市场融合发展，最终实现产业融合，政府监管体制方面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是互联网金融走向深度融合的源动力和保障体系。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logistic 模型 业务融合 市场融合 产业融合

作者简介：闫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运管理部业务经理；
杨灵，沈阳工业大学副教授。

一、引言

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的融合为“金融电子化”创造了充分条件，而信息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并与传统金融产业融合，又使得金融电子化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断强化。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对于金融行业的改造开始加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金

融发展异常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从网络证券交易到网络金融信息服务、从网络个人理财到网络企业理财、从网络银行到网络保险的多元化、全方位金融服务。2013 年可谓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①，这一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各类网络理财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仅促进了基金业的发展，更加快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从本质上讲，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过程中新产业形态的形成，是一种产业创新。产业融合通常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结合型融合、替代型融合与互补型融合。其中，结合型融合的融合度最高，替代型的融合次之，互补型融合的融合度最小。尽管经济发展中产业融合时时在发生，却并不是每一种类型的产业融合都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只有结合型融合比较容易产生新的产业形态^②。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传统金融业与互联网行业还处于产业分立的状态，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产业边界，彼此的技术基础和提供的物理网络存在天壤之别，处于非竞争关系之中。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计算机网络等信息科学技术在传统金融业中广泛应用，在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行业出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企业融合等产业融合现象，产业之间的产业界限逐渐模糊，形成了融合趋势并演化成互联网金融产业。本文从产业融合视角，探讨传统产业与互联网产业融合形成互联网金融的演化机理和发展动因。

二、互联网金融产业定义的厘定

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 2013 年以来最热门的话题，但是对于什么是互联网金融还缺乏一个有效定义。虽然谢平和邹传伟在 2012 年提出了最早的定义，把互联网金融定义为一种金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支付便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非常低；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银行、券商和交易所等金融中介都不起作用；可以达到与现在直接和间接融资一样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幅减少交易成本。但如果按照这个定义^③，符合这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金融模式很难存在，应该说目前还没有“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出现。

①从 2013 年下半年开始，阿里巴巴、百度、腾讯、360 以及其他中国的互联网巨头纷纷冲进互联网金融市场并投下了巨资，触发了国内互联网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大批投资者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市场。

②所谓新的产业形态，是指不同于以往的构成独立产业系统的产业形态，并非绝对意味着原产业形态的完全消失或者完全替代。

③互联网金融是一个谱系（spectrum）概念，涵盖从传统银行、证券、保险、交易所等金融中介和市场，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情形之间的所有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

那么，当下大家探讨的互联网金融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综合业内存在的各种对互联网金融概念的探讨，各种模式千差万别，一直处于模糊概念之中，很难用一个统一的定义来进行界定，所以这里也就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梳理。总体而言，大家习惯于把所有涉及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化经营模式定义为“互联网金融”，当然也存在另一种更简单、直接的理解，即只要互联网企业介入了金融领域的业务，就是互联网金融；而金融企业使用互联网手段，则习惯性界定为“金融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金融。^① 这种定义方法，固然简单明确，却由于单纯的主体性划分引发了业内大量的异议，而且因为它排除了两者融合的可能性，导致其实质意义非常有限。我们更加推崇李均的理解：“基于互联网思想的金融……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新的参与形式，而不是传统金融技术的升级……互联网金融引发的在交易主体、交易结构上的变化以及潜在的金融民主化，才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个论述。”即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的新领域，是互联网产业与金融产业不断演化融合的新兴产业。

三、文献综述

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 20 世纪末期的世界面貌，互联网技术已经深入到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便是与金融产业的结合，这种创新的金融活动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大大扩展了金融服务的业务活动范围。金融机构逐渐开始利用互联网来改造、提升传统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是一个伴随实务发展而出现的概念，并非是一个理论性概念。因此，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定义、运行机制、经济影响的探讨呈现出非系统性的特点。

学术界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经历了从热情高涨到逐渐衰退的过程。2001 年—2002 年，美联储纽约分行、巴塞尔银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先后多次召开会议，探讨有关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议题，在会议中学者们从多种角度讨论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行业的融合问题，但是在此之后，学术界和各类金融机构对互联网金融的热情似乎突然消失了，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和讨论也越来越少（殷剑峰，2014）。但由于互联网技术在 21 世纪仍然持续进步，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的优势也逐渐展现出来。互联网金融逐渐摆脱仅作为传统金融机构降低运营成本的工具地位，逐渐将“开放、

^①这种概念的划分是源于内在的、未明确指出的一种指导思想，即各种产业都必然要进行互联网经营的信息化改造，却不是互联网企业会渗透到其他各种产业的业务中去。

平等、协作、分享”的精神渗透到传统金融业当中，从供求两端对金融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这种影响尤为明显。从网络的普及程度来看，2005 年 7 月，中国互联网络网民数量首次突破一亿大关，到 2013 年 6 月，则已达到 5.91 亿，高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普及率也达到了 44.1%。这种迅速扩张的互联网应用，为人们通过互联网渠道获得更为方便、成本更低的金融服务的需求，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技术基础来看，云计算技术、社交网络持续扩展，移动支付等新技术出现，大数据为新发明、新服务和新价值的创造提供了新的源泉，以及其他有关技术出现为互联网和金融产业融合提供了技术基础。这些全新的信息技术从供给方面为金融服务模式的变迁开辟了新天地，并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了重大冲击。在需求与供给两端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平台的各类非传统金融机构大量涌现。最先对传统机构形成冲击的是属于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第三方支付，随后互联网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从支付清算领域扩展到金融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领域。

互联网金融从字面意思来看，是融合了互联网平台和金融功能的经济活动，这种金融活动与传统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活动不同，与资本市场上的直接融资活动也不一样，而是属于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谢平、邹传伟，2012）。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不仅仅包括融资活动，而是一个包括参与互联网金融活动的金融机构、金融交易、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监管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新型金融运行模式（狄卫平，2000）。互联网金融在国外更多被称作电子金融（Electronic Finance），根据 Banks（2001）给出的定义，电子金融指的是通过互联网或者其他电子媒介提供金融服务，包括货币服务、银行服务、支付服务和经纪服务等。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弹性很大因而难以定义的概念，鉴于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概念的出现以及广泛传播反映的只是相关主体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强烈诉求，其实质无非就是通过互联网来提供与传统金融没有重大差别的金融服务（殷剑锋，2014）。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比如戴险峰（2014）认为，对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活动来说，其本质就是传统金融活动以规避监管的方式而存在的一种形式，金融服务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互联网金融”这一概念并不科学。

虽然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良莠不齐，但是互联网金融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相比国外互联网金融较低的规范性并不能否定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效率。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由于能够打破传统金融机构对融资主体信息的垄断，有能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因此能够大大降低人们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同时提高服务质量（Hawkins，2001）。规模经济是互联网金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因为面对网络技术

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服务有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趋势（Claessens 等，2003）。

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机制，互联网金融从两个层面实现了对传统金融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影响：第一，货币层面。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自从金本位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严格定义货币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则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虽然网络支付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实现货币创造，但货币的各种功能却得到了充分、完整的发挥（董昀等，2012）。例如，比特币、Q 币、亚马逊币、游戏币、论坛币等虚拟货币在一定范围内发行，发挥着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的作用，阿里巴巴的支付宝账户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种交易媒介，它们的数据产品乃至实物产品都可以交易且被接受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具备了部分货币属性。这些虚拟货币的广泛应用使得货币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宽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导致在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产生了一个由民间力量主导的、由非中央银行的私人主体发起的货币供应体系，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步伐，这一货币创造进程完全与中央银行脱离了关系。这种虚拟货币供应体系一方面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同时却不会体现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总量统计中。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传统货币供给体系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低，中央银行对货币总量的控制力将逐渐下降，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将面临严重挑战。第二，金融市场层面。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源于其相比传统金融服务具有更高的运行效率，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资金，以更低成本提供信息、进行风险管理。作为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创造性破坏”，互联网金融加剧了原有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导致银行的资金成本不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运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影响。Economides（1993）指出，金融交易活动网络具有明显的网络外部性，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金融活动规模的扩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随着金融活动的不断扩张，不同金融产品的交易网络中形成的均衡价格信息在激烈的竞争中可能会被滥用，互联网金融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使上述两种外部性得到放大。从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影响来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贷款者更容易获得贷款，这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大幅度降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Allen，2002）。针对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研究，不少国内学者也看到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冯娟娟（2013）对传统商业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行了比较，她认为，互联网金融的优势体现在激增的客户群体、大量的金融数据、强大的支付功能和便捷的操作，

传统商业银行的优势则主要体现在雄厚的资金实力、稳定的客户资源、完善的风险控制及较高的行业准入门槛；章连标和杨小渊（2013）指出，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集中在支付、小微信贷和中间业务三个领域中；邱冠华等（2013）则指出互联网金融并不能颠覆传统银行，不过他们的局限在于仅仅依据国内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情况而得出判断。

第二，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监管的影响。互联网金融虽然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了信贷的可得性，但在风险方面也面临着传统金融机构没有的问题，除了传统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期限错配问题等风险之外，互联网金融还要面对自身具有的独特风险。比如，个人信息可能在网络交易中被泄露，法律风险也不同于传统金融活动，由于虚拟货币的大量创造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金融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互联网金融的操作风险也不容忽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不同领域中的操作风险将会逐渐显露出来，如金融业信息化的操作风险、行业间的关联性风险以及消费者相关的风险等（张松、史经伟和雷鼎，2013）。谢平等（2014）的研究探讨了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的必要性与监管的核心原则，他们指出，应该以监管来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必须设定一定的底线和监管红线，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创新活动。面对迅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活动，金融监管框架必须及时进行改革，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实践来看，在互联网金融时代，混业经营活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跨产业、涉及多个机构以及多个产品的金融创新活动要求监管机构必须及时调整和改革原有金融监管框架，逐渐由机构型监管向功能型和混合型过渡（王达和项卫星，2013）。

第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互联网金融由于可以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同时降低融资活动的交易成本，因而可以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谢平，2012）。赵阳等（2014）从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他们发现，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会通过创新渠道给宏观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并因此可能增大宏观经济的波动。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互联网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观点，比如 Andrianaivo 和 Kpodar（2011）利用 1988 年—2007 年的数据分析了手机的普及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手机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金融的普惠程度，降低了人们获取金融资源的成本，并最终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增长。

四、互联网金融产业融合的 Logistic 模型

Logistic 模型是美国生物学家雷蒙·比尔在 19 世纪 20 年代首先提出来用于描述资源有限条件下种群增长规律的生物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X_{t+1} = aX_t(1 - X_t)$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Logistic 模型被大量应用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这里用下面形式的 Logistic 方程来研究两个产业在融合过程中源于市场、政策等资源利用方面所引致的演化过程：

$$dQ(x)/dx = \lambda Q(x) - \lambda Q^2(x)/M \tag{1}$$

式中 $Q(x)$ 为已经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个数， x 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所需各类资源变量的组合向量； M 为两种产业内以企业个数规模为表征的总资源约束常数； λ 为两类产业内从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诞生率 u 与消亡率 v 之差，表征各自产业内企业在融合产业中个数增长的速率。

为了对两类产业在融合过程中的竞争进行分析，将（1）式改写成下面（2）式的形式：

$$dQ/dx = uQ - AQ^2 - vQ \tag{2}$$

式中 A 为各自产业内从事互联网金融的相对饱和常数，是两种演化产业资源常数 M 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A 的大小反映了互联网金融产业对两种产业内企业的资源可供给程度。若 A 大，资源供给余量较小，即已经渐至饱和状态，则该产业企业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空间小，反之，则包括政策在内的各类资源供给余量大，该产业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空间大。

在产业融合过程中，传统金融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必然存在着对资源利用上的竞争，故以方程（2）为基础，导出两类不同产业内企业的演化方程：

$$dQ_1/dx = u_1 Q_1 - A_1 Q_1^2 - A_1 Q_2 Q_1 - v_1 Q_1 \tag{3}$$

$$dQ_2/dx = u_2 Q_2 - A_2 Q_2^2 - A_2 Q_1 Q_2 - v_2 Q_2 \tag{4}$$

在互联网产业与传统金融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两类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所需资源或资源约束是有区别的，互联网企业在开拓线上市场、线上风险管控以及成本管控等方面可能会更有经验和具有创新性，故所受的关键资源约束主要来源于产业政策与市场监管等方面，而传统金融企业在线下市场开发、线下风险控制以及原有市场基础方面可能会更有实力和经验，所受的关键资源约束可能主要来源于成本约束与组织创新等方面。为了反映两类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所受资源约束重合度，通过对演化方程进行变形，得到反映出演化竞争中新的演化方程：

$$dQ_1/dx = u_1 Q_1 - A_1 Q_1^2 - AA_1 Q_2 Q_1 - v_1 Q_1 \tag{5}$$

$$dQ_2/dx = u_2 Q_2 - A_2 Q_2^2 - AA_2 Q_1 Q_2 - v_2 Q_2 \tag{6}$$

通过求解该方程组，可以对互联网金融产业的演化路径有进一步的探讨：

1. 当 λ_1, λ_2 均小于 0 时，方程组解 $Q_1 = 0; Q_2 = 0$ ，这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容许两类产业

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诞生率 u 与消亡率 v 之差持续为负直至产业衰败。

2. 当 $(\lambda_1/A_1) < (\lambda_2 A/A_2)$ 时，有方程组的解为： $Q_1 = 0; Q_2 = \lambda_2/A_2$ 。当 $(\lambda_1 A/A_1) > (\lambda_2/A_2)$ 时，则有 $Q_2 = 0; Q_1 = \lambda_1/A_1$ 。这两种情况意味着具有创新性的一类企业能对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内外部资源有着更为有效的利用，从而能在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中逐步占据优势。与此同时，不进行创新的另一类企业则会在“大浪淘沙”中逐步消亡。

3. 当 $(\lambda_1/AA_1) > (\lambda_2/A_2) > (\lambda_1 A/A_1)$ 时，则有 $Q_1 = [\lambda_1/A_1 - A\lambda_2/A_2]/(1 - A^2)$ ； $Q_2 = [\lambda_2/A_2 - A\lambda_1/A_1]/(1 - A^2)$ 。此时，两类产业中的企业将在融合产业中同时存在，某一类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无法阻止另一类企业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 A 值的大小反映了产业融合过程中原来不同产业中企业对内外部资源利用的同异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A 值的大小也直接反映了融合产业内的竞争程度。在产业融合过程中，要求企业不断进行创新，只有不断创新的企业才可能在融合产业中生存发展。

五、结论

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各有优势，这种优势与其长期的产业演化发展直接相关，短时间内不容易被取代和超越。当前金融机构都在使用互联网技术提升业务效率，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券商的网上交易系统、移动终端交易系统都已经相对成熟。互联网企业也在支付、小额贷款、代销等领域不断前进。互联网企业对传统金融产业的渗透愈演愈烈，互联网与传统金融产业的融合正在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排斥互联网无异于坐以待毙。对于金融企业来说，控制风险是重中之重，互联网应用过程中的经验累积与风险控制是金融机构的短板，而专业化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开发也不是互联网企业所擅长的，因而，两者的协作或许才能真正促进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

六、政策建议

研究产业融合的演化机理首先需要搞清楚产业融合的条件或原因。植草益和欧洲委员会绿皮书认为技术进步与放松规制是产业融合的起源；Yoffie 认为软件、半导体、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管理创新以及政府规制放松是三个最为主要的驱动力，在这三者共同作用下，导致信息产业融合的发生；于刃刚等认为技术创新、管制放松、跨业并购、战略联盟以及这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产业融合的主要原因和条件；马健则从内外因的视角认为技术创新是内因，放松管制是外因。综合这些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融合后产

业的发展需要从技术、企业、政府等多个层面去理解，互联网与金融的产业融合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层面因素的驱动。

（一）技术创新是互联网金融产业技术融合的基础和保障

王景武表示，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兴金融模式，是信息化、电子商务和金融创新发展的结果。互联网与金融业的产业融合主要围绕在三个方面推进。第一是渠道的扩张和融合。双方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各自的领域开展业务，互联网企业在这一阶段的成本优势发挥明显，具体表现在成本优势的虚拟渠道扩张。第二是数据推动融合。双方的核心业务产生交叉，互联网企业开始利用已有的数据资产进行风险定价，而传统金融业逐渐掌握批处理技术，开始通过产品创新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防御，这个时期对中小型客户的争夺是发展重点。第三则是平台性的融合。这部分是从形式到实质的融合，在平台融合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商业模式的优化、创新，双方都已经掌握了对方较为核心的技术，平台搭建完毕，开始利用平台的数据资产对现有的商业模式进行创新改造，各自平台用户的数量、粘度和数据有效性是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

（二）监管创新是互联网金融业务融合的直接推动力

互联网与金融之间虽然没有冲突，但二者产业属性与特征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与反差。互联网所强调与擅长的是快速、便捷与创新，而金融业则更注重规范与稳健，这也是两种产业有着不同的监管机制的根本原因。与互联网开放性、虚拟性及创新性所对应的监管机制只能对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活动有作用，当互联网企业逐步渗入金融业务的时候，势必要求其相应的监管机制有所改变。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与目的是金融，所以就必须遵守金融的基本规则和监管要求，否则就会出现第三方支付纠纷、P2P（个人对个人）平台跑路等背离金融服务本质的现象。另一方面，如果把基于传统金融制定的法律法规体系简单化地移植到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上，势必会制约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从原理上讲，源于互联网活动的创新本质，往往是技术领先于监管，导致既有的法律法规无法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所以政府监管方面只有不断创新才可能跟上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才可能有助于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竞争合作是互联网金融市场融合的有效路径

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起源和基础，最终产业融合的形成还需要以市场融合的形式

表现出来，只有形成有效的市场融合才可能持续推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曾有人预测互联网企业的线上银行可以颠覆传统金融的线下银行，这本身是对互联网金融的市场融合没有正确理解。互联网与金融在共同的技术支撑和数据支撑基础上实现对接的过程中，互联网企业与传统金融企业会表现出各自的优势，不会呈现出一种产业颠覆另一种产业的现象。其原因是尽管渠道拓展、产品创新、风险甄别与控制手段等的创新都给传统金融业带来改变，但在市场融合过程中，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业的商业模式有着根本不同。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能够以零边际成本服务数量巨大的人群，零边际成本使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客户是“二八定律”中的八，虽然这部分客户的金融需求小额、分散，但通过聚沙成塔，可以形成海量用户。而传统金融业则是 80% 的业务和存款来自于 20% 的客户，这些高端客户不会满足于线上方便性，需要线下的帮助、指导和服务。所以在互联网金融的市场融合过程中，尽管市场中必定存在竞争性替代，但更多的是需要在各自优势基础上的竞争性合作。互联网企业涉足并日益壮大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看似挤占了传统金融业的业务领域，但事实上却并未产生明显的直接竞争，而是与传统金融业通过分工各取所长，从而达成了协同效应。

（四）产业融合

“互联网+”是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融合与重构，几乎所有的传统应用、传统服务与传统产业都在被互联网改变，但并没有出现“互联网物流”“互联网旅游”“互联网餐饮”……而仅仅是互联网金融形成真正的产业融合。其原因是尽管传统行业应用互联网进行产业或服务的转型升级，带来了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整合，形成了新的平台，产生了新的应用，却不是互联网行业与传统行业的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仅仅是传统行业应用互联网工具进行产业改造升级而已，并没有一批互联网企业参与从事与传统行业相关的业务。传统金融业虽然与其他传统行业一样，与互联网有着共同的技术需求与基础，但是只有互联网金融在共同技术基础条件下进行了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最终形成了产业融合。

无论是对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互联网企业而言，还是对从事互联网金融的金融业企业来讲，互联网金融的产业融合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从目前来看，由于互联网金融所涉足的主要业务是传统金融企业当前并不深入的领域，与传统金融业务呈现出互补的态势，短期内还不会对传统金融企业带来较大的市场冲击，但可以明确的是，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思路、业务模式及其彰显出来的开放、平等与高效，已经对传统金融业形成了极大的理念冲击。传统金融企业如果不能将资本、信用、客户资源和风控能力等方面的

优势与新兴技术进行有效结合，将会在融合过程中失去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 戴险峰：《互联网金融真伪》，《财经》2014年第7期。
2. 狄卫平、梁洪泽：《网络金融研究》，《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
3. 董昀、费兆奇：《后危机时代的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学术研讨会综述》，《金融评论》2012年第4期。
4. 冯娟娟：《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竞争策略研究》，《现代金融》2013年第4期。
5. 李均：《评论：互联网金融的真正含义》，《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3月25日。
6. 马健：《产业融合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邱冠华、李晗、黄春逢：《互联网金融：颠覆不了传统银行》，《国泰君安证券行业研究报告》，2013年。
8. 王达、项卫星：《论国际金融监管的最新进展》，《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9. 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金融研究》2012年第12期。
10. 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三要义》，《商业价值》2014年第1期。
11. 殷剑峰：《“互联网金融”的神话与现实》，《上海证券报》2014年4月22日。
12. 余刃刚等：《产业融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章连标、杨小渊：《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浙江金融》2013年第10期。
14. 周振华：《论信息化中的产业融合类型》，《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15. 周振华：《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研究》，《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6期。
16. 张松、史经纬、雷鼎：《互联网金融下的操作风险管理探究》，《新金融》2013年第9期。
17. 植草益：《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2期。
18. 赵阳、张艺、涂志华、贾剑波、余新晓、孙佳美、梁鸿儒：《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多目标水源地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中国环境科学》2014年第1期。
19. Allen, F., J. Mc Andrews and P. Strahan, “E – finance: A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002.
20. Andrianaivo, M. and K. Kpodar, “ICT,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2011.
21. Claessens, S., G. Dobos, D. Klingebiel and L. Laeven,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Networks in Finance and its Effects on Competition”, in Gaisford, J., W. Kerr and N. Perdakis (Eds.), Innovations i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3.
22. Economides, N., “Network Economics with Application to Finance”,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Instruments, 1993.
23. Yoffie, D. B., “Chess and Competing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 Boston, 1997.
24. Sato, S. & J. Hawkins (2001), “Electronic finance: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Information, Press & Library Services CH – 4002, Basel, Switzerland.

责任编辑：李蕊

· 企 业 发 展 ·

企业家精神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 作用机制研究

聂常虹 李慧聪

摘要：新常态下发展实体经济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通过一系列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展成为引领改革的重点。本研究从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两个视角，基于对应的创新驱动和效率改善功能，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对发展实体经济的影响；进而结合美国、德国等在培育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先进经验，从法律、文化、经济环境及科技创新等方面剖析了当前制约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因素。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管理和转化相互依存，形成协同机制。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企业家精神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即建议政策执行层面，短期内应完善好企业家精神的政策激励；中期优化对企业家精神的转化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长期则应持续完善好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机制。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 实体经济 创新驱动

作者简介：聂常虹，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副局长、研究员；
李慧聪，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讲师。

一、引言

实体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根本源泉，新常态下发展实体经济，就是要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通过一系列改革促进创新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

围”，这体现出我国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指明鼓励创新创业是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当前营造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作为充分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的重大改革举措，其核心在于激发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除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供给要素的束缚和制约，实现全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通过企业家精神驱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目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单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解决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强调“做强实体经济”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严峻而复杂，资金匮乏、需求减弱、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诸多不利因素使实体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局，德国“工业 4.0 浪潮”、美国“再工业化”以及广大人民普遍关注的“国人抢购马桶盖事件”均提醒我们，发展实体经济任重道远，这直接关系到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实现。

法国经济学家 Cantillon (1755) 最早论述了“企业家”的概念，德鲁克详细地论述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引发了全球理论和产业界对这一概念的广泛探讨。创新、创业与企业家精神对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具体到我国的制度、文化背景及科技创新中，尚存在制约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如何结合我国现实环境，提出提升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对策建议，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企业家精神对发展实体经济的影响

（一）企业家精神理论演进历程

“企业家”是指市场中充分利用未被他人认识的获利机会并成就一番事业的人 (Cantillon, 1755)，他们承上启下，敏锐地发现市场需求，将科研人员发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由工人具体执行，所以企业家的工作是生产过程的核心。Marshall (1890) 首次将企业家作为等同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独立生产要素，他认为利润是企业家经营管理的收益。熊彼特赋予企业家“创新”的职能，提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创新是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创新的主动动力来自于以“创造性破坏”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和坚强的意志，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此后 Casson (1982)、Drucker (1985)、Venkataraman (1997) 等分别从各

自角度论述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当前，国内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本质以及对企业绩效或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研究中也基本考虑了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差异性。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制度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经济伦理与企业家精神，国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等（庞长伟、李垣，2011）。综合以上分析，目前并没有对企业家精神有明确的界定，仅能够从其表现和效果反映出某些特征。企业家扮演着创新者、领导者、管理者、风险承担者等诸多角色，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或是一种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他具体提出创新的五种情况，包括引入新产品、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形式。本研究认为这五种类型的创新都是企业家精神发展实体经济的表现，其中直接引入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开辟新市场等直接产出经济效益；而调整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组织制度创新则通过改善既有资源的产出水平，间接作用于发展实体经济，具体影响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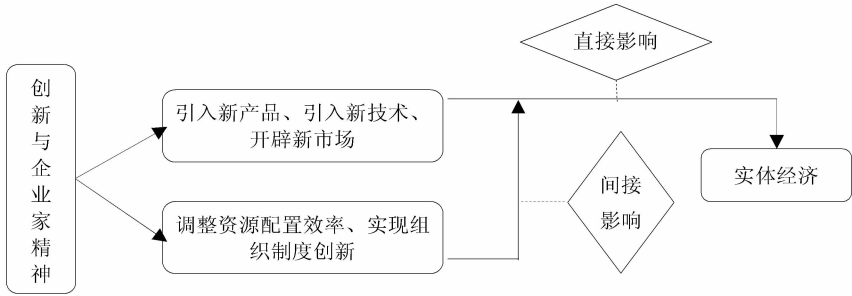


图 1 企业家精神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二）企业家精神对发展实体经济的直接作用：创新驱动

实体经济有别于虚拟经济的金融服务和房地产增值，其产出表现为产品或服务，企业家精神通过产品创新，将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引入市场，或者改进已经存在的产品并提高质量，是对实体经济的直接贡献。过去企业产品研发的驱动因素来源于客户需求，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大数据背景下，创新产品引导客户认知、形成现实需求成为主流，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CEO）乔布斯就曾表示“消费者并不知道需要什么，直到我们拿出自己的产品，他们就发现，这是我要的东西”。在这种打破产品系列迭代、加速更新换代的环境中，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更加突出。李杏（2011）将企业家精神分为风险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企业家精神，并基于 1996 年—2006 年我国 29 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创新驱动的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当前，信息技术（IT）、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已有产品的更新不能停留在修修补补层面，这就需要新技术的支持，并致力于通过变革技术提升产业结构。以德国“工业 4.0”为代表，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我国应当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为契机，在信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占得先机，掌握全球竞争的战略主动。

将新产品和新技术直接应用于市场，即表现为开辟新市场，这既包括为既有产品寻找新的用途和市场，也包括开辟全新的市场。对目前已有产品，企业家可以通过创新产品用途、拓展新的市场来扩大市场份额。当前，我国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亟需调整，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我国企业应当发扬冒险精神，勇于响应“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国际发展空间，获取先进技术、突破贸易壁垒、创造全新的市场。德鲁克指出，世界已经由“管理型经济”转变为“创业型经济”，以往按部就班拓展市场、营销产品的方式已经不能适用于瞬息万变的环境，Facebook（脸书）、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基于一种新产品建立一个新市场、新产业的颠覆性创新模式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三）企业家精神对发展实体经济的间接作用：效率改善

除上述方面直接作用之外，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改变投入产出效率、交易效率和组织管理方式，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利用率。Cantillon（1755）最初界定企业家精神的表现即“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根据 Farrell（1957）的定义，厂商的效率包含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一方面，企业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改善投入产出效率，在既定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大产出。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可以将信息和技术嵌入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之中，发现新的原材料来源和产品去向，缓和经中非效率部分，并将这些经济非效率转变为企业家机会。

企业家精神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当期可见产出，而且有助于保证企业基业长青（李宏彬，李杏，2009）。以微软公司为例，在瞬息万变的 IT 行业，微软公司能长盛不衰，得益于其鼓励持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微软依靠操作系统和一系列软件获得绝对垄断地位，但是并没有甘于现状，而是主动实施了组织变革，比尔·盖茨本人也早早退出一线管理工作，交棒给更具战略眼光的鲍尔默。此外，微软还推出“微软车库”等模式，鼓励内部员工创新。这些做法使得微软没有像柯达公司那样，令核心产品成为其创新的障碍，而是获得了持续的竞争优势。

三、当前制约我国企业家精神的环境因素分析

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企业经营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反映，它受到企业外部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等多种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不同环境条件和企业实际相结合，形塑了差异化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当前我国在制度转型期，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展更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现有文献分析塑造企业家精神的外部环境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制度环境，探讨制度因素和制度变化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North，2005）；二是社会文化环境，强调根植于社会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是影响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Sang et al.，2011；Lumpkin，1996）；三是经济因素，从一般的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源和能力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Knight，1921）。本研究结合上述角度，认为实体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和市场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法律环境、社会文化导向、市场经济的完备程度、科技创新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上述环境的影响。

（一）法律制度环境不完备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层面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转化和保护还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现有制度在私有财产保护方面还需要加强。受到公有制思想的影响，我国在法律层面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有待加强，企业家财产权及人身自由被公权力侵害的事例时有发生。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部分企业家表示对“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感”和“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担忧，企业家移民现象也反映出我国法治水平和产权保护的滞后。尽管新修订的《物权法》加大了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但是能否获得企业家信任，还需要配套法律支持。其次，相关制度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的政策激励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但其效果有待检验。一方面，政策本身是否合理需要慎重考虑，例如上海市“天使投资亏损可获政府补偿”的政策就引起社会广泛质疑。另一方面，政策落实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如何将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对创业企业家形成有效激励、构造金融保护机制和创新容错机制还需要深入分析。最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还有一定制度障碍。当前，法律层面依然存在着技术转移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科技成果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激励力度不够、考核评价制度体系有待深化等问题。近年来，我国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基本确立了新时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在落实中部分制度还需结合目前的政策进一步细化，如科研组织办企业问题与科技成果作价

入股关系问题、科技成果年度报告内容等，某种程度上制度的不完备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进而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二）文化环境的束缚

传统的儒家文化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指导意义，如“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理念就会鼓励企业家关爱员工，为客户创造价值，但总体上受到我国传统“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观念的影响，企业家精神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欠佳，历朝历代对商人这一职业的社会评价较低，官方并不鼓励甚至限制商业发展，这无形中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同时，儒家文化提倡中庸之道，我国道教中提出的“天人合一”以及佛教中的“无我”理念，某种程度排斥了市场的竞争，抑制了竞争性、创新性思想，也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按照国家计划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缺乏创新创业的内在动力；而当时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管理内容事无巨细，也束缚了企业家精神。总体上看，行政型治理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提高了决策效率，有其必然的时代因素；但多年以来，行政型治理思维在企业运营和管理中形成了比较强的路径依赖，甚至在某些层面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行政计划安排某种程度上排斥相对竞争的环境，无形中打压了企业家的个性，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生根发芽。综合分析，目前我国文化环境中一定程度上还缺乏企业家精神生长的土壤。

（三）经济环境的成熟度较低

经济环境成熟度包括经济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市场化成熟程度、金融市场化程度、创新创业的经济化、企业组织制度，以及外部融资市场发展程度等制度结构因素。上述因素都促进或者限制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环境成熟度较低，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家精神的“转化”。企业家精神要求企业家能发现市场、创造市场，并将市场转化为新的收入增长模式，从而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而在经济环境成熟化程度较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将会受到较强的制约。当前，在经济新常态大环境下，经济转型需要企业家搜寻机会、创造性地组合资源实现有价值的经济组合，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发展。上述过程的实现均需要成熟的经济发展环境的支撑。当前，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越来越离不开成熟的金融体系支持，无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都需要融资来解决资金需求。创业企业一般并不具备传统融资方式中的抵押物，而其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更大，部分具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正是因为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而陷入困境，所以拓宽融资渠道、创新金融服务对创新创业和培养企业家精神至关

重要。

（四）科技创新的效率低下

科技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当下培养、促进企业家精神的直接源泉。目前，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创造作用，而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是强有力支撑。然而，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转化。首先是科技创新的有效供给的质和量不足。科技创新能够提供的有效供给（产生市场价值）不足，与市场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有错配和较大差距。科技创新制度供给不足严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其次是科技创新的供给效率低下。在科技创新有效供给实现的情况下，由于科技创新的知识传播和扩散严重不足，严重抑制了科技创新供给的实现效率。最后是科技转化的配置效率较低。即使有一些科技信息中介或知识产权部门将一部分科技成果传播和应用到产业和市场，其规模也是相对较小的，其传播速度和效率也是相对滞后的，而且由于没有形成大规模网络状的传播渠道和专业的行业，其资源配置也很难做到最优，企业家精神的“生根发芽”自然会受到影响。

四、促进企业家精神培育和国际经验

美国、德国等在宏观政策管理和企业家精神培育层面出台各种政策，推进企业家精神不断深化。美国政府在创业的宏观管理方面调整了原有不干预的管理方式，扶持了大量基于技术创新的高科技企业和基于业务创新的非技术类中小企业，并协助推动大企业组织变革和技术创新。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相伴共生，并最终造就了硅谷的神话。斯坦福大学鼓励学生创新，为硅谷提供了人才和科技蓄水池，取得科技成果后推动创业和企业孵化，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斯坦福大学在学生教育方面也持续鼓励创新创业，学校制定了以利益共享为原则的专利许可收入分配制度，对于教师或学生在学校期间获得的专利，技术转让后，学校只从毛收入中扣除 15% 作为专利申请费和办公费用，其余获利归所在院系和专利所有者。学校还设置专门机构，服务师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学校设立了研究激励基金、缺口基金等孵化资金，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了创新精神的发展。正是得益于斯坦福大学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斯坦福大学的广大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崇尚创新创业的文化品质，从教授到学生都乐于积极投入到创新创业活动中来。学生在接受创业教育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和参与相关的课外活动。学生发起组建了各种俱乐部，组织各种创业论坛，参观硅谷的企业，与

企业家和投资家座谈；学生发起并运作了斯坦福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俱乐部每个学期都有详细的活动安排，商学院每年举办一次年度创业者大会，主要由 MBA 学生发起和具体运作，其创业者年度大会往往能够邀请到世界范围内业界的高层人士参加。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成功案例表明创新与创业相辅相成，鼓励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等群体创新创业将会对我国发展实体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推出了全方位的大众创业刺激措施，为创业者提供金融支持、咨询支持和信息支持。负责提供支持的机构包括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各联邦州政府、各工商会（IHK）、各手工业协会、地方经济促进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集团及各联邦州开发银行、信贷机构及联盟、创业网络等。为了在相对传统的德国文化中注入“创业”元素，德国政府及社会注重培育创业文化，例如通过举办创业大赛提高“创业”在全社会的认知度和传播力。此外，德国还注重培育企业家精神。1998 年，在德国经济部的推动下，德国大学出现了首个企业家精神教席。据德国创业研究促进机构 FGF 2015 年 3 月发布的数据，德国大学现有 128 个企业家精神教席。企业家精神作为德国高校的一个研究分支正在不断成长。

在鼓励青年创业和培育企业家精神方面，德国通过“双轨制”的职业教育体制、政府的金融支持以及对创新意识的培养持续完善企业家精神培育体系。首先，实施“双轨制”的职业教育体制为青年创业奠定坚实基础。德国职业教育学校与企业之间紧密合作、相互融合，既培养学生的基本理论素养，同时也注重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其次，政府为青年创业提供金融支持，力促企业家精神落地。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实施“中小企业创新核心”计划，不限行业和技术领域，对企业自身产品开发和工艺创新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创新给予资助。此外，政府、政策性银行还设置高科技创业基金，对创新型企业给予风险投资支持。德国政府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进行合作，设立了支持中小企业的“EPR 项目”。最后是培养青年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德国大学就建立了创业教育的教授席位，培养青年人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

五、企业家精神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我国发展实体经济，就是要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通过一系列改革促进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管理和转化机制相互依存，形成协同作用。从政策执行层面看，短期内应完善好企业家精神的政策激励；中期

内优化对企业家精神的转化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长期内应持续完善好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机制。

（一）短期内推进企业家精神的政策激励

政府层面应不断转变思路，形成支持、保护企业家精神的系列管理制度。美国政府在宏观管理层面积极介入，并协助推动大企业组织变革和技术创新，比如注资介入对通用汽车的重组，使得通用汽车得以重新崛起，而又在此之后，退出通用汽车，将其交给市场。可以说，美国政府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维护市场上的企业家精神，而这种企业家精神反过来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可谓相得益彰，这为我国实施相关政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短期内，政府层面可以加大对企业家精神培育、转化以及创新创业等政策的持续激励，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形成有效的激励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激发市场活力就是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政府应尽快实现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身，真正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企业家精神转化为市场活力铺设土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限制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完善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

（二）中期完善企业家精神的转化机制

政府针对特定时点的现实需求提供政策支持，但是从中长期发展角度，应当淡化政府政策、突出市场经济的作用。当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创新创业促进政策，为全面创新、万众创业提供政策、资金等全方位支持的同时也干涉到市场运行机制，在支持创新创业之后择机放手也是促进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必要手段。市场层面应不断建立有利于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各种平台，例如从风险投资、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助推企业家精神从创新驱动到实体经济的转移和转化；不断优化和建设对转移转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企业家精神的合理转化。

当前，我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为培育企业家精神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科技创新是重要引擎。科技创新在支撑产业调整、培养科技人才等方面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断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转化。具体表现为在科技成果方面实现科技成果和经济的对接，充分发挥现有科研成果的效益；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用好用活科技人才，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在科研机构改革方面，优化科研机构的功能布局 and 区域布局，为经济社会全面服务；在科技设施服务方面，加强科技设施布局的前瞻性，增

强开放性，更多地发挥直接服务产业功能；在科技项目布局和管理方面，更多考虑产业需求。以科技创新为例，可以加快发展科技信息中介服务业，形成企业家精神的转化中心。专业化的科技信息中介不仅能够有效将科技创新成果传播、扩散到企业和社会，提高供给成果的传播效率，而且科技信息中介本身即是属于科技、信息产业，在国外是占有相当比重的一类产业。再如，可引入科技创新 PPP（公私合营）模式，发展科技金融，促进企业家精神转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科技财政投入紧张的情况，引入社会资本实行 PPP 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科技投入总量，另一方面有利于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市场成果，加快企业家精神转化、落地。

（三）长期持续提升企业家精神培育机制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当前，创新驱动的关键，在于培育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我国应积极引导社会创建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生存的文化，营造有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的环境，形成企业家精神从发掘、保护到培育的系列机制，最大限度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进而使企业家精神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致力于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更多支持创新型企业 and 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持续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尽快形成新增长点和驱动力。具体可以从长期制度、教育培训体系和文化环境入手。

首先是在长期的制度体系设计上，改善制度环境，提供法律保障。一是改革目前人才培养体系与制度，从知识型人才培养导向到面向市场、面向创业的人才培养体系转变，培养市场需求的科技创新人才，鼓励创新创业；引进已经在市场中成功的创新创业人才回流教育体系，实现两方面人才的交流与融合。国家层面，打造系统的全球人才吸引体系，对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可以参照国际标准给予待遇保障。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制定相应的税收和补贴政策，减少企业成本和交易成本，为企业家创业提供持续的制度保障。三是逐步完善金融支持系统，为企业家精神落地提供可靠的资金保证。另外，在整个的制度体系上应逐步消除法律和行政管制有利于鼓励企业家的活动，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强化行业竞争程度。

其次是在教育体系上，要逐步加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教育和培训，提升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激情，主动改善现有的教育培训机制，为企业家精神提供持续的动力。在 MBA 教育层面，可以设置专门的创业、企业家精神的相关课程设置；在训练内容上应注重企业家精神的开发，提高创新能力；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系列政策，鼓励青年创新创业。在学校的创业教育中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

最后是文化体系方面，要全面营造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环境。企业家要从精神层面出发，自觉培育敬业创新精神，培育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要树立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价值体系，促进企业家按照社会价值标准努力，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企业家的诚信监督体系，开展企业家创新精神评价，持续引导和建立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 聂常虹、李慧聪：《创业创新离不开企业家精神，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人民日报（理论版）》2015 年 7 月 14 日。
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3. 庞长伟、李垣：《制度转型环境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管理学报》2011 年第 8 期。
4. 李杏：《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基于 SYS-GMM 的实证研究》，《科研管理》2011 年第 1 期。
5. 李宏彬、李杏：《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0 期。
6. Cantillon, R. , “Essay on the nature of Trade in General” , NPDBooks, 1755.
7. Casson, Mark C, “The Entrepreneur. An Economic Theory ”,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2.
8. Farrell Michael J,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57, 120 (3).
9. Lumpkin G T, Dess G G. , “Clarifying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Construct and Linking it to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 21 (1).
10. Marshall, A. , “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1890.
11. Sang M L, Lim S B, Pathak R D. ,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 Multi-country Study”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7 (1).

责任编辑：马博飞

美国西海岸高水平创新型大学调研报告^{*}

郑新立 盛思鑫

摘要：美国西海岸作为美国的后发展之地，在高等教育领域快速崛起，短短几十年时间便涌现了一批世界级的高水平创新型大学。这些大学的研究、创新与人才培养对美国西海岸、美国全境乃至全球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我国已是高等教育大国，但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在当下我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发展的工作中，美国西海岸高水平创新型大学的发展经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需要深入转变发展观念，继续强化教育优先的思想，统筹利用国内国际资源，努力在资金管理、大学治理、办学理念、教师机制、学生培养和科研管理上突破创新，方能加快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 教授治校 大学治理 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盛思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战略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伟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伟大的大学。拥有若干伟大的大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并且也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起到领先作用的重要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需要在中国大地上培育和发展一批世界级的高水平创新型大学，否

^{*} 作者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副秘书长陈永杰、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柯春晖、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范绪锋对本文的修订意见，文责自负。

则很难称得上真正的“大国崛起”。2015 年 8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总体要求、建设任务、改革任务和支持措施，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支撑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课题组于 2015 年 10 月下旬前往美国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进行实地调研，进行了 50 多场次、共计近 200 人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这些大学的校领导、理工科院系和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知名教授和科学家、留学生，以及技术转化中心、孵化器、风险投资公司等机构的有关人士。课题组认真了解和研究了美国西海岸顶尖大学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的发展经验。本文在课题组调研基础上总结了美国西海岸顶尖大学九个方面的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指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在教育体制机制上所需要进行的六大突破，最后就我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七条政策建议。

一、美国西海岸顶尖大学的发展经验

（一）特色鲜明、定位明确

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发现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具备鲜明的特色，在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具有明确的定位。如斯坦福大学毗邻硅谷，创新创业的氛围很浓，在培养科技应用型人才和高科技企业方面非常突出；伯克利加州大学多年来一直坚持管理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办学风格，培养了众多基础学科的研究人才以及工程应用类人才；加州理工学院是典型的理工类院校，走的是“小而精”“小而美”的发展路线，学校的占地和人员规模很小，但科学至上的氛围异常浓厚，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是世界级才俊，以致力于研究科学领域最前沿和最基础的问题为己任（高瑞，2013）。

（二）独立自主、教授治校

综观美国西海岸顶尖大学的发展历程，一个比较突出的共同特点是这些大学在选择发展方向、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决定主要管理人员、评聘教授和招收学生、开设课程与确定研究方向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并且教授在学校的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在大学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人员都是教授。教授群体拥有学术事务的决策权，而且教授之间的决策权力基本平等，他们共同对外维护着大学的自主与自治。即

便这些大学接受政府或企业界的资助，大学也不能为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产品背书或站台，以免有损大学独立自主和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各大学对处理各种利益冲突和伦理规范，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

独立自主和教授治校的原则不仅体现在大学层面，而且也在学院、系、所的各个层级和组成单位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这种模式一般被称为“大学和学院的联合治理”（郭卉，2005）。大学对各学院、系、所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各学院、系、所在大学规章的保护之下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例如，大学通常不得干涉各学院、系、所的教师聘任、研究领域选择、研究生招生与课程设置工作，这些工作一般由各院、系、所的教授委员会（或由教授组成的各种专门委员会）根据他们自己议定的章程和办法来自主完成。大学层面虽然也有自己的教授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但通常只在涉及大学层面的事务中发挥作用。

（三）学术自由、尊重个性

在调研组研究和考察的几所美国顶尖大学中，学术自由的氛围都非常浓厚，各大学也十分尊重教授和学生的个性与差异化。举例而言，伯克利加州大学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斯坦福大学鼓励教授和学生进行科技创新并将之转化成生产力；上世纪3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的几位学生（其中有一位是钱学森）曾在宿舍做实验导致好几起爆炸事故，结果校方的处理结果是将他们的实验搬迁至校园外的山谷，最后在这个山谷建成了世界知名的“喷气与推进实验室”（钱学敏，2006）。

学术自由与尊重个性还体现在教授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教学内容，不存在学术研究的禁区以及学术观点与思想上的禁忌。以加州理工学院为例，该校十分重视跨学科研究和跨专业延揽人才，尽力淡化学科意识，如化学博士背景的教授可在物理学部工作，物理博士背景的教授可在生物学系工作等等，教授们在学术上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助理教授们平日里甚至都不被要求在特定期刊上发表论文，业绩考核完全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来评定，这使得教授们无需根据各类期刊的风格撰写“八股”论文，可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几乎所有的顶尖大学都允许研究生自主选择导师，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需要更换导师，导师也十分尊重学生的个性与研究方向的选择。

（四）明星师资、全球选聘

顶尖的大学离不开超一流的师资建设。美国西海岸的顶尖大学都十分擅长根据自己的情况用不同的策略从全球选聘明星师资（王英杰，2004）。对应聘教职者的一般资格要

求是，具备世界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在同行评价中排在很高的位次。为了避免近亲繁殖，这些顶尖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一般不招聘本校的博士毕业生，除非这些博士在其他顶尖（或次顶尖）大学已经做出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并被同行高度认可（俞云金，2008）。此外，为了延揽明星师资，顶尖大学努力为这些超一流的人才提供最好的工作环境、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得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开展教研工作。

具体而言，斯坦福大学各院、系、所通常都规定，应聘助理教授者，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应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在同行评价中至少要是所属研究领域前 3% 左右的人才。即便如此，由本校的助理教授升任终身教职副教授的比率仍然较低。与助理教授的招聘相比，斯坦福大学从外部延揽终身教职席位教授的标准更加严格。在斯坦福的一些名牌院系（如计算机系）中，招聘教授的条件要比一般院系更高，选聘师资基本上只考虑特定研究领域在过去三年中的前三名。斯坦福大学财力雄厚，学校规模较大、院系较多，因而有条件大规模延揽学术界的明星学者和有潜力成为明星的青年学者，几乎每年都有师资招聘，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而加州理工学院由于规模较小（全校仅 300 多名教授和助理教授），在延聘师资的条件和标准方面较斯坦福大学更为严苛，通常都只考虑特定研究领域过去三至五年中的第一名，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因此一个教授职位平均要花八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找到合适人选。

（五）顶尖学生、国际招揽

在吸引培养优秀学生和促进生源的多样性方面，美国西海岸的顶尖大学也是不遗余力。他们利用顶尖的师资吸引顶尖的学生，同时也利用顶尖的学生吸引顶尖的师资，从而在优秀的老师和学生的良性互动中创造一流的学习和研究环境。这也是这些大学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招收本科生方面，各顶尖大学除了参考 SAT 分数（相当于我国的高考分数）、在校表现和推荐信之外，还十分看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学习能力，也十分注重结合本校的培养目标和教育特色选拔学生。如斯坦福大学比较喜欢招收有创业潜质和对科技创新感兴趣的学生；加州理工学院则倾向于招收理工科研究方面的天才少年。在本科生的培养方面，各顶尖大学一般不过分突出专业，但都十分重视通识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也常被译作博雅教育），鼓励学生根据学校要求和个人兴趣跨专业选修各类课程，学生在课程和专业选择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度（李成明，2001）。

在研究型的研究生招生方面，顶尖大学为防止近亲繁殖，通常都会尽量避免从本校的本科毕业生中直接招收，而会从全球其他大学选拔最优秀的学生。本科学习成绩、标

准化考试成绩（如托福和 GRE）和导师推荐信是招生时的重要参考指标，但更重要的指标是学生的研究能力以及从事顶尖学术研究的兴趣与雄心。研究型的研究生一旦获得录取，通常都会获得较为丰厚的奖学金或助学金，因此在校期间可以集中精力专注于学术研究。在研究生培养方面，顶尖大学有着非常高的学术标准，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可以相互质疑，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束缚思想的交流。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一般需要 5~6 年才能毕业，并且有相当比例的博士研究生因为达不到学术水准而无法毕业。亚裔学生由于学习刻苦，在美国顶尖大学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如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亚裔学生的比例大概是 20%~30%，远远超过亚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

（六）经费充足、设备先进

美国西海岸的顶尖大学在研究和教学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全球领先的成就，与其长期以来都拥有较为充足的办学经费是分不开的。他们在经费筹措方面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是十分擅长向校友、企业和各类基金会募款，以支持大学的研究、学生培养与长期发展。充足的经费使得吸引最优秀的教授和学生、购买昂贵的设备、建立一流的实验室以及支持花费较高的研究成为可能，这反过来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大学在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顶尖地位。

一般来说，美国西海岸的顶尖大学主要有三大经费来源，捐赠及其投资收入、研究合同与研究资助、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这三部分各占学校日常经费来源的 1/3 左右（高磊，2006）。以加州理工学院为例，该校近年来年均办学经费高达四亿美元，280 名教授年人均经费高达 142 万美元（即 1000 万元人民币）。斯坦福大学基金当前的规模高达 200 亿美元左右，而且基金的年平均收益率长期维持在 10% 以上。

（七）考核科学、激励到位

美国西海岸的顶尖大学普遍拥有科学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这对于形成优良的学术氛围和校园文化十分重要。就教授晋升来说，助理教授晋升终身教职的副教授或教授，通常设有 5~10 年左右的考核期，一般没有硬性的考核标准，主要依靠聘请外校十名左右的教授同行来做升等评议，并且这些教授对被评审人匿名。本校相关的教授所组成的委员会根据外部评议的意见来讨论有关升等的决定（赵炬明，2011）。在同行评议教授发表的论文时，重质量而不重数量，也不太看重论文是否发表在权威期刊上。例如：加州理工学院曾有只在不太权威的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即被评为教授的案例，也有在权威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而未被评教授的情况。在这种灵活的考核制度下，人才比较容易脱颖而出，不会因为年龄、资历和其他硬性条件而被束缚住。科学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让

教授们避免了沦为急于出成果和发论文的机器，鼓励他们致力于真正的学术研究，钻研最顶尖的学术问题，从而使得他们有可能成为新知识的发现者和真正的学术大师。

大学教授、尤其是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在美国西海岸的顶尖大学中非常受人尊敬，获得过重要科学奖项的教授们则会受到更高礼遇，而行政人员和教辅人员在大学中的地位和权威则远不如教授。这也使得大多数成功的教授不大愿意从事行政工作，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行政工作会浪费自己宝贵的研究时间。此外，各顶尖大学均有各类规定确保教授们保持良好的个人品行，如不得歧视特定背景的学生，不得性骚扰学生等等，如违反这类规定，处罚之严厉常常会毁掉教授们在学术界的职业生涯。

这样的考核激励机制对顶尖大学的研究生培养也非常有帮助。例如在加州理工学院，那些最有思想、最有创意和研究能力最强的学生在校园内的受推崇度要远高于只是课业成绩好的学生。此外，各校还有荣誉章程（Honor Code）一类的校规激励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品格。例如加州理工学院的所有考试都没有监考，学生只需在规定时间内根据闭卷或开卷的要求完成试卷，整个过程完全无人监督。但如果事后发现学生作弊或抄袭，则会给予犯规者较为严厉的惩罚，包括在毕业典礼上无法身着正常的毕业礼服。

（八）成果转化、产学研一体

美国西海岸的顶尖大学一般都有成熟的成果转化体系，产、学、研一体化做得非常好，既有利于教授和学生“学以致用”，将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也有利于产业界更好地利用顶尖大学的研究成果，与大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反过来也会刺激产业界支持大学的学术研究。

为促进大学教授进行创新与成果转化，美国西海岸顶尖大学都有一套完善的关于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的制度，并设有专门的技术转化部门负责代表大学处理与技术成果转化相关的事务。一般来说，技术转化部门由行业和技术专家、投资分析师、财务专家、知识产权律师以及专利代理人等专业人士组成。此外，美国高度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也帮助解决了技术成果转化各个阶段所需的资金问题。通常而言，教授和学生利用学校资源所产生的发明创造，相关的专利所有权都归属大学，大学可以通过非独占授权、独占授权、专利转让等形式获得现金或股权收益。

在收益分配方面，在扣除掉大学的各种管理成本之后，因发明和专利产生的收益按发明人及其团队、发明人所在系、发明人所在学院各 1/3 分配。斯坦福大学在成果转化体系建设方面是美国顶尖大学的典范（顾征、李文，2011），2014 年该校的专利许可收益达到 1.08 亿美金，已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包括：斯坦福教授和学生的研发和创业活

动、硅谷和各类孵化器的产业支持、各类风险投资在前中期的金融支持、活跃的企业股权交易和发达的上市公司融资跟进支持、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种利益共享的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机制有效地推动了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法律层面，美国大学利用联邦政府资金产生的发明和专利受美国拜杜法案（Bayh - Dole Act）的管辖，该法案有效保护联邦政府、大学、专利发明人、企业和社会各方的权益，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南佐民，2004）。

（九）校园优美、环境一流

美国西海岸顶尖大学的选址都非常讲究，大多依山傍海，校园环境整洁优美，绿化率较高，建筑风格明显，节能环保的设计几乎随处可见，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得当，各种特色博物馆更增添了大学的人文和艺术气息。大学一般都是开放式的，没有校门和围墙，大学校园的细节设计非常人性化，完全以教授和学生为中心。校园内外的相关配套设施十分齐全，极大地便利了教授们的研究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生活。在美国西海岸的顶尖大学中，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环境是“大而美”的典型，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环境则是“小而美”的典范（关肇邨，1989）。此外，这些顶尖大学的校园环境与大学的整体气质能够相互衬托，学术环境和自然环境往往相得益彰。这也是他们能够吸引和留住世界一流人才的重要条件。

二、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体制机制突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结合我国国情并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进行比较对照，我国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在教育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具体来说，需要重点突破资金管理、学校治理、办学理念、教师机制、学生培养和科研管理等六个方面。

（一）资金管理突破

各级政府拨付给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办学和研究经费应注重提高竞争性，深入促进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优化配置，同时鼓励各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过程中建立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机制，使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费来源多元化。积极探索通过政府投入和社会捐助建立以基金会为主的大学经费运营模式，逐步形成基金会投资收入、政府和企业的科研委托合同以及技术成果转化所带来的相关收益三分天下的日常经费收入格局，确保大学在财务上的独立性与安全性。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多渠道为大学筹资的激励制度和政

策，不断增强大学从社会和企业募捐资金的能力。

在财务支出方面，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应紧紧围绕科研与教学这两个中心任务，并以此为核心，科学合理地分配办学经费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大学在行政管理和后勤管理方面的过高支出，通过后勤服务社会化等手段减轻大学的财务负担。与此同时，纪律检查部门应加强对大学的财务审计与日常监督，防止因大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后勤服务社会化所带来的各种腐败问题，确保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能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有利氛围。

（二）学校治理突破

在大学治理上，应该去行政化管理，树立和坚持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努力促进大学的独立自主，同时反对将坚持党的领导和大学的独立自主二者矛盾对立起来看待。党和政府对大学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大学教育政治方向的把握、在学校重大事项上的一票否决权以及对大学行政系统的纪律审查。在此前提下，促进大学的独立、自主与自由发展，大学的科研活动与日常教学主要交由各院系及教授自主决定，学校党政系统尽力减少干预。

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教授在大学日常事务中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积极探索大学治理结构创新。建议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研究探索出一套符合世界一流大学管理需要的治理结构。由大学教授委员会或其指定的遴选委员会负责从全球选聘校长人选，大学重要的规章制度都需经过大学教授委员会审议通过方能生效。确立按制度规章办事和治校的基本原则，建立若干回避制度以及利益冲突报告和审查机制，防止中国传统的人情请托对于大学日常管理的侵蚀。

（三）办学理念突破

要想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在办学理念上也需要有重大的突破。第一，要有放眼世界的全球观，要立足当地、服务全国、放眼世界，以世界顶尖大学的主流理念和通行标准，包容善用这些顶尖大学的制度优势和发展经验。第二，大力倡导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大学文化，努力为当地、中国和世界培养追求卓越的科技领袖型人才。第三，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应多学习加州理工学院的特色发展战略，求质求精不求量，集中整合优势资源，重点突出“高精尖”，不要再走“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老路。

（四）教师机制突破

在教师管理机制上重点要打破年龄资历限制，反对近亲繁殖，以教学科研水平为主要标准，对学术不端和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零容忍。为吸引世界顶尖的师资，需要突破

用人的本土观念，面向全球广求贤才，并且鼓励发动全校职员都参与到教授发掘和引进的工作中来。可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等世界顶尖学府的标准设计教授的薪酬体系，同时也按这些顶尖大学的高标准从全球选聘教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一旦物色到合适的顶尖教授，应尽力满足他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待遇要求。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积极为教授创造舒心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学术自由的研究环境，提供最新的科研设备、充足的研究经费以及一流的教学支持服务，要能留住一流人才。

在教授聘任、续聘、晋升和考核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以论文发表数量和论文发表的刊物档次为考量标准，可以通过其他顶尖大学对本校教授研究成果和水平的同行评价来做决定，为本校教授创造一个相对宽松和宽容的工作和研究环境。可以参考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等级制度，取消副教授一级，只设立助理教授和正教授两级，助理教授为非终身教职，每个合约为五年，可续一次合约（总计10年），每一次合约结束前后，根据助理教授本人的意愿和申请，本院或本系的正教授委员会即可议定是否续约以及是否让该助理教授参加晋升考核，如在晋升考核中同行评价认为可授予其终身教职，则直接授予正教授职衔。对于做出特别成绩的正教授，授予“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职衔，以鼓励正教授在获得终身教职后继续从事顶尖的学术研究。

（五）学生培养突破

高水平创新型大学的建设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一流学生进校就读，不能降低招生标准招收带有照顾性质的学生。在学生培养上要着力突破一些阻碍人才培养的本土意识和传统观念，要将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最好的学生置于大学战略中非常优先的考量，并将其置于和引进全球顶尖的师资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学生培养上充分借鉴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研究型、创新型、应用型 and 复合型优秀人才，注重提升和保持从事创业和科研工作的毕业生比例。实行弹性学制，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修课，对于在校期间即有志创新创业的学生，学校应为其提供各种便利和支持。对于有志从事科研的学生，学校也应积极为其创造有利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重视学生生源的国际化以及学生教育的国际化，通过奖学金制度吸引优秀的国际学生，选送本校的优秀毕业生前往国外顶尖大学继续深造，鼓励和支持本校学生在国外顶尖大学做访问学生，积极吸引国外顶尖大学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前来国内大学做研究生。严格执行反近亲繁殖的制度，不鼓励本科毕业生在本校攻读研究生，博士毕业生一般也不允许直接留校任教或在本校从事博士后研究。

（六）科研管理突破

一套完善的科研管理体制对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也十分重要。应鼓励科研人员争取国家级乃至世界级水平的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大学根据一定标准和要求拨给配套经费。建立以科研人员为核心的科研管理服务体系，简化科研审批报销流程，便利科研人员购买实验设备和器材。将科研管理成本计入大学日常管理成本中，不得以任何形式克扣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借鉴斯坦福大学技术成果转化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的发展经验，推动健全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与、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和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当地和全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驱动力，积极为大学的教授、科研人员和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专利和技术成果转化服务，鼓励在校师生从事发明创造并将之产业化，在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收益分配上，应该兼顾大学、院系、发明人和相关各方的利益，一方面要培养大学的“智本家”，同时也要避免因为过度商业化而使大学教授和科研人员丧失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动力。

三、政策建议

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独辟蹊径”，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否则很难建立世界级的高水平创新型大学。依据前述的总结、分析和讨论，现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转变发展观念、强化教育优先

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应该进一步深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思考，认真反思我国的高等教育短板和体制机制约束，积极转变发展观念，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放在特别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切实强化和落实文化教育优先的发展理念，不断增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教育的发展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和全局性影响。高等教育也是构建知识经济社会的重要支柱，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对于提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意义重大，在减少贫困、提高社会包容、增加文化多样性、保护环境、改善卫生保健等方面的作用也十分突出。

（二）集聚整合资源、科学规划统筹

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程度，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引进和充分吸收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积极探索通过虚拟大学园的建构促进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在教师、课程、

实验室、校园、体育设施等方面的资源集聚与资源共享，实现资源的节约使用和效用最大化，从而充分发挥大学资源的集聚优势，促进各高等教育机构的对外开放与共同进步。充分利用和整合已有的产业基础、高等教育和大学研究资源，借助产业集群和大学集群快速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积极促进大学、学科、人才、产业和城市之间相互支撑与协同发展，不仅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且逐步辐射引领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发展。按照国务院有关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有关要求，密切结合各地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与专项规划，坚持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目标，汇聚优质资源，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成果产出、学科建设、绩效管理上瞄准世界一流，带动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逐步形成合理的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打造为极具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中心和人才高地。

（三）加大政府投入、拓展社会筹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政府加大投入，但政府投入要避免“撒胡椒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可考虑成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基金会”，每年可从财政预算资金中安排固定比率的资金注入基金会，然后将基金会每年的投资收益用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如为人才引进提供配套资金、建设人才住房、设立奖学金、对大学争取到的外部科研经费进行配套等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经费不足的部分可通过社会各类资金多方筹措。鼓励大学设立自己的基金会，在校领导这一层级设立专门的筹资职位，努力扩大向企业和社会筹资，特别是充分发挥大学校友会支持学校发展的作用。充分利用我国的政治体制优势、制度优势、海外华人华侨众多的人文优势，大力吸引国内外的企业、各类基金会与社会贤达捐助创办世界一流大学，通过配套的鼓励和奖励政策积极引导和提倡高等教育兴学的社会公益新潮流。

（四）减少行政干预、尊重学术自主

在加强和改进党对大学的政治领导的前提下，政府部门与学校党政不得干预大学日常教学事务和科研学术活动，重点推动政府和大学管理的职能从行政管理向提供服务支撑转变，坚持学术自主和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不应套用党政干部的各项纪律和管理办法约束限制大学教授、科学家和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不应用“官本位”“等级制”压制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学术自主。优化科研管理流程，避免让科技工作者陷入各类不必要的检查、论证、评估、填表等事务中，确保他们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科研上。充分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并结合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探索建立大学董事会—校务委员会—院系

委员会的基本治理架构，由党委书记兼任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主席，主要负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大学教育的政治方向以及对大学行政系统的纪律审查。校长负责校务委员会，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工作。各院系委员会负责本院系的各项行政事务。允许和尊重各大学自主制定学校章程、选定研究发展方向、设置调整课程和专业、延聘教授和招收学生、聘任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制定大学教授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晋升办法。严格限制大学行政部门的权力，加强大学行政部门为教授和学生的服务意识，坚持党务与学术、行政与教学相分离的原则，确立各级教授委员会在校、院、系、所的科研、学术和教学事务中的管理权力。

（五）创新激励机制、吸引顶尖人才

科学设计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激励机制。通过个人所得税减免、研究经费自主使用（包括跨境使用）、长期贡献奖、配套外部研究经费、人才住房、人才车牌、授予荣誉称号、给予外籍人士永久居留身份等多种手段吸引国际国内顶尖人才来校工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力度，深化知识产权收益制度改革，激发顶尖人才的科研积极性，支持和鼓励顶尖人才创业创新。通过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待遇和授予企业荣誉称号等方式，积极引导企业委托大学或与大学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同时鼓励企业向大学捐赠人才基金、办学经费与科研基金，以更好地吸引顶尖人才。为高校跨境协同创新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并为协同创新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为人才的柔性引进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研究条件。

（六）强化产教融合、鼓励科技应用

着力培养科技创新型领军人才和任正非式的企业家。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加快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通过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从而更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借鉴斯坦福—硅谷的创新模式，在大学周围大力发展各类特色孵化器与创业孵化园。结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科专长与科研方向，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强化产、学、研一体化，促进大学的科研与教学更好地服务当地和全国的产业转型与经济转型。将产、学、研一体化作为政府考核大学绩效并拨付办学经费的重要指标之一。鼓励大学在基础性研究之外也重视科技应用型研究，努力让大学成为前沿科技、前沿产业、前沿企业和前沿产品的世界级风口。对大学所产生的前沿科技应用类的技术成果，通过产业引导和扶持资金给予特别的鼓励政策，助推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七）发展风险投资、繁荣双创市场

大力促进金融和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借助我国已有的金融产业基础，大力发展和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建设，服务和繁荣大学及其周边的创新创业市场。针对初创期科技企业，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弥补传统债权融资方式因风险偏好而造成的巨大缺口，孵化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针对发展期企业，创新科技信贷，在有效控制贷款风险的基础上，盘活资本存量；拓宽资本退出渠道，开展国际并购，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技术资源，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完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发展软件信息服务业，整合科技创新企业征信及信用评级信息，建设统一共享的金融综合统计体系和中央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

参考文献：

1. 高磊：《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经费收支研究及启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
2. 高瑞：《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教育理念探析》，《世界教育信息》2013年第20期。
3. 顾征、李文：《创业型大学知识产权管理经典模式——斯坦福OTL四十年经验启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年第6期。
4. 关肇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建设》，《世界建筑》1989年第2期。
5. 郭卉：《美国大学评议会制度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6. 李成明：《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7. 南佐民：《拜杜法案与美国高校的科技商业化》，《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8期。
8. 钱学敏：《钱学森在美国的20年（1935—1955）》，《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9. 王英杰：《在创新与传统之间——斯坦福大学的发展道路》，《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
10. 俞云金：《美国大学教师选聘机制的考察与思考》，《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11. 赵炬明：《美国大学教师管理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6 年 4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 年 4 月 12 日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增长仍在继续，但增速十分缓慢，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因此上升。预测 2016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2%，2017 年增长 3.5%，分别比 2016 年 1 月的预测下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2016 年发达经济体增速依然缓慢，约为 2%。国际金融危机遗留问题尚未解决，这部分导致了需求低迷，加上人口形势不利和生产力增长缓慢也都阻碍了复苏。预计美国 2016 年经济增长 2.4%，与 2015 年持平，2017 年增速将小幅提升；资产负债表改善、财政拖累得以解决和房地产市场好转都将支持国内需求；上述因素能够抵消美元走强、制造业疲软造成的净出口下降。欧元区经济增长持续放缓，预计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增长 1.5% 和 1.6%；投资低迷、失业高企和资产负债表薄弱，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日本经济增长和通胀均弱于预期，反映出私人消费大幅下滑；预计 2016 年增速将维持在 0.5%；2017 年消费税将按计划上调，经济将小幅下降 0.1%。尽管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比仍然最大，但各国前景仍不均衡，增速普遍低于过去 20 年的水平；报告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温和增长，2016 年和 2017 年增速预计为 4.1% 和 4.6%。

IMF 总裁拉加德认为，世界经济复苏仍然太缓慢、太脆弱，低增长若长期持续将会带来风险，给许多国家的社会和政治造成破坏性影响。IMF 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表示，增速降低意味着犯错误的余地更小，低增长的长期持续会带来破坏性

效应，低增长本身会损害潜在产出，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需求和投资。在当前疲软的经济环境下，全球经济前景面临更为显著的风险。第一，可能再次出现金融动荡并损害信心。例如，新兴市场经济体若货币再次贬值，可能使企业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资本流入若大幅下降，可能导致其国内需求迅速收缩。第二，如果油价长期低迷，将进一步损害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前景。第三，若中国经济增速比预期大幅下滑，可能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信心等渠道产生强烈的国际溢出效应，导致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最后，包括地缘政治冲突、政治分歧、恐怖主义、难民流动和全球流行病在内的许多非经济冲击将对相关国家、地区构成威胁。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对全球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在当前前景疲软的情况下，各方需要迅速、积极地做出回应。奥布斯特费尔德强调，要支持全球经济增长，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政策组合，即结构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三管齐下；如果各国政策制定者能清晰认识到他们的共同风险并联手应对，将对全球信心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二）2016 年全球经济仍将在困境中艰难跋涉

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里奥斯·马拉泰蒂斯 2016 年 4 月 19 日表示，2016 年全球经济仍将在困境中艰难跋涉，但中国经济重焕生机有助于弥补美国下半年经济增长的“显著放缓”。

渣打银行预计，美国 2016 年经济增速为 1%，低于市场预估中值 2%。同时，该行预期美国经济长期趋势是增长 2.5% 左右。预计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 2.5%，同样低于市场预估中值 3%。渣打银行称，经济增长速度本应该更快，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需求仍然疲软，同时不能单靠央行之力刺激。油价方面，预计今年下半年油价可能反弹至每桶 60～65 美元。

（三）全球经济可能遭遇长期停滞

著名经济学家鲁比尼 2016 年 5 月 4 日发出警告，全球经济或许会陷入长期表现乏力的泥潭。“我们很可能继续保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谓的‘新平庸’，也即萨默斯所谓的‘长期停滞’和中国人所谓的‘新常态’。不过，这种经济状况其实既不正常也不健康，在许多国家，不平衡和不平等都变得越来越严重，导致了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民粹势力抬头，他们反对贸易、反对全球化、反对移民、反对技术创新、反对所有市场导向的政策。”

IMF 认为，全球经济目前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货币急剧贬值和地缘政治局势恶化等的打击。简而言之，增长速度更慢就意味着容错空间更小。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指出，多年的不温不火的增长可能造成“疤痕效应”，使得需求疲软、动力不

足，进一步削弱未来的增长潜力，于是便形成了“长期停滞”。

鲁比尼提出，想要推动潜在增长，结构性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考虑到成本和收益，乃至时机，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困境，有些政策选项会是非常不受欢迎的。鲁比尼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执行不易，想退出其实一样不容易，美联储最近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货币正常化的速度要大大慢于预期。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尤其是同时推动供求两侧的生产性公共投资，依然是高债务和错误的紧缩政策的人质，哪怕在那些其实有财政能力的国家也不能帮上忙。鲁比尼感叹，人们总是宁可犯新错误也不愿意改掉不好的旧习惯，而这就使得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IMF 就政治孤立主义（比如英国可能脱离欧盟）、经济不均衡等风险发出了警告，并在一年内第四次调降了全球增长预期。尽管美国复苏看似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强大的动力，而且包括墨西哥在内的一部分新兴市场也表现不错，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欧洲和日本是主要的失望之地，而中国增速的减缓也拖累了原油和商品出口国的表现，包括巴西和俄罗斯。

（四）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面临四大“威胁”

花旗集团的 Ebrahim Rahbari 等经济学家 2016 年 5 月 4 日表示，中国决策层部署的刺激政策正开始显现成效，并且外部环境已经显示出改善迹象。虽然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软，但近期的数据表明“至少目前来看，可能不再走弱”，使得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跌破 2%（按市场汇率计算）的风险下降。然而，国际金融市场尚未突出重围，仍然有一系列因素可能导致脆弱的全球经济增长发生脱轨。

为什么“只是温和看好”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稳定增长？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新兴市场尚未稳固。虽然美元走软，并且对激进的美联储紧缩周期的预期已经消退，但结构性议题仍在众多新兴市场国家中持续。2017 年 12 月到期的欧洲美元期货合约收益率在今年初下降，同时市场厮杀促使交易员押注美联储将比之前预期的更加缓慢的速度小幅加息。但是如果收益率回升的速度与回落的速度一样，那么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不能像部分人士所期望的那样站稳脚跟，并且美元升值导致金融稳定的风险可能再次出现。

二是政治风险无处不在。存在若干政治风险影响，包括英国 6 月 23 日公投后退出欧盟的风险。英镑已经受到即将到来的英国退欧公投的打击；因为支持“留在欧盟”的阵营获得了更多支持，汇率在最近几周实现了快速回升。此次公投的结果以及之后英国的经济表现，都有可能急剧改变英国央行开始收紧政策周期的起始日期。如果英国选民选择离开欧盟，将会给欧洲大陆的银行造成极大的困扰。

三是世界经济“旧引擎”熄火。留意到“美国经济活动仍然意外疲软”。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环比折年率仅增长为微不足道的 0.5%。这一数据凸显了尽管已与金融危机时隔七年之久，但美国的经济增长尚未真正进入高速阶段。在过去八个月，经济学家一步一步地下调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之前的最高预测增长 2.8% 下调至目前的 2%，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季节性影响。

四是各国决策层缺乏政策弹药或缺乏使用弹药的意愿。各国央行的利率低企，政府债务高位。几乎所有地方为回应潜在下行风险的政策空间仍然有限。如果发生负面的经济冲击，央行采取刺激政策的空间可能受到限制。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 4 月 12 日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认为中国推出的经济转型措施已见成效。预测中国经济 2016 年和 2017 年将分别增长 6.5% 和 6.2%，比 1 月预期均调高 0.2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反映了中国近期推出的稳增长措施及中国国内稳健的消费需求；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从制造业和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和消费驱动；随着中国去产能、去库存的推进，工业增长将出现回落；但随着经济转向消费驱动，服务业有望保持稳健增长，同时收入增长保持稳定，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健及支持消费的结构改革逐步推进将保证经济转型平稳进行。

IMF 认为，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将对全球经济带来积极溢出效应，总体来看对自身及世界都有益处。IMF 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 12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途径众多，包括更加清晰的政策沟通及确保经济转型平稳推进等。

（二）世界银行预测 2016 年中国 GDP 将增长 6.7%

世界银行 2016 年 4 月 12 日预测，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因其房地产和制造业增长降速，2016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滑至 6.7%，2017 年将进一步下滑至 6.5%。2016 年中国政府已经发起建设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其中 GDP 的目标定位于 6.5% 至 7% 之间，2015 年中国 GDP 增长 6.9%。

根据世界银行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半年报，中国经济向更慢但更可持续的方向有序过渡。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和制造业部门。中国的产能过剩拖累着许多行业，但服务行业的发展依然强劲。2015 年中国城市的就业机会超过了预期目标，并且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 GDP 的增长。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半年报的首席经济专家 Sudhir Shetty 认为，中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整体能力是非常高的。

世界银行警告，信贷的增长继续超过 GDP 的增长，表现最突出的仍是房地产行业。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为降低快速增长的经济突然放缓的风险，将实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它将导致积累失衡方面的无序调整。世界银行在官方报告中表示，中国 2016 年 3 月的消费者价格保持稳定，然而生产者价格有结束负面走低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复苏。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 2016 年中国资本外流保持增势

IMF 2016 年 5 月 3 日在香港召开亚太经济记者会，IMF 亚洲太平洋主管李昌镛在会上预计，中国的资本外流会在 2016 年继续保持增势，仍以偿还外债为主，但从长远来看，资本外流情况值得关注，未来如何控制资本外流是对中国央行的考验。

IMF 稍早前预估中国 2015 年全年约有 6760 亿美元资本外流，规模为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大，但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国企业偿还外债，只有极少部分为境外投资者因市场环境撤资。IMF 数据显示，自 1988 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负债不断攀升，尤其自 2008 年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据该机构统计，2015 年中国的外债余额达五万亿美元，其中银行投资组合和有色证券投资达一万亿美元，占总债权的 20%，这一数字高于全球任何一个新兴市场。此外，中国还有大量的境外直接投资，其中包括海外银行贷款和外汇储备金，截至 2015 年底中国直接投资流出一万亿美元，其中约有 3000 亿美元流向亚洲市场，另有约 1600 亿美元流向非洲和中东地区；境外证券投资约 2500 亿美元。

李昌镛指出，中国目前推行的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改善产能过剩的问题，而债转股从短期来看也具有正面意义，中长期来看，中国仍要谨慎应对信贷问题，将资金投放到品质优良的领域，小心僵尸企业以及产能过剩的企业。

（四）中国转型方式对本国与全球经济均有益

IMF 发布的最新一期《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亚太地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依然强劲，GDP 增速将达到 5.3%，几乎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 2/3。亚洲经济增长略有放缓，但依然是全球增长的引擎。尽管外部需求仍然疲软，该地区多数经济体的国内需求依然稳健，这得益于低失业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低的大宗商品价格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从 2015 年的 6.9% 小幅下降至 6.5%。中国经济将继续调整，从制造业和投资向服务业和消费转型。IMF 认为，中国这种向较缓慢但更加可持续增长的转型对中国和全球经济而言都是有益的，消费支出已成为中国经济更加重要的增长引擎。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4 月)				
世 界	3.4	3.1	3.2	3.5
发达国家	1.8	1.9	1.9	2.0
美 国	2.4	2.4	2.4	2.5
欧元区	0.9	1.5	1.5	1.6
日 本	0.0	0.4	0.5	0.1
发展中国家	4.6	4.0	4.1	4.6
印 度	7.3	7.5	7.5	7.5
俄罗斯	0.6	-3.7	-1.8	0.8
巴 西	0.1	-3.8	-3.8	0.0

世界银行(2016 年 1 月)

世 界	2.6	2.4	2.9	3.1
发达国家	1.7	1.6	2.1	2.1
发展中国家	4.9	4.3	4.8	5.3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5 月)

世 界	2.8	2.6	2.4	2.8
美 国	2.4	2.4	1.8	2.3
欧元区	0.9	1.5	1.5	1.6
日 本	-0.1	0.5	0.5	0.5
印 度	7.3	7.5	7.6	7.7

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4 年度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3. 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世 界	3.4	2.8	3.1	3.8
进口				
发达国家	3.4	4.3	3.4	4.1
发展中国家	3.7	0.5	3.0	3.7
出口				
发达国家	3.4	3.4	2.5	3.5
发展中国家	2.9	1.7	3.8	3.9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 4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4 月)				
发达国家	1.4	0.3	0.7	1.5
发展中国家	4.7	4.7	4.5	4.2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5 月)				
世 界	2.6	2.1	2.6	2.8
美 国	1.6	0.1	1.2	2.3
欧元区	0.4	0.0	0.2	1.3
日 本	2.7	0.8	0.0	1.5
印 度	6.0	5.0	5.1	5.1

注:1. 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 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5 年		1.9	0.9	4.3
	4 月	1.8	0.8	4.3
	5 月	1.9	0.9	4.3
	6 月	1.9	0.9	4.4
	7 月	1.9	0.9	4.2
	8 月	1.9	0.9	4.3
	9 月	1.8	0.7	4.3
	10 月	1.9	0.9	4.4
	11 月	2.1	1.0	4.6
	12 月	2.2	1.1	4.8
2016 年	1 月	2.4	1.2	5.1
	2 月			5.3
	3 月			5.1
	4 月			5.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5 年	4 月	1.9	0.7	3.9	50.8	51.6	50.8
	5 月	1.9	0.4	3.6	51.1	51.7	51.2
	6 月	2.5	1.1	4.2	50.9	51.2	51.2
	7 月	1.9	0.6	3.7	50.8	51.3	51.0
	8 月	2.5	1.2	4.2	50.4	50.6	51.0
	9 月	1.3	0.5	3.1	50.4	50.5	50.9
	10 月	1.9	0.7	3.9	51.1	51.6	51.7
	11 月	1.9	0.2	3.2	51.0	52.2	51.2
	12 月	1.2	-1.0	3.2	50.7	51.5	50.8
2016 年	1 月	1.9	0.5	3.5	50.8	51.4	51.4
	2 月	1.2	-0.5	3.7	50.0	50.3	50.4
	3 月	1.2	-0.7	4.1	50.6	51.3	51.4
	4 月				50.1	50.4	50.4

注: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7	-0.6
	2 季度	4.6	3.8	1.2
	3 季度	4.3	3.5	1.8
	4 季度	2.1	4.3	-1.4
2015 年		2.4	3.1	0.7
	1 季度	0.6	1.8	-0.1
	2 季度	3.9	3.6	2.6
	3 季度	2.0	3.0	1.8
2016 年		1.4	2.4	0.1
	4 季度			
	1 季度	0.8	1.9	1.2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3	3.4	3.8
	2 季度	5.6	9.8	9.6
	3 季度	7.9	1.8	-0.8
	4 季度	2.5	5.4	10.3
2015 年		4.0	1.1	4.9
	1 季度	3.3	-6.0	7.1
	2 季度	5.2	5.1	3.0
	3 季度	3.7	0.7	2.3
2016 年		0.4	-2.0	-0.7
	4 季度			
	1 季度	-1.5	-2.0	-0.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7	-0.6
	2 季度	2.6	2.6	-1.0
	3 季度	2.9	3.0	0.0
	4 季度	2.5	3.2	0.4
2015 年		2.4	3.1	0.7
	1 季度	2.9	3.3	0.4
	2 季度	2.7	3.3	0.7
	3 季度	2.1	3.1	0.7
2016 年		2.0	2.7	1.1
	4 季度			
	1 季度	2.0	2.7	1.4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3	3.4	3.8
	2 季度	5.1	4.3	3.9
	3 季度	6.1	3.7	3.1
	4 季度	5.5	2.4	5.4
2015 年		4.0	1.1	4.9
	1 季度	4.8	2.6	6.5
	2 季度	4.7	1.5	4.8
	3 季度	3.6	1.2	5.6
	4 季度	3.1	-0.6	2.9
2016 年				
	1 季度	1.9	0.4	1.1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5 年	22236.2		-5.1	27633.7		-3.1	-5397.6
3 月	1867.4	0.5	-4.1	2389.2	6.5	0.4	-521.8
4 月	1884.1	0.9	-3.4	2317.9	-3.0	-3.1	-433.8
5 月	1870.7	-0.7	-5.2	2305.2	-0.5	-3.7	-434.6
6 月	1869.1	-0.1	-4.4	2331.8	1.2	-2.0	-462.7
7 月	1872.0	0.2	-4.9	2309.1	-1.0	-3.1	-437.1
8 月	1828.1	-2.3	-7.3	2333.5	1.1	-2.2	-505.4
9 月	1852.9	1.4	-5.0	2296.1	-1.6	-3.6	-443.2
10 月	1831.5	-1.2	-7.4	2286.3	-0.4	-4.9	-454.8
11 月	1809.0	-1.2	-7.8	2244.7	-1.8	-5.0	-435.7
12 月	1802.8	-0.3	-7.5	2249.8	0.2	-6.5	-447.0
2016 年							
1 月	1762.9	-2.2	-6.7	2221.7	-1.2	-4.5	-458.8
2 月	1781.6	1.1	-4.1	2251.3	1.3	0.3	-469.6
3 月	1766.2	-0.9	-5.4	2170.6	-3.6	-9.1	-404.4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 (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5 年			0.6	5.3	290.7
	4 月			5.4	25.1
	5 月			5.5	27.3
	6 月	3.1	0.9	5.3	22.8
	7 月			5.3	27.7
	8 月			5.1	15.0
	9 月	2.0	0.6	5.1	14.9
	10 月			5.0	29.5
	11 月			5.0	28.0
	12 月	-1.7	0.6	5.0	27.1
2016 年					
	1 月			4.9	16.8
	2 月			4.9	23.3
	3 月	-1.0	0.6	5.0	20.8
	4 月			5.0	16.0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1066.1	3165.5	-2099.4
	1 季度	-1034.7	577.7	-1612.3
	2 季度	653.2	771.3	-118.2
	3 季度	955.9	969.7	-13.7
	4 季度	491.7	846.8	-355.1
2015 年		3798.9	2999.7	799.2
	1 季度	1983.2	774.9	1208.3
	2 季度	893.9	855.5	38.4
	3 季度	417.0	689.7	-272.7
	4 季度	504.8	679.6	-174.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0.9	0.7	0.9
	2 季度	0.1	0.2	0.2
	3 季度	0.3	0.4	0.3
	4 季度	0.4	0.5	0.2
2015 年		1.6	1.7	1.3
	1 季度	0.6	0.5	0.5
	2 季度	0.4	0.3	0.3
	3 季度	0.3	0.5	0.3
	4 季度	0.3	0.2	0.6
2016 年				
	1 季度	0.5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4.1	4.5
	1 季度	0.4	0.8	1.2
	2 季度	-0.5	1.0	1.1
	3 季度	0.4	1.6	1.5
	4 季度	0.6	1.2	1.2
2015 年		2.7	5.0	5.7
	1 季度	1.4	1.4	2.1
	2 季度	0.1	1.7	1.0
	3 季度	0.4	0.2	1.2
	4 季度	1.3	0.2	0.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5 年			0.5	181.2	10.9
	3 月	0.4	0.5	30.5	11.2
	4 月				11.1
	5 月				11.0
	6 月	0.0	0.7	57.3	11.0
	7 月				10.8
	8 月				10.7
	9 月	0.0	0.6	46.2	10.6
	10 月				10.6
	11 月				10.5
	12 月	0.0	0.6	47.2	10.4
2016 年					
	1 月				10.4
	2 月				10.4
	3 月				10.2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0.9	0.7	0.9
	2 季度	0.7	0.6	0.8
	3 季度	0.8	0.8	0.9
	4 季度	0.9	1.1	1.0
2015 年		1.6	1.7	1.3
	1 季度	1.3	1.6	1.1
	2 季度	1.6	1.7	1.2
	3 季度	1.6	1.8	1.2
	4 季度	1.6	1.5	1.6
2016 年				
	1 季度	1.5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4.1	4.5
	1 季度	2.5	3.7	4.2
	2 季度	1.2	3.4	4.2
	3 季度	0.7	4.6	4.4
	4 季度	0.9	4.7	5.1
2015 年		2.7	5.0	5.7
	1 季度	2.0	5.3	6.0
	2 季度	2.6	6.0	5.8
	3 季度	2.5	4.6	5.5
	4 季度	3.4	3.6	5.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
	月份		(%)	(%)		(%)	(%)	减进口额
2015 年		20406		5.4	17932		2.3	2475
	3 月	1727	0.4	11.5	1555	4.6	9.8	172
	4 月	1715	-0.7	9.1	1520	-2.2	5.6	195
	5 月	1706	-0.6	2.7	1491	-1.9	0.1	215
	6 月	1720	0.8	12.6	1527	2.3	6.9	193
	7 月	1730	0.6	7.1	1504	-1.5	0.4	226
	8 月	1667	-3.6	5.7	1472	-2.1	2.6	195
	9 月	1679	0.7	0.8	1481	0.6	-0.6	198
	10 月	1682	0.2	0.5	1484	0.2	-0.7	198
	11 月	1708	1.5	6.2	1477	-0.5	4.1	231
	12 月	1705	-0.2	4	1480	0.2	3.1	225
2016 年								
	1 月	1666	-2.3	-2	1457	-1.5	-1.3	209
	2 月	1673	0.5	1.1	1467	0.7	1.7	206
	3 月	1651	-1.3	-2.7	1428	-2.7	-8.4	223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1718.0	1437.0	236.0
	3 月	234.0	-214.0	448.0
	4 月	287.0	163.0	124.0
	5 月	132.0	311.0	-179.0
	6 月	161.0	172.0	-11.0
	7 月	-72.0	230.0	-302.0
	8 月	-28.0	3.0	-32.0
	9 月	597.0	298.0	299.0
	10 月	426.0	405.0	21.0
	11 月	-450.0	-490.0	-4.0
	12 月	23.0	75.0	-52.0
	2016 年	1 月	-99.0	66.0
2 月		220.0	665.0	-445.0
3 月		121.0	259.0	-138.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2 季度	-2.0	-5.0	-0.2
	3 季度	-0.6	0.0	0.3
	4 季度	0.6	0.6	0.3
2015 年		0.4	-1.2	1.1
	1 季度	1.3	0.2	0.3
	2 季度	-0.4	-0.8	0.5
	3 季度	0.4	0.5	0.2
	4 季度	-0.4	-0.8	0.7
2016 年	1 季度	0.4	0.5	0.7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2 季度	-4.7	0.1	-4.3
	3 季度	-0.9	1.5	0.6
	4 季度	0.1	3.2	1.1
2015 年		0.0	2.7	0.2
	1 季度	2.1	2.2	1.5
	2 季度	-0.1	-4.8	-2.6
	3 季度	0.2	2.6	1.7
	4 季度	-0.1	-0.8	-1.1
2016 年	1 季度	-0.9	0.6	-0.5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2 季度	-0.3	-2.5	-0.3
	3 季度	-1.5	-2.7	-0.2
	4 季度	-1.0	-2.1	0.3
2015 年		0.6	-1.2	1.2
	1 季度	-1.0	-4.1	0.6
	2 季度	0.7	0.1	1.4
	3 季度	1.8	0.4	1.3
2016 年	4 季度	0.7	-1.0	1.7
	1 季度	0.0	-0.6	2.1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2 季度	0.6	5.5	5.9
	3 季度	-2.1	7.5	5.0
	4 季度	-3.1	11.2	3.5
2015 年		0.0	2.8	0.3
	1 季度	-3.8	7.4	-0.6
	2 季度	0.7	1.9	0.8
	3 季度	2.4	3.1	1.5
2016 年	4 季度	1.8	-0.9	-0.5
	1 季度	-1.0	-2.5	-2.3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5 年		-1.4	1.80	3.4
	3 月	-3.5	1.74	3.4
	4 月	-2.9	1.77	3.3
	5 月	-2.6	1.78	3.3
	6 月	1.4	1.79	3.4
	7 月	-1.8	1.82	3.3
	8 月	-3.0	1.84	3.4
	9 月	-2.5	1.83	3.4
	10 月	0.5	1.86	3.1
	11 月	0.1	1.90	3.3
	12 月	-2.8	1.90	3.3
	2016 年	1 月	-4.0	2.07
2 月		-1.2	1.92	3.3
3 月		-1.6	1.90	3.2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5 年	756322		3.5	784676		-8.7	-28353
4 月	63578	-1.9	8.0	66437	0.8	-4.2	-2859
5 月	61454	-3.3	2.4	63702	-4.1	-8.7	-2248
6 月	64088	4.3	9.5	66667	4.7	-2.9	-2579
7 月	63578	-0.8	7.6	66669	0.0	-3.2	-3091
8 月	62986	-0.9	3.1	65869	-1.2	-3.1	-2883
9 月	61901	-1.7	0.6	64404	-2.2	-11.1	-2503
10 月	61893	0.0	-2.1	63357	-1.6	-13.4	-1465
11 月	62351	0.7	-3.3	61773	-2.5	-10.2	578
12 月	59687	-4.2	-8.0	59028	-4.0	-18.0	659
2016 年							
1 月	59818	0.2	-12.9	58547	-0.8	-18.0	1271
2 月	58291	-2.6	-4.0	56451	-3.6	-14.2	1840
3 月	58334	0.1	-6.8	55381	-1.9	-14.9	2953
4 月	57654	-1.2	-10.1	53388	-3.6	-23.3	4266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510	159884	-160394
	3 月	2595	10484	-7889
	4 月	-748	9883	-10631
	5 月	977	23524	-22547
	6 月	-433	6165	-6598
	7 月	-4463	12429	-16892
	8 月	-837	13842	-14679
	9 月	-1884	11442	-13326
	10 月	833	16580	-15747
	11 月	1490	13146	-11656
	12 月	1490	14725	-13235
2016 年				
	1 月	-483	10225	-10708
	2 月	1884	17157	-15273
	3 月	9010	20813	-11803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4 年		2.5	2.9	1.5	0.1	7.3	0.6
	2 季度	3.7	3.0	1.3	-0.9	7.5	0.7
	3 季度	2.1	2.8	1.6	-1.1	8.3	0.9
	4 季度	3.4	2.8	1.4	-0.7	6.6	0.4
2015 年		1.2	2.3	1.3	-3.8	7.5	-3.7
	1 季度	-0.9	2.6	2.2	-2.0	7.5	-2.8
	2 季度	-0.4	2.4	1.3	-2.9	7.6	-4.5
	3 季度	2.4	2.2	1.0	-4.5	7.7	-3.7
	4 季度	0.8	2.1	0.6	-5.9	7.3	-3.8
2016 年							
	1 季度		2.0				-1.2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4 年		3.3	2.1	2.6	3.8	6.0	5.0
	2 季度	3.4	1.8	2.1	4.2	6.5	5.0
	3 季度	3.3	2.3	3.2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5	3.6	5.7	5.0
2015 年		2.6	2.5	2.4	0.7	5.0	4.8
	1 季度	2.4	2.6	2.4	4.0	5.6	4.7
	2 季度	2.2	2.3	3.1	0.6	4.9	4.7
	3 季度	2.8	2.7	2.3	-0.8	4.7	4.7
	4 季度	3.1	2.4	1.9	-0.9	4.5	5.0
2016 年							
	1 季度	2.7	2.6	0.8	-0.7	4.2	4.9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5 年		6.9	5.4	6.8	5.6	25.4
	4 月	6.8	5.5	8.0	5.8	
	5 月	6.8	5.6	8.1	5.6	
	6 月	6.8	5.6	8.3	5.3	25.0
	7 月	6.8	5.4	8.6	5.3	
	8 月	7.0	5.3	8.7	5.3	
	9 月	7.1	5.2	8.9	5.2	25.5
	10 月	7.0	5.1	8.9	5.5	
	11 月	7.1	5.1	9.0	5.8	
	12 月	7.1	5.1	9.0	5.8	24.5
2016 年						
	1 月	7.2	5.1	9.5	5.8	
	2 月	7.3	5.1	10.2	5.8	
	3 月	7.1	5.1	10.9	6.0	26.7
	4 月	7.1			5.9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5 年		3.6	4.4	3.3	3.8	3.1
	4 月	3.7	4.3	3.2	3.8	3.0
	5 月	3.9	4.4	3.2	3.8	3.1
	6 月	3.9	4.4	3.2	3.8	3.1
	7 月	3.7	4.7	3.3	3.7	3.2
	8 月	3.6	4.7	3.3	3.7	3.2
	9 月	3.5	4.5	3.3	3.8	3.2
	10 月	3.4	4.6	3.3	3.8	3.1
	11 月	3.5	4.0	3.3	3.8	3.2
	12 月	3.5	4.0	3.3	3.9	3.4
2016 年						
	1 月	3.5	4.2	3.3	3.9	3.4
	2 月	4.1	4.2	3.3	3.9	3.4
	3 月	3.8	3.7	3.4	3.9	3.5
	4 月	3.7	3.8	3.4	4.0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4084.8	4192.5	-107.7	4596.6	6258.3	-1661.7
3 月	361.4	377.1	-15.7	419.0	545.1	-126.2
4 月	341.3	367.6	-26.4	386.1	498.2	-112.1
5 月	340.7	366.1	-25.4	397.6	506.2	-108.7
6 月	372.1	374.2	-2.1	401.5	546.6	-145.1
7 月	339.8	349.8	-10.0	380.0	546.8	-166.8
8 月	335.8	349.7	-13.9	363.5	472.5	-109.1
9 月	345.8	348.0	-2.2	392.9	534.5	-141.6
10 月	336.1	353.2	-17.1	380.1	574.3	-194.2
11 月	322.2	334.1	-11.9	378.0	533.3	-155.3
12 月	334.9	317.7	17.2	405.3	467.7	-62.4
2016 年						
1 月	307.8	392.1	-84.2	315.0	450.4	-135.4
2 月	298.7	311.5	-12.8	342.2	496.6	-154.4
3 月	328.3	343.7	-15.4	349.3	565.6	-216.3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81.5	85.7	-4.1	1911.3	1788.0	123.4
4 月	69.8	71.8	-2.0	151.6	153.2	-1.6
5 月	73.8	70.1	3.7	167.7	146.3	21.4
6 月	73.0	68.7	4.4	196.3	157.4	38.8
7 月	74.2	75.6	-1.4	185.3	167.6	17.7
8 月	67.5	75.5	-8.0	154.9	133.1	21.8
9 月	66.9	68.4	-1.5	161.5	137.6	23.9
10 月	63.0	79.5	-16.5	160.5	146.3	14.2
11 月	65.9	65.8	0.1	138.1	131.7	6.4
12 月	58.5	53.7	4.7	167.8	110.2	57.6
2016 年						
1 月	42.6	54.6	-12.0	112.5	107.2	5.2
2 月	57.4	58.2	-0.8	133.5	107.6	25.9
3 月	62.5	60.6	1.9	159.9	120.6	39.4
4 月				153.7	109.7	44.0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2666.6	3717.7	-1051.1	3403.5	1940.9	1462.6
4 月	221.3	331.3	-110.1	305.5	162.8	142.7
5 月	224.0	328.5	-104.4	305.8	154.0	151.8
6 月	225.2	330.5	-105.2	300.1	163.2	136.9
7 月	232.0	361.2	-129.2	276.6	168.6	107.9
8 月	223.0	337.2	-114.2	253.1	163.5	89.6
9 月	218.0	322.8	-104.9	263.4	168.3	95.1
10 月	214.3	309.4	-95.2	269.6	169.1	100.5
11 月	195.3	297.0	-101.7	254.0	164.6	89.4
12 月	225.2	340.5	-115.3	287.5	174.4	113.1
2016 年						
1 月	210.6	286.9	-76.3	170.6	97.7	73.0
2 月	206.9	271.5	-64.6	201.7	128.2	73.5
3 月	227.2	277.9	-50.7	229.9	152.8	77.1
4 月	205.7	254.1	-48.5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5267.6	4365.0	902.6	3807.7	4052.8	-245.1
4 月	462.2	378.6	83.6	329.7	338.9	-9.2
5 月	423.9	360.7	63.2	312.4	331.8	-19.4
6 月	469.5	367.0	102.4	337.6	354.7	-17.1
7 月	466.1	388.5	77.6	327.0	359.6	-32.7
8 月	393.3	349.8	43.5	310.1	346.9	-36.8
9 月	435.1	345.6	89.5	321.9	345.3	-23.5
10 月	434.7	367.8	66.9	341.0	364.9	-23.9
11 月	444.0	341.0	103.0	310.2	333.9	-23.7
12 月	426.0	355.0	71.0	311.7	326.8	-15.1
2016 年						
1 月	367.6	314.0	53.6	246.9	287.3	-40.4
2 月	364.0	290.0	74.0	289.7	305.4	-15.7
3 月	430.0	332.0	98.0	314.9	322.1	-7.2
4 月	410.0	322.0	88.0	304.2	333.3	-29.1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5106.0	5594.3	-488.3	2804.8	2289.2	515.6
4 月	401.4	457.1	-55.8	234.9	187.4	47.5
5 月	408.5	444.4	-35.9	256.3	202.1	54.2
6 月	407.4	465.6	-58.2	230.7	208.8	21.9
7 月	453.2	475.9	-22.8	235.5	199.1	36.3
8 月	426.6	456.0	-29.4	239.3	199.6	39.7
9 月	453.5	492.6	-39.1	225.4	173.1	52.3
10 月	450.1	485.9	-35.8	239.4	178.1	61.3
11 月	454.6	480.9	-26.4	221.3	193.8	27.5
12 月	468.8	500.8	-32.0	220.6	178.9	41.7
2016 年						
1 月	406.4	425.0	-18.6	222.0	186.9	35.1
2 月	277.0	318.0	-41.0	177.8	136.3	41.5
3 月	374.0	463.0	-89.0	227.2	182.2	45.0
4 月				222.5	174.5	48.0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199.9	176.0	23.9	1503.4	1427.3	76.1
4 月	166.1	147.2	18.9	130.8	126.3	4.6
5 月	167.8	152.5	15.3	126.9	116.1	10.8
6 月	171.9	150.5	21.3	135.1	129.8	5.3
7 月	166.3	160.1	6.2	114.7	100.8	13.9
8 月	163.8	138.8	25.0	127.3	124.0	3.3
9 月	162.7	140.3	22.5	125.9	115.6	10.3
10 月	177.6	149.1	28.5	121.2	111.1	10.1
11 月	157.0	133.2	23.8	111.1	115.2	-4.1
12 月	159.5	140.3	19.3	119.2	120.8	-1.6
2016 年						
1 月	142.3	129.9	12.4	104.8	104.7	0.1
2 月	135.5	117.9	17.6	113.1	101.8	11.4
3 月	163.3	135.9	27.5	118.1	113.0	5.1
4 月				114.5	107.8	6.7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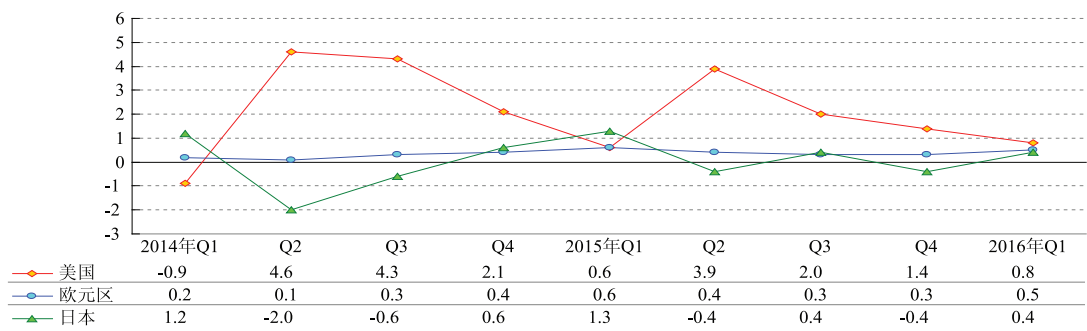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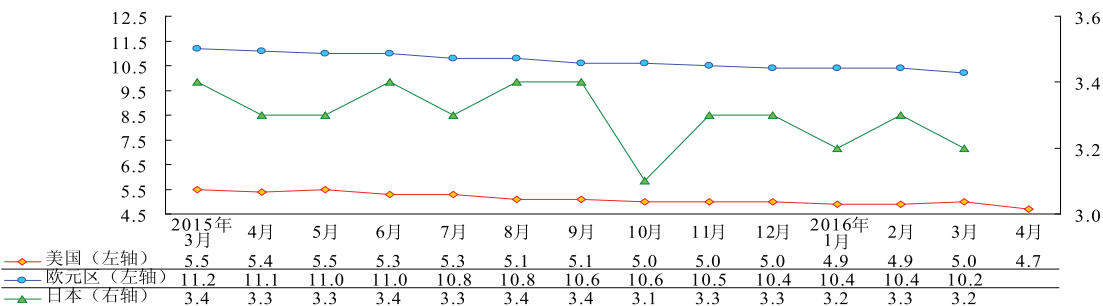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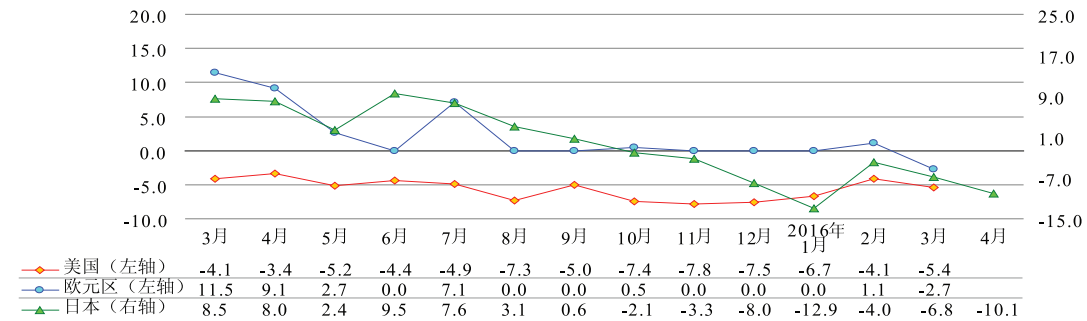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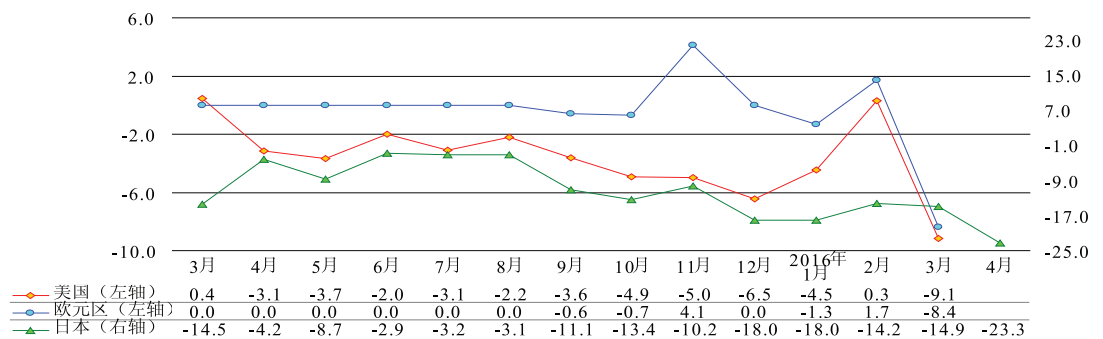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A study on important issu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Nie Zhenbang, Yuan Lixing and Zhan Lin

So far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more prominent issues such as the large scale of poverty to be alleviated, the rising difficulty to alleviate and reduce poverty, and the inaccura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face new situ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trategically new change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new requir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new mechanisms needed with new means. Therefore, in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some important work, for exampl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 concentrated connected destitute areas,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aj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public service, further innovate and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et up relevant supporting policy, speed up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at by 2020 the overall goal of building up a comprehensive well – off society is achieved.

(2)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in Heilongjiang

Song Ha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old state – 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have been lagging behind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such as lack of timely transformation. Those could be institutional reasons, or firms’ own problems. However, financial support is no doub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help enterprises get out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upgrade and transform.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eilongjia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s and methods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ol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3)Strengthening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o promote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Dai Guiying, Zhang Jin

Strengthening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to implement China’s innovation – driven strategy and realize the China’s dream. Different from other capital investmen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has hysteresis and long – term effect of investment return, multiplier effect, increasing effect of marginal revenue and riskiness. At present, Chin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has a number of problems, for example, its total amount far below the international averaged amount, unreasonable investment structu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system and mechanisms to be improved.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ttrac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rom multiple channels, expand the investment scale of human capital, optimize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reduce the regional gap an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develop the nutrition intervention into project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s, equally distribut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llocate

special government funds for mental health of love – left – behind children, reform leadership assessment mechanism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above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statistical system, and deepen reform for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4)Some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drivers in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Sheng Chaoxun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drivers that suppor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cluding factor inputs, export growth and resourc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re weakening, while new impetus are to be fostered. China must stabilize economic growth and prevent huge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the meantim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eform carried out in advance, enterprise main body, key breakthrough, and talent as the basis”, focus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main body, drivers, important area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innovation,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rivers and new foundation for a sustained and stable economic growth, so as to make innovation drivers to become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the sustained and stable economic growth.

(5)The lack of drivers for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Yan Kun and Yu Shuyi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has been past for seven years, but its impacts remain and the state of weak economic growth has spread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riving forces for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s not likely to come from external economic policies, but from internal driver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trategic layout. The speed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dropped to the reasonable interval, but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s reflected in all macroeconomic are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has been on – going orderly,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es steadily, the policy space has also got gradually improved; given that the development engine has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o service industry, China should further develop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form twin engin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etter reach the go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6)Proposals on developing economic index monitoring system in the bay area of Shenzhen

Qi Luming

The bay area economy is a highlight in today’s world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Shenzhen has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y area economy to prop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has strong uniqueness and creativity. This study, in refere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giving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henzhen, constructs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Shenzhen bay area economy from f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innovation radiation, openness – led, accumulation of factors, interoperability, and base support.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ly Shenzhen bay area economy i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7)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financial industry based on Logistic model

Yan Yan, Yang Ling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ften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ervice – oriented economic system ar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in this proces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ial industry is mainly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gulatory relax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many other factor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ial industry significant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having integration effects such as optimiz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competitive ability effect and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effect.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Internet financial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has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but restricted by economic system, technical level, property right system,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Internet and financial industry are stepping into the selection stage of deep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ial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from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o business integratio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finall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innovation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system is an indispensable key link, the source of power and guarantee system for Internet banking towards deep integration.

(8)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n by entrepreneurial spirit

Nie Changhong, Li Huicong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and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are to transform strategies from the traditional factor – driven to innovation – driven,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a series of reforms. In this process,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have become the focus to lead reform. From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based on corresponding functions of innovation – driven and efficiency – improv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Then combined with the advanced experiences of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n America and German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gal, cultur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spirit of entrepreneurs in China. The cultivation, manag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re interdependent and have coordinated mechanisms.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driven by the entrepreneurship spirit, that is to say,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level should improve policy incentives for goo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short term, optimize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 spirit and increa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middle term,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for good entrepreneur spirit in the long term.

(9) A survey report on the high level innovative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Zheng Xinli, Sheng Sixi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area of development lagging behind, has been rising rapidly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duced a number of world – class innovative universities in just a few decades. The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of these universiti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university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wide and the world wide. Although China is a big country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not a strong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current time of China’s overall promoting world – class universities and constructing first – class disciplines, the experiences of high level innovative universities of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China’s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universities. China needs to further change th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idea of giving priority to education, co – ordinate the us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able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s in managing funds, university governanc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eachers mechanism, student culti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 characteristic and world – class universities.

Editor: Huang Yongfu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